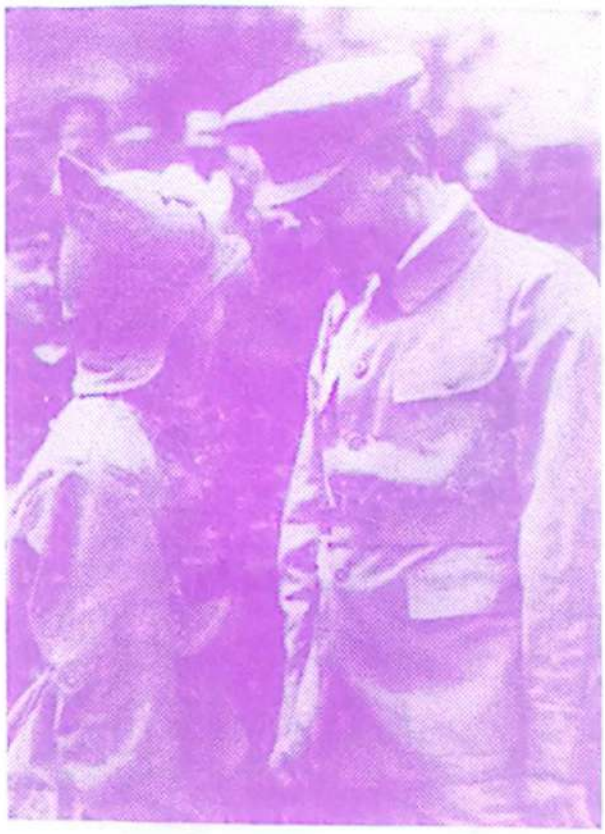
社會主義研究叢書之五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

（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十月書屋

目　錄

托洛茨基的正面形象在蘇聯重現
（1987年4月20日）……《國際觀點》　1
莫斯科審判案受害者的平反
（1987年11月）……曼德爾　5
一次歷史性的勝利
——第三次莫斯科審判被告獲恢復名譽
（1987年11月）……曼德爾　13
莫斯科承認斯大林謀殺托洛茨基的罪行
（1989年2月）……沃　特　17
我們開始研究托洛茨基
（1990年春季）……維克托爾。丹尼洛夫……18
托洛茨基傳略
（1990年）……亞歷山大。潘佐夫…38
新僞造歷史學校
——評當代蘇聯托洛茨基研究的一個流派
（1990年）……亞歷山大。潘佐夫…78
理解托洛茨基
——論布魯耶……曼德爾　99
托洛茨基問題國際研討會
（1990年4月23日）……曼德爾　121
托洛茨基問題討論會在莫斯科舉行
（1990年8月18日）……比蘭尼　125
反官僚層的先驅
——紀念托洛茨基遇難五十週年
（1990年8月20日）……軍　行　131

托洛茨基昭雪了嗎？
（1990年9月24日）.....伏爾可夫 137
我國八十年代托洛茨基研究回顧
（1990年）.....喬 健 145
托洛茨基無罪，托派無罪
——中共應當平反中國托派
（1991年2月十日）.....鄭超麟 154
中國人民需要徹底解放思想
——回應《我國八十年代托洛茨基研究回顧》
（1992年6月三十日）.....張 開 159
托洛茨基及左派反對派：
俄羅斯政府檔案披露的新材料
（1994年11月）.....亞歷山大。潘佐夫 175
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問題會議
（1994年11月）.....霍格特。道尼 184
托洛茨基的理論遺產及其時代意義
（1994年11月）.....霍雅科夫教授 191
俄羅斯的工人鬥爭和托洛茨基主義的「幽靈」
（1994年11月）.....霍格特。道尼 198
托洛茨基與蘇維埃民主
（1995年12月）.....巴 爾 208
托洛茨基問題第二屆研討會
（1995年12月）.....霍格特。道尼..211
《莫斯科三次公開審判》（書評）
（1996年11月）.....林 丹 217

托洛茨基的正面形象在蘇聯重現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

《國際觀點》

蘇聯劇作家米嘉。沙托夫（M。SHATROV）在一次訪問中這樣說：「我不能夠再抱有這種觀念：十月革命是由一群間諜所領導，列寧被叛徒、罪犯及恐怖主義者所包圍，1930年的大清洗行動是列寧主義的一部份傳統。在我生命之中，在我的作品之中，我一直力圖指出這些觀念是錯誤的，指出列寧主義、社會主義是與上述觀念很不相同的東西。

「把人們假定列爲帝國主義代理人的時刻已經結束；把蘇聯共產黨及蘇聯的歷史重寫的時刻已經到來。任何人不應被擯出歷史以外，也不應害怕面對歷史。」

訪問內容刊登在87年4月2日的《晚郵報》。當時沙托夫正在意大利參加一個由連慈研究院及意蘇友誼會社主辦的會議。意大利報紙把沙托夫形容爲「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大使」。沙托夫的事業開始於赫魯曉夫的第20次黨代表大會，而現在勃列日涅夫的暗淡時

期過去，他再次冒升起來。

訪問中，沙托夫繼續說：「我的所有作品引起了『震動』及激發起『激烈的鬥爭』。赫魯曉夫下台後，我的所有作品都無情地被禁。現在革新的風，把它們重新帶回陽光之下。在莫斯科各劇院上演的一套以探討社會主義墮落的戲劇 ≪良心的專政≫，毀譽參半。之後，4套關於列寧的電影在電視上放映，轟動一時，因爲除了布哈林的角色首次在電視上出現外，由演員米嘉·歐也盧夫扮演的列寧角色，並不是偶像化的列寧，被放上神台的列寧，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沙托夫的另一套話劇：≪布列斯特的和平≫也肯定會帶來震撼，話劇角色包括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卡明尼夫。作者表示話劇內容並不重覆斯大林主義者陳舊的一套人物造型。

「當人們從監獄中出來，當文件也從檔案室出來時，我想我們有需要從過往的事件中汲取教訓，總結過去經驗，改變我們的觀念。」

沙托夫在1962年當赫魯曉夫當權時開始這個計劃，在赫魯曉夫下台之後，他的作品遭到雪藏。到現在，沙托夫說：「打碎歷史的鎖鍊是有可能的，因爲現在正產生一種意願，要創造蘇聯社會，使它無須害怕任何東西，所想的、所做的完全由自身決定，不會被牽着鼻子走，更不會被置於蒙昧及無知之中。」

沙托夫被問及他如何在話劇中處理那些「被禁的人物」，他答：「我將托洛茨基及布哈林表現爲革命的領導者，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人，列寧的親密戰友，及忠誠於他們在過去的歷史時刻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沙托夫的話劇中，托洛茨基不是主角，但沙托夫宣稱會以客觀的態度來處理他：「在這個決定革命命運的布列斯特和約的辯論中，托洛茨基採取了一個錯誤的立場。他並沒有看到形勢的最根本問題，這點同列寧是不同的。在辯論中，他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論點。他的辯詞激烈及很有說服力，但除了戲劇性的姿勢外，他並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動機是好是壞都可以從結果中展現出來，事實也證明列寧的分析比較準確，比較深刻。」

「我也同時指出了托洛茨基正面的特質，他有超卓的組織能力和雄辯的口才。就如布哈林譴責列寧放棄擴張革命的希望的情形一樣，在此，我並沒有增減任何東西。我們必須認眞地、客觀地研究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所做的和所說的；必須分析正反兩方面，正如列寧當時所做的。列寧曾經認爲布哈林是黨最寵愛的兒子、出色的理論家，但同時公開指出他的錯誤。」

沙托夫被問及他認爲什麼時候有可能重寫蘇聯共產黨的歷史。

「當第27屆黨代表大會（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路綫取得勝利時……

「從1920年代末期已開始使用的標準，必須結束了。它是一個荒謬、盲目、野蠻的處理方法。歷史被暴力對待。暴行、恐怖及濫權被充作爲社會主義。這並非不可避免的。我們要反問自己，我們的國家歷史進程爲何會走上這樣的道路？爲什麼那麼多的恐怖罪行發生了？」

沙托夫繼續被問及重寫歷史的任務何時會完成。

他重覆說：「我不怕冗贅地說，當第27屆黨代表大會路綫勝利時。」跟着他把整個問題轉移到一個主觀標準之上：「重建的根本障碍並非在我們之外，而是在我們之內。根本的東西是你的才能，你的思考，你對形勢的分析。你需要認識你自己，分析你自己。而革命力量必須來自自己本身。」

沙托夫的話劇劇本將在蘇聯文藝雜誌《新世界》4月號刊登。

〔本書各篇譯文，除有譯者名之外，其餘俱爲兆立譯〕

莫斯科審判案受害者的平反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曼德爾

87年7月，蘇聯最高法院平反了在1930年審判案中被判長期徒刑的偉大俄國經濟學家康特拉地夫和其他被告。該審判案主要是審訊莫斯科農業經濟學院和國際現代研究學院的農業和經濟學者，前者由沙仁諾夫領導，後者則由康特拉地夫領導。兩人在1937年被處決。

這兩人都是十月革命後的重要知識份子。兩人都是非共產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得以合法工作，證明在斯大林獨裁政權鞏固之前，蘇聯知識份子享有高度自由。

斯大林派系對1930年審判案各被告抱有怨恨，是由於他們支持布哈林和拉可夫，反對斯大林在1928—29年進行的強迫農業集體化和激烈工業化的政策。其實康特拉地夫和沙仁諾夫只是提供事實、數據和分析，帮助了布哈林的辯論吧了。

很多觀察家認爲康特拉地夫在法律上被平反，證實布哈林不久會被官方平反。布哈林遺孀和兒子在赫魯曉夫時代已開始正式要求平反布哈林，但經過冗長手續後，黨檢察委員會在77年拒絕了平反的要求。

今天，蘇聯報刊越來越多正面地提到布哈林，甚

至是他的政治傾向（連一些中國刊物也有提到他）。87年7月，蘇聯《文學報》刊登一幕劇，兩個主角之中，一個捍衛強迫集體化，另一個支持布哈林的漸進論點。布哈林不但被形容爲仁慈的人，而且首次被視爲保衛正確路綫者。戲劇作者是戈爾巴喬夫的主要知識份子和報刊代表之一。

由於康特拉地夫和沙仁諾夫被平反，蘇聯司法機關如果拒絕抹走布哈林的刑事控罪，將會處於很窘迫的位置。無論如何，康特拉地夫是克倫斯基政府的一個部長，而布哈林是十月革命的領袖之一和布爾什維克黨政治局成員。是否可以平反康特拉地夫而不平反布哈林呢？

康特拉地夫的平反並不是孤立的事件。在85年，第三次莫斯科大審判主要被告之一的紀斯丁斯基，也被平反了，儘管是靜悄悄地平反的。因此，布哈林的平反是很可能的。

平反托洛茨基？

平反布哈林之後，是否輪到托洛茨基呢？在目前，唯一較明確的跡象，是在報刊、戲劇和文學作品之中開始比較沒有那樣敵對地提出托氏。此外，他的兩個最親密的政治朋友，在第二次莫斯科審判案中被判刑的老布爾什維克和內戰英雄莫拉洛夫和斯米加，也被最高法院平反了。

但從這些跡象看，並不可以武斷說，加諸托氏身上的罪行指控，必然會被平反。不少相反的跡象也存在着。87年9月的莫斯科書展中，圍繞着斯大林與托洛茨基衝突的著名諷刺作品——奧威爾的《動物農莊

≫被禁和沒收了。代卓爾的≪斯大林傳記≫也受到同樣命運，儘管在場的英國出版商表示抗議。

此外，例如在紀念秘密警察創建者誕辰時，克格勃頭子仍然對托氏抱有極端仇視的態度。≪眞理報≫編輯也質疑平反托氏是否合時。他說這個革命領袖的≪負面≫作用多於「正面」作用。

報章上越來越多談到這個爭論性的問題。有報章指出列寧遺囑對托氏的評價一般是正面的，說他是「黨的極佳活動家，被〔斯大林〕迫上孤立的道路」。另外兩份日報在9月底已整版篇幅來批判地檢視托洛茨基的作用，並否認平反他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解釋所有這些現象的理由並不明顯。蘇共領袖是否在這問題上分歧呢？無論如何，國際工人運動施加壓力，要求平反大審判案所有被告，是很必須和有用的。

爲了明白平反對所有這些被告的誣告的意義，必須指出斯大林主義者鎮壓老布爾什維克的三個特點：

※ 大量僞造歷史。這包括完全掩蓋他們在俄國革命、革命前的俄國工人運動，以及從1917年到28年的作用，或者是以誣衊的稱呼來指控他們，例如帝國主義間諜、蓋世太保代理人、叛徒、反革命、恐怖份子等等。

※ 較隱蔽地僞造歷史。這包括歪曲他們某些工作和意見、隱瞞部份眞正工作等。這是斯大林派系在1923年到28年對付不同反對派的鬥爭中所慣用的伎倆。從29到34年，這些伎倆逐漸轉爲上述第一種方式。

※ 以他們從沒有犯的罪行而判罪，繼而將他們處死（小部份人被判長期監禁，在獄中死去）。他們的公

民權利被剝奪，亦即這些共產主義領袖和幹部的寫作，直至今天仍在蘇聯被禁。

爲了以最低代價脫離窘境，官僚層可能只是補救斯大林罪行的部份後果。它可能抹掉最大的、最污蔑的僞造歷史（例如在最新版的蘇聯百科全書之中），而不恢復審判案受害者的整個歷史眞相，也不容許他們的作品重新出版或流通。它也可能容許某些而不是所有老布爾什維克的作品出版。

完全地和公開地平反所有莫斯科審判案中的被告，必須包括由國家向蘇聯群衆承認托洛茨基、季諾齊也夫、卡明尼夫、布哈林、拉可夫、拉可夫斯基、派塔可夫、拉迪克、史米諾夫及其他列寧時代的黨領袖，並非是叛徒、反革命、帝國主義代理人、法西斯主義者、謀殺犯或恐怖份子，而是國家和黨的主要領袖、政治局成員、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因此他們的作品值得重新出版。

如果要批評他們，必須要客觀地進行，基於他們文章的實際內容，而不是憑空指責。這些作品不能被查封，即使是部份地、有選擇地再出版，也是不能接受的。

當然，平反莫斯科審判案各被告，不能與認同他們的政治路綫混爲一談。首先，他們的政治主張是有很大分歧的，與斯大林捏造的神話相反，在蘇共之內，從來沒有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右派的聯盟；齊諾維也夫與卡明尼夫也從來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最多也只是他們在1926年—27年公開地與得到列寧遺孀支持的左派反對派聯繫。

莫斯科審判案的被告人，在政治上可分爲五類：

托洛茨基主義者（或者稱他們爲支持左派反對派的人）；齊諾維也夫派；布哈林的右派反對派支持者；在23至29年仍是斯大林派，但在30年代開始時在某些政治觀點上與斯大林決裂的人；還有是一些沒有很清晰政見的人。因此，不可能說所有這些政治觀點都是正確的，因爲他們是互不相容的。

其次，平反斯大林的受害者，不能以接受他們的政治觀點與否爲準，因爲這會是承認斯大林的條件、接受這些審訊和恐怖迫害的思想入罪基礎。必須肯定人們有作出政治錯誤的權利；沒有它，民主是不可能的。如果發言表示一種可能錯誤的意見，會自動被當爲刑事罪行，導致迫害或死亡，則沒有人會敢表示意見了。

歷史作判斷

我們確信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在22—23年的大爭論之中是持正確意見的，但我們不會要求蘇共中委會或是最高法院宣佈這點。這要留待歷史作判斷，留待革命工人和知識份子作判斷。但當權者必須承認對莫斯科審判案被告的罪行指控、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平反莫斯科審判案受害者的問題，在蘇聯成爲公開、激烈的政治戰鬥。當權者面對的問題是，在法律上平反各受害者，即同時代表着對斯大林、斯大林主義和1923年到38年以至53年的「總路綫」的轉變的裁決。它同時也是對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的限度作裁決。

這表示對超過半個世紀的蘇聯、蘇共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部歷史作批判式檢視。這樣的檢視

也會反映出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淵源和性質。

官僚架構之內的派系不接受這個檢視，是不足爲奇的。他們的陰謀反對行動，據報甚至包括將30年代到50年代的司法檔案，以每個月5千份的速度燒燬掉

除了這樣令平反冤案受害者更困難之外，還有人不斷企圖局部「平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有系統地輕估斯大林在人權、共產主義運動、經濟、軍事、思想和文化各方面的罪行所造成的後果，高捧30年代的「光明面」。

戈爾巴喬夫也數次作出類似的言論，例如說「斯大林主義的名詞，是共產主義的敵人所發明和廣泛地用來爲蘇聯和社會主義抹黑的」。這不正是莫斯科審判案的意識形態起點嗎？

這場辯論已更公開地表現出來。《文學報》刊登了一些來信，支持拉巴可夫的著名小說，該小說激烈譴責斯大林時期的恐怖。另外一些來信則指責這小說「有害」，甚至要求制裁拉巴可夫。

這辯論也導致公開對峙行動。87年3月，一個大學教授在有數千人參加的公開演說中爲斯大林辯護。大部份聽衆作出不滿的反應，紛紛發問和抗議他。很多人指出他們的父親死在勞改營、母親被流放。

87年6月，蘇共青年團組織了公開討論會，主講者是歷史文物學院院長阿法納西夫，是鼓吹批評斯大林的主要人物。聽衆從爆滿的會場提紙條發問。其中一條問他是否同意發行托洛茨基的作品，他表示同意。對於聽衆譴責斯大林是罪犯，犯了禍害人類的罪行的意見，他沒有表示意見，但他同意建紀念碑來紀念被斯大林迫害的人。聽衆爆發持久的掌聲；人們的面

色凝重而堅決，彷彿在說：「我們已等了太久了，現在是時候了。」

我們不能讓蘇聯這些勇敢的人孤立地鬥爭。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有責任全力支持他們爭取眞相和正義的歷史鬥爭。這不但是最基本的責任，而且是由於審判案的受害者差不多全部是國際戰士：很多是當初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或外國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領袖。在莫斯科審判案期間，很大部份的國際工人運動沒有履行這個責任。今天不能再重覆這個錯誤。

檢討蘇共歷史

阿法納西夫呼籲檢討蘇共歷史教材，舉例指出列寧的臨終信件和文章很少被提及，但對它們的冗長評論却不少，更被一面倒地引用，對反對派的正面評價被刪去。

他的立場受到某些歷史學者的猛烈反擊，他們不但要維護自己的著作，也要保護整批官僚層的利益。因此，他們重覆對反對派的污衊，特別是對托洛茨基的污衊，指他企圖以武力推翻蘇聯政府和復辟資本主義等。

阿法納西夫迴避了誣衊托洛茨基的問題，顯示了戈爾巴喬夫派的矛盾和局限。但他也反駁了「面對將來的任務不要討論過去的問題」的言論。他指出：當黨領袖之間的意見爭論被說成是敵人的陰謀、反黨、反革命，當政治分歧被狂熱的刑事控罪代替時，社會主義民主是沒可能的。」

另一名作家更表示：「如果剝奪了眞理，我們的

道德教育便會失去它的品質。胡言惑衆的人仍然存在。很大程度上由於他們的行動，我們最好的工人被靜靜地貶抑、流放；他們建立各種公開和秘密規例，壓抑對他們有害的事實。」

其他學者也作出精確的結論；例如一名作家說：「斯大林比任何其他人對俄國革命運動造成更大的創傷」；詩人葉爾塞科說：「沒有記憶的重整，便沒有重整」；《文學報》說：「面向着過去，是爲了對現在折磨我們的問題取得答案。」

事實上，戈爾巴喬夫改良派提出的兩個主要問題是：1、在勞動群衆作出這麼多的犧牲之後，我們怎樣走到目前的停滯狀況的？2、我們怎樣走出困境，而在幾年內不會再跌進危機之中？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無可避免地與蘇共和蘇聯整個歷史聯繫在一起。它追溯到斯大林主義和20年代的辯論，特別是新經濟政策的命運和矛盾，以及資本主義的全球發展等問題。它也走到「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問題和「托洛茨基主義」問題。它還包括討論的內容和形式，即如何地討論。所有這些帶出社會主義民主和工人權力的問題。這正是令整個官僚層驚恐和令戈爾巴喬夫猶疑的問題。

〔小點摘譯自《國際觀點》第128期〕

一次歷史性的勝利

——第三次莫斯科審判被告獲恢復名譽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曼德爾

1988年2月4日，蘇聯最高法院在司法上平反了1938年第3次莫斯科審訊案的所有被告（前格別烏首腦耶各達除外）。這是一次重大的勝利，是蘇聯人民、蘇聯無產階級、國際工人階級的重大勝利，更是托派運動的重大勝利。

1936年至38年期間，譴責3次莫斯科審訊案是基於謊話、誣衊、捏造事實的，幾乎只有托洛茨基同志、西道夫同志和他們的一小批同思想者和同情者，而當時他們在整個國際工人運動中幾乎是完全孤立的。他們譴責審訊當局不擇手段迫供（今天我們知道當時大量使用嚴刑迫供），然後用這些供詞作爲主要罪證。這個手法甚至還被提升到一般司法理論的平面，在蘇聯大學裏教授了20多年。

當然，有可能即使托洛茨基沒有作出努力，眞理遲早也會取得勝利。但由於托氏作了努力，斯大林的謊話和誣衊很快就在不是盲從、不是玩世不恭的人面前暴露，致令歷史眞相能更快得以恢復。

1956年赫魯曉夫向蘇共第20次大會作的「秘密報告」，爲1988年2月4日蘇聯最高法院的判決舖路；

第3次莫斯科審訊案所有被告在30多年後終於洗脫罪名。這項判決對於托洛茨基和西道夫在1936年夏天開始進行的鬥爭——保衛建立年青的蘇維埃國家的老布爾塞維克的名譽——殊有意義。

斯大林的清洗殺害了1百萬共產黨員

最高法院宣佈第3次莫斯科審訊案提出的控罪——「間諜」、「恐怖主義」、「暗殺」、「密謀」推翻蘇聯國家和黨領導層等罪名，都是虛假錯誤的。最高法院這次宣佈，不僅平反了布哈林、里可夫等人，而且等於宣佈斯大林、維辛斯基、約黎貝利亞（當時的格別烏頭子）和他們的同黨，劊子手等是大屠殺的兇手。這些罪犯利用3次虛假的莫斯科審訊，來進行蘇共黨內大清洗，因而約有1百萬共產黨員被殺害，或是在牢中死去。斯大林將會在歷史上留下該隱的標誌，成爲人類長久、悲慘的不人道歷史上其中一個最罪惡昭著的人。

多少無辜的人蒙受了誣陷和苦難，結果原來是寃枉的。儘管千千萬萬的書本和報刊散佈謊言，但眞理始終戰勝了。機會主義者應受到怎樣的教訓！我們不可動搖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也得到了確認，這信念就是：不論是什麼形勢，不論是什麼逆境，都應堅守原則。我們唯一覺得遺憾的是，1936—38年那勇敢的少數人，不能活着見到他們從未懷疑過的勝利。

但是那些幾十年來不斷重覆謊言和誣衊，打擊老布爾什維克、打擊我們運動的人，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他們今天站的可耻位置，是殺害共產黨人的兇手的辯護士和同謀。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編纂

莫斯科審訊案的謊言、誣衊）來教育成員、教育同情者的人，犯了的罪是毒害和毀滅了兩代共產黨員的批判思想。這些人起碼要進行公開的、明確的自我檢討，並公開澄清，親蘇和毛派報刊曾用了無數次的「希特勒——托派」這個詞，是徹頭徹尾的誣陷。

爭取平反的運動要繼續努力

但這只是勝利的開端。蘇聯最高法院只是在司法上平反第3次審訊案的被告，不是第1次和第2次的被告。

這不是偶然的。批判者的壓力，加上戈氏路綫與布哈林接近，因而平反第3次審訊案被告的問題不那麼辣手。但對於官僚統治層來說，要平反第1、2次審訊案的被告是非常辣手的；因爲左派反對派和聯合反對派的政治立場鮮明，平反托洛茨基、西道夫等，也就要讓他們的著作有權發表、流傳和公開討論。

的確，已被恢復名譽的包括克列斯京斯基，他是托洛茨基的密友和同道者，也是十月革命後第1屆政治局的成員，儘管他從未是左派反對派的正式成員。而且，在88年2月4日被恢復名譽的，還有我們偉大的賴可夫斯基同志，他是托洛茨基最親密的朋友，又是左派反對派中繼托氏之後最重要的政治領袖。

因此，我們必須盡力推動爭取3次莫斯科審訊案的被告在司法上獲完全平反的運動，這包括在第1次審訊案中被控的托洛茨基和西道夫同志。

我們要盡力推動的運動，是要令工人運動中所有使用謊言、誣陷、捏造的指責等手段，都被一一掃清，用暴力手段來解決思想分歧的手法，也被掃除。

今天，在全球，我們是唯一的共產主義者，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的旗幟是潔淨的。在20世紀最黑暗的日子裏，我們維護了共產主義的名譽。讓我們用1968年5月的口號精神前進，高喊：「這只是開始，我們會繼續戰鬥！」

（黎思譯自≪國際觀點≫1988年2月22日）

莫斯科承認斯大林謀殺托洛茨基的罪行

（一九八九年二月）

沃　特

據路透社最近從莫斯科的報導，一個知名蘇聯歷史學者在一份流行的周刊披露了斯大林在托洛茨基被謀殺案的責任。N。華識斯基在《文學紀要》之中說：「或者是他〔斯大林〕作出決定，或者是他讓他的隨從知道是了結托洛茨基的時候了」。身爲官僚內部有高位的資深歷史學者，華識斯基無疑可以接觸只限極少數特權階層知悉的檔案。他點名工。埃庭共爲蘇聯秘密警察在1940年暗殺托洛茨基的策劃者，指他在機關槍襲擊托氏住所失敗後，招募和訓練R。米卡達成功在托氏書房刺殺托洛茨基。

米卡達被托氏的護衛捉到後，在墨西哥監獄服刑20年，其後在布拉格和莫斯科居住，據報獲得「蘇聯英雄」獎。他在1978年死於夏湾拿，遺體葬在莫斯科附近一個墓場。

直到戈爾巴喬夫的「開放」時期，官僚居一直否認對托洛茨基之死負有責任。嘲弄地說他被自己一個幻想破滅的追隨者殺死。

我們開始研究托洛茨基

（一九九〇年春季）

維克托爾。丹尼洛夫

在最近30年中，維克托爾。丹尼洛夫成了一位日益著名的、土生土長的、研究俄羅斯農村的歷史學大師。他早年關於集體化的著作贏得許多學者的好評，但同時也使許多頭面人物對他切齒痛恨。他富於批判精神，不肯苟同，他要分析證據，而不願沿用官方預定的眞理。他對農民的興趣是受人懷疑的。共產黨的出版物攻擊他，而且終於撤銷了他在蘇聯歷史研究所中的科長職務。雖然遭受科學院種種限制，他仍然頑強地進行自己的工作，因爲不能再對集體化問題做進一步的研究，他就集中精力去研究1921—1928年的新經濟政策。他背着"完成計劃"的沉重包袱，用盡所有陳舊的資料，决心對俄國農民進行廣泛的深入的研究。他忍受着蘇聯學閥對離經叛道者的經常侮辱，禁止他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薪金待遇很低，不准他和大學生接近，等等。但他沒有屈服，在那困難的日子裏，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性格幫助了他。他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又是戰時的軍官。盡管他對祖國及執政黨十分忠誠，但給他的回報却是官僚的惡意。不過，他是一個有分析天才的人，又有頑皮的幽默感，所以對一切遭遇都付之一笑。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給丹尼洛夫之類的人物帶來了變化。這種變化，不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生活上，都同樣重要。丹尼洛夫投身於他所關心的問題之日益

公開的討論之中，大學生們要求聽他的課。國際學術會議和全世界各地的大學都爭着邀請他。但有趣的是，這個新時期並沒有減少他的好辯性，他仍然置身於新的爭論之中，沿着新的政治光譜和同事們爭論。他反對一切以輕信爲根據的簡單答案、主張和說明，他反對新的教條和老的種族主義。實際上，這些變形的知識上的機緣和戰鬥，很明顯地給丹尼洛夫的生活提供了一個新的起點，也給他的學術活動提供了一個新起點，使之衝破學院式的藩籬，成爲每日出版物中和馬路行人中的羣衆性的爭論之主題。

在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的聽衆不斷地要求聽丹尼洛夫關於農村歷史的專題報告。這是一個大題目，是目前供應危機的根源，也是和鎮壓有關的道德危機之根源，丹尼洛夫的研究範圍也迅速擴大了。例如，在1989年進行有關布哈林的爭論時，歷史“抉擇”問題是當代蘇聯如何認識自己的中心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丹尼洛夫在提供事實和進行分析這兩方面都有貢獻。正是這位俄國農民問題的偉大分析家，正是這位被科學院官僚們懷疑爲平民主義者的人，對於恢復托洛茨基作爲蘇聯初建時一個主要革命領袖的身份問題提出了挑戰。這雖然有些諷刺意味，却也不是偶然的。有些人頑固地拒絕承認托洛茨基的眞實面目，却把他看成一個“革命惡魔”。丹尼洛夫發動一個辯論，以反對這種頑固意見。丹尼洛夫指出一個事實，托洛茨基早於列寧一年實實在在地提出了新經濟政策的綱領。這個問題是許多人根本不願提及的。而丹尼洛夫偏偏提出來，很使這些人惱火。這是一個對蘇聯公認觀點，也是西方公認觀點的一個駭人聽聞的翻案。現

在，丹尼洛夫對最後一個需要政治平反的人的研究還產生了一個附加的結果，他發現了一個文件，能破釋托洛茨基政治生活中一大啞謎，並解決了一向認爲無法解決的問題。

下面就是這個文件的概述。它回答了一個問題：爲甚麼托洛茨基拒絕作列寧的正式副手，不肯擔任蘇維埃政府副主席的職務，這次拒絕的後果是巨大的。這篇文章是蘇聯歷史學這門學問中的一個巨大步驟。這當然要引起對作者的仇恨和汚衊，但也得到那些重視歷史眞實性的人們的尊敬。這是一個好的信號。在新的蘇聯，即戈爾巴喬夫的蘇聯，那些懷有非正統觀點，而具有知識分子勇氣的作家，雖然會遭到攻擊，但不能阻止他們發表他們的見解。這個國家能有一個好未來的希望就在這裏。

我們開始研究托洛茨基 ①

蘇聯歷史出版物中使用“回歸”這個字眼已經3年了。它標認“改革”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在斯大林統治時期被消滅的和被“永遠”誣陷的人物的名字，觀念和著作又回歸到私人意識中和公共意識中。

拖在這個潮流後面的是列夫·達維道維奇·托洛茨基。他實在是革命布爾什維克領袖被牽涉到政治平反案中的最後一人。他的“回歸”面臨許多困難，甚至面臨公然的反對，這也是不足怪的。數十年的恐怖和鎭壓打進我們腦中的“反托綜合症”，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從我們意識中消失。托洛茨基是第一號“人民

公敵”，也是最重要的“人民公敵”，他的名字和十月革命以來蘇聯人民所遭受的一切不幸牽在一起。

而且，除此之外，我們還看到一個倒退現象。因爲平反積蓄了衝力，所以斯大林主義灌進我們社會意識中的仇恨心理，尋常是平均分佈在所有的“人民公敵”身上，現在却加重地集中到一個人身上，即集中到第一號“人民公敵”的身上。自從放棄1920年新經濟政策以來的一切事情，如“超工業化”，“全盤集體化”，消滅富農，及血腥的恐怖，都應由他一人負責（當然有時也加上兩三個名字，偶然也添上四個或五個名字）。他們說，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教父”，斯大林不過是一個“脫去托洛茨基主義的外衣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托洛茨基本人只是一個“失敗的獨裁者”，他的反斯大林鬥爭是“協助斯大林把繩索套在黨的脖子上”（當然也套在他自己的脖子上）。正是托洛茨基“把斯大林扶上台”，提供一個“領袖雕像底座”，如此等等。

在布哈林的案子中，報刊上對托洛茨基的最新評價，顯示了一個奇怪的歷史錯位。說到反革命官僚獨裁制的確立，斯大林的對手變成斯大林罪行的同謀者，變成了斯大林主義的共同創始人。新近關於“斯托雷平的選擇”及克倫斯基“合法政府”的看法改變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偏離。對於這些人，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是一丘之貉。但對於尊重十月革命信譽的人，這種看法却是不適用的。

在各種不同流派的新近著作中，對於托洛茨基的否定，有一個主要共同點，就是把1922—1929的黨內鬥爭都看作自願參加和不自願參加者之間的權力鬥爭

（爭領導權，爭獨裁權等等）。作者們在這一點上一致性顯示了他們有共同出發點和共同實際目的，一切都是按斯大林對事件的解釋（本來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解釋），這些解釋都是黨機關向他們蒙騙兜售的，是和官方文件密切配合的。這種解釋的新版本只不過是賦予斯大林神話一個新生命而已，實實在在具有相同的含義，就是把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降低到斯大林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否認他們之間對社會問題的理解上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上有深刻的分歧，而且宣稱，他們全都抱有同樣的自私的獵權家的野心。

這種斯大林的神話是蘇聯社會意識中"反托綜合症"的支柱。揭發並克服這種斯大林神話的任務，必須用歷史研究的正常程序來完成：即對所有新公布的文件作盡可能最廣泛的傳播，研究和討論。在1989年，看來我們終於邁出了對托洛茨基進行正確認識的第一步。

不妨回顧一下幾個具有歷史重要性的事件，六十二年來第一次在蘇聯出版物上發表了托洛茨基的著作。是些何等的著作啊！其中包括幾種最尖銳、最具特性的著作，如《新路綫》，《斯大林的造謠學校》②。而且今年也開始研究蘇聯檔案中有關托洛茨基的資料。蘇聯的歷史家也開始涉獵國外的托洛茨基檔案，其中包括托洛茨基本人移交給哈佛大學豪格頓圖書館的檔案（當然，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這些研究才能有圓滿的結果供人使用）。

最後，在1989年，《回聲》雜誌還發表了布魯耶專著《托洛茨基傳》一書的摘要。這是第一次公布我

們外國同行研究托洛茨基的成果。這些外國同行能對我們這邊禁止研究的題目進行研究，而且成績很大。這是一個萬分重要的工作，無知使我們容易受各種錯覺的毒害。出版國外最好的著作，可以幫助我們，在我們的研究結果尚未公布之前，就能消除或減少各種錯覺的有害影響。在閱讀斯狄芬。高亨≪布哈林傳≫③的俄文譯本時，我們才知道，這些著作是何等地重要。今天，閱讀布魯耶的≪托洛茨基傳≫，也同樣重要。

布魯耶對這位傑出的20世紀革命家的學術遺產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已經寫了幾本關於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歷史的書，也寫過關於歐洲革命的書。他這本關於托洛茨基的大部頭專著是這種研究的總結，也是幾位著名前輩，如艾薩克。多伊徹，羅伯特。丹尼爾和米沙。列文等人的學術成就的延續。

≪回聲≫雜誌主編人對布魯耶這本著作的第一個摘錄是關於"軍事共產主義"和恐怖的一章。這個題目在蘇聯曾引起過很多爭論，也引起過許多對托洛茨基的惡意批評。但在布魯耶篇章中，托洛茨基才第一次不僅以大家熟悉的軍事共產主義傳奇人物，革命戰爭的理論家和實行家等等的面目出現在蘇聯讀者的面前，而且表露他對革命暴力的眞實態度，及對社會主義轉變的任務和方法的態度。他對托洛茨基的新看法是很重要的。這新看法是；托洛茨基在1920年2月已經建議，放棄鄉村中的軍事共產主義政策，用一種實物稅來取代餘糧徵集制。

在過去數年中，有許多人企圖在我們報刊中貶低這個建議的重要性，說這不過是一種技術性調整，對

本質不能有任何改變。他們這種見解是毫無根據的。我們只要讀一讀托洛茨基的《工農業政策的根本問題》④這份文件就知道了。這份文件是他1920年2月提交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1926年才公布。這份文件首先指出，工業政策在經濟上根本無效，因爲這種政策的立足點是"對超過消費水平的剩餘物資的徵發"，這種政策驅使農民只在土地上生產僅足供一家吃飽所需的東西。就根據這一點，托洛茨基指出："我們的生產資源將趨於枯竭，而僅靠改進徵發機關的工作是不能遏止這種趨勢的。"他進一步指出，剩餘物資徵發制度"勢將造成我國經濟的破產。"

爲了遏止這種"經濟惡化"，托洛茨基建議：(1)以固定百分比的實物稅取代剩餘物資的徵集，使最好的耕作還有利可圖，(2)給與農民的工業品供應量應和谷物播種量掛勾，不僅在農業區及農莊如此，對每個農戶也要如此。"

他又建議，農民應從地方企業那裏獲得貨物，原料或燃料，作爲起碼的"部分賠償"。他還建議，對國營農莊的供應必須更慷慨，更經常，更有效，這樣，"對農民的課稅就能鼓勵土地的集體耕作。"

雖然這些建議有時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對餘糧徵集制却持一貫的否定態度。正是這個改變政策的建議造成了政治局中投票反對托洛茨基的局面。要貫徹執行這兩個建議，必然導致承認並接受市場關係，以達到活躍農民經濟的目的。這當然要成爲1921年新經濟政策的起點（雖然在1921年還計劃限制農村中的市場關係，但已經通過貨物的，或更確切地說，產品的交換來建立農村和工業之間的經濟聯系）⑤。

在這個關於托洛茨基的新經濟政策觀念的分析中，布魯耶令人信服地證明，托洛茨基的見解同列寧的見解十分接近。現在只就布魯耶對這個問題的最重要觀察來談談吧。對於托洛茨基和列寧一樣，十分清楚，"新經濟政策並不是同歐洲革命分離，而是一次重要的退却……是爲了提高俄國的生產力。"依照托洛茨基的看法，鄉村中走向社會主義的運動就是"把農民引入社會主義經濟的總體制中"，首先就是"改善農民的經濟生活"。

有人會問，這種語氣同新經濟政策開始時黨領導們的政治講話不是同樣的調調嗎？

不久之前《火花》雜誌發表了里昂尼德·克拉辛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是控制還是生產？》在這篇文章中，他出色地證明了生產中單純行政管理方法的失敗，而主張採用經濟方法和市場方法。這篇文章後附有經濟學家鮑波夫的措詞激昂的按語，他支持克拉辛的正確立場。但在當年，這種立場會遭到所有人的反對，按照當時流行的傳統，托洛茨基也提出了批評⑥。

但是，如果因此而認爲，克拉辛和托洛茨基是互相反對的，却是毫無根據的。實際上，他們兩人的觀點十分相同。克拉辛的文章發表在1923年3月的《眞理報》上。在四個月之前，即1922年12月13日的《眞理報》上曾發表列寧，加米涅夫，季可夫，皮亞特考夫和斯大林共同簽名的一封信，承認常規會計制度的必要性。信中說：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工農檢察院就變得毫無意義，常規會計制度是一切。工人農民市場就是工農監

察，這不是一個欺騙性的監察，而是硬邦邦的實事求是的監察，只要記下結果，計算一下收入和支出，就能算出盈虧。對於國營企業，只需要常規的會計制度。這種會計，不僅要準確，而且要一律。⑦

這個文件表明，克拉辛的意見，雖然很正確，但沒有甚麼了不起，而且不是獨一無二的。在黨領導和政府領導中，有很多人，包括托洛茨基在內，都是這個有關未來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時髦討論的參加人，也可以稱之爲反斯大林主義的討論。

出現於《回聲》雜誌上的布魯耶的這本著作的數章，主要是談論1922—1924年，談論黨內鬥爭最重要的階段，這時，托洛茨基是眞正的中心，也就是在這時，托洛茨基迅速地打了敗仗，而且一蹶不振了。發動這次戰爭的是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三人幫”。對於“三人幫”所採用的方法，以及那些聲明，信札，論文，講話等等的內容和始終一貫性，以及托洛茨基自我防衛的軟弱無力，就不必去重述了。布魯耶對這些事都有詳盡的客觀的描寫。現在我們只看一看有關托洛茨基行爲上兩個特別神秘的插曲，這也是所有的研究者都會注意到的。其所以神秘，是因爲現有可用的文件都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說明。

第一個插曲是，他拒絕了列寧要他擔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的建議，這個職位將使他成爲列寧的繼承人。第二個插曲使人更難理解，就是他無視列寧的指示（實在是私人的請求），沒有在那個即將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來捍衛他和列寧關於“格魯吉亞問題”的共同立場。列寧萬分重視這個問題。列寧在反對斯大林及捲入格魯吉亞事件的其他政府成

員的鬥爭中，準備“把問題提交黨代表大會，因爲繼續模棱兩可是絕對不能允許的。”⑧

托洛茨基拒絕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曾被人引用來證明“三人幫”對他的指摘，說他期待得到更高的職位，甚至說他有邦拿巴特主義。“三人幫”以會議是“三人幫”對托洛茨基1923年10月 8 日給中央委員會的信，和黨內反對派在同年提交的聲明，也就是≪四十六人的信≫的一個答覆。

直到今天爲止，所有的研究者都還沒有在托洛茨基檔案的文件中，或他在報刊上所發表的短評中，或他的自傳著作中找出任何證據以揭示這些年月裏在蘇聯黨領導的最高層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所以當布魯耶斷言托洛茨基，由於感冒和發高燒而未能參加這些會議，也就不值得驚異了。但事實上，這三次會議的每一次他都出席了。從他在簽到簿上的簽名，從他所出席的會議的正式記錄，可以證明他的到會。這些記錄中記載了他的出席，他的講話和他的投票（由於他自己的請求，在投票時記下姓名）。在10月25日，緊跟斯大林報告（時間從 6 點35分到 7 點10分）之後，他講了話（時間從 7 點10分到 7 點55分）。在10月26日，經過一番辯論之後，這兩個主要對手都作了總結性發言（托洛茨基從10點33分到11點25分，斯大林從11點25分到12點10分）。可以假定，托洛茨基在那一天發表了他的個人聲明。最後，10月27日，他站起來，對保加利亞局勢和德國局勢，對“關於列寧健康情況的最新通報”發表了講話。隨之，他參加最後決議案的表決。表決記錄上有一小注：“34、托洛茨基投贊成票。”

也只能如此。這次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

關於托洛茨基的“地位”和“等級”的爭論代替了黨的委派工作如何進行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黨和蘇維埃制度的官僚化問題。

托洛茨基不插手於格魯吉亞問題，還產生了更嚴重的後果。布魯耶的結論是，因爲他拒絕發表他和列寧商定的講話，並把列寧交給他的有關格魯吉亞的文件交給加米涅夫（當然就等於交給斯大林），托洛茨基就放棄了反對黨的官僚主義化的鬥爭取得勝利的一切希望，這就保證了斯大林和奧爾忠尼啓則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他因此也就陷入一個無法向斯大林解釋他的“隱秘性”和他爲甚麼未能執行列寧指示的困境之中。他謀求和“三人幫”妥協，這就意味着，他已實際上放棄了他的陣地，因此判定要失敗。對於一個大政治家來說，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不論是在現有的已公布的1922—1923年的文件中，還是在他最後的著作中，托洛茨基都沒有對這個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答案。但有一個文件却揭示了他的做法的動機和他當時所處的境地。這個文件的性質和出處都不同尋常。據我們所知，這是托洛茨基關於他寧願保持沉默的事情所講的話的唯一記錄。這就是他在1923年10月25—27日在那次有十個地方黨組織代表參加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所作的總結發言的摘要。正如布魯耶所正確指出的，這次的聯席會議有彼得格勒，莫斯科，伊凡諾渥，伏茲涅辛斯克，下諾夫哥羅，哈里科夫，頓涅茨克，葉卡特林堡，羅斯托夫，巴庫和圖拉的黨組織代表參加，其“議事日程的第一項”（也是唯一的一項）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在黨內的地位問題和關於他的信”。這個

大型會議所最後通過的决議中包含下列標題："A、關於托洛茨基同志和四十六位同志（卜列奧勃拉仁斯基，奧辛斯基，薩勃朗諾夫等人）的聲明"及"B、關於黨內民主"。這個决議案的全文直到今天還沒有公布。

因爲這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沒有採用速記術記錄，所以我們不可能從會議記錄中獲取這些發言的全部內容，因爲這些記錄十分簡略，只記下發言人的名字，决議的本文及一些問題的提出。我們不妨假定，托洛茨基的總結報告（及卜列奧勃拉仁斯基的發言）都是根據他們寫給中央委員會的聲明，因而在檔案中沒有保存這個報告和發言的記錄。看來，在托洛茨基的個人檔案中也不大可能保存這最後發言的書面文稿，因爲這只是爲了直接答覆對他的譴責而臨時作出的，是沒有準備的。但是，從這次會議保存下來的資料中，却有托洛茨基發言的"摘要"。這個"摘要"是斯大林的助理巴贊諾夫寫的。他對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最後發言都作了尋常的快速筆記。這些筆記是準備作爲文件而公布的，標題是"有十個地方無產階級黨組織代表參加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托洛茨基同志和斯大林同志最後發言摘要。"

這裏只保存斯大林發言的草率的文句。大家可以推想，如果從檔案中已抽掉了他的發言，這些未經校正的筆記也應該抽掉。這些"摘要"顯然是斯大林授意之下寫出的。但是馬上就發現，不可能用這些東西來反對托洛茨基。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三人幫"才透露這次會議上所通過的决議，以及托洛茨基在黨的最高層中遭到譴責的事實。

托洛茨基顯然不知道他的發言還有這個“摘要”，不然會改正它的文句，而且要在他的檔案中保留一個副本，正如他尋常所做的一樣。但是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巴贊諾夫的“摘要”，因爲它十分完全地表達了托洛茨基發言的誠懇性和堅定性，同時又那樣致命地透露了那種局中有局會中有會的醜聞。希望不久之後能出版這個“摘要”全文的學術性版本，並且附上全面的註解。我們現在只引用其中的若干節，以說明托洛茨基的行爲，特別是前面提到的那兩件神秘的插曲，以及他對自己1922—23年的處境的估計。

在今年年底，國內形勢的眞實情況證明我對我國經濟基本事實的看法的正確性。我現在再一次提出這個問題。說我沒有在政治局中提過這些問題，這是百分之百的謊言。我確確實實提過。現在讓我們看看後果……因爲在政治局中還存在另一個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中還存在另一個中央委員會，我被排除在這些問題的重大爭論之外，而且不能向其他中央委員探詢有關情況。因此，我只有一條路可走（丹尼洛夫註：即說只能寫信給某些中央委員）。

季諾維也夫同志說，我拒絕了他通過謝列勃里雅考夫同志向我提出的談判。是的，我回答謝列勃里雅考夫說：“我們是不是再來一個“五人幫”，即在現有的“三人幫”上面再加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如果季諾維也夫想恢復正常關係，“三人幫”和“五人幫”兩者都必須解散。”

你們會問，我爲甚麼不把問題提交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成員都知道有關反對

"托派"的鬥爭的許多事情。"托派"這頂帽子是送給一切不肯積極反對托洛茨基的人們的，我確切知道，對"托派"兩字不會再有其他定義。我從來沒有把中央委員會中的分歧當衆宣揚過，我從來沒有向其他黨員報道過這些事，也從來沒有試圖搞一個單獨的小組織或派系。中央委員會書記處認爲，凡不積極反對托洛茨基的人都是"托派"，而書記處的這個政策是由古比雪夫同志督導執行的。雅羅斯拉夫同志也支持這個政策，而現在，主持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正是古比雪夫同志和雅羅斯拉夫同志。

同志們，請記住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指導原則。這個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的，完全公正的機構，它應當糾正我們工作中的失誤及不當之處，整治黨領導人所犯的暴亂行爲。

我認爲，我們已經把中央監察委員會變成中央書記處進行黨內鬥爭的武器。你們歪曲了伊里奇的思想，他的思想應當成爲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靈魂。

同志們，現在我們談談邦拿波特主義，這是政治局某些成員的信中對我的控告（加米涅夫插話："信中沒有使用這個字眼。"）……在政治局某些成員的信中說，我想擴大我"在軍隊中及最高經濟會議中的無限權力"……每一個人都知道，所有的軍事委任都是由組織局和政治局經手的。請看一看軍隊中領導人員的委任情況，對我進行這種控告，其目的顯然是爲了欺騙外省。你們難道不清楚嗎？……凡是能同我一起工作的人

都被撤換了，而代之以積極反對我的人。現在我的處境是完全孤立，這就是你所說的“無限軍事權力”。

現在談一談最高經濟會議。我沒有拒絕到最高經濟會議工作，我能同一些同志一樣好地在會議中工作。當布哈林同志找我談話，要我到最高經濟會議工作時，我沒有對他說我反對這個意見，我只是說，把這工作同軍事工作結合起來，是萬萬不可以的。

同志們，現在我向你們談一談我同伊里奇關於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職務及關於其他問題的談話。同志們，關於我的職務，我有一種個人的想法。這就是，不管做甚麼工作，對於我的私生活和日常生活都沒有甚麼影響，但却有很大的政治意義。這就是我的猶太血統問題。我清楚地記得，10月25日（1917年革命的那一天）在斯摩尼宮的樓上，伊里奇對我說：“托洛茨基同志，我們必須叫你作人民內務委員，你將粉碎資產階級和貴族。”我拒絕了。我說，我的意見是，沒有必要給敵人一個藉口。我說：“最好在我們的第一個蘇維埃革命政府中沒有一個猶太人。”伊里奇說：“一派胡言，全是廢話！”但是，我的話還是發生了作用。我沒被任命爲人民內務委員，而作了人民外交委員。老實說，我也同樣不願意擔任這個職務。

當我們必須創建武裝力量的時候，我又被選定去搞這個工作。我可以說，我是更加反對擔任人民軍事委員的職務。同志們，在做了這個領域

中的一切工作之後，我可以滿懷信心地說，我那意見是對的。……請回憶一下，在尤丹尼奇，高爾察克，佛蘭格爾各次大戰役的危急時刻，我們的敵人就利用這個事實，說，紅軍的頭頭是一個猶太人。這對我們是大大不利的。同志們，我重說一句，這對我的私人生活毫無影響，但在政治上却非常重要。我總記得，伊里奇說，這一點完全是我個人的心血來潮，他在同我談話及和其他同志談話時經常提到這一點。當伊里奇要我做唯一的副主席時，我堅定地拒絕了他的建議，理由和以前一樣，不能給敵人一個機會來說：我們的國家是由一個猶太人來統治。我想伊里奇是和我同意的，雖然他還是說“一派胡言！”但我感覺到，他這次講話時，沒有那麼多的信心了，而且他私自表示和我同意。

現在，讓我們回到黨內情況問題……我對於民主並無專利權。但我在離開兩個月而又回來時，使我不得不仔細研究這個問題。事實本身驅使我說……

情況必須解决。或是有更多的黨內民主（我不會像布哈林同志那樣說，必須來一個“急轉彎”，但無論如何要轉彎），不然我得承認一切都好。他們說，是我編造這一切，以便建立一個小政治集團。甚麼時候？抱甚麼目的？在甚麼地方？或者在軍隊裏？同志們，把這些控告推到它的邏輯終點，就是邦拿波特主義！

同志們，我要坦白地說，在我們政治局中是有幾個人想把它推到邏輯終點。他們堅决地擴大

我們之間的分歧。他們想把問題搞成黨籍問題，使我們將來也不可能在一起工作。

請嘗試了解我的處境。我是在一個萬分困難的條件下從事工作。有些人製造一些印象，好像我反對伊里奇的傳統，但我却不能說話來反駁他們。同志們，我是處在一個險惡的困境之中，一個眞正悲劇般的困境之中。當套在我身上的網越拉越緊的時候，我簡直無法爲自己辯白，不能向任何人講出實情，也無法回身反鬥。我必須衝出這個網。

在這個時刻，可能是世界歷史上最危急的時刻，如果有人懷疑我有個人野心，有一個人獨自承擔這巨大責任的可笑願望，那就是把我當作一個雙料的惡棍，一個十足的瘋子。

同志們，在通過這個決議之前，請想一想。如你們要走這條路，如你們打算做的那樣，你們將造成一個巨大的錯誤。

如果這段摘錄能給讀者一個機會去評價這篇從未公布過的講話的意義，那麼，長一點也是可以原諒的。人們處在一個眞正悲劇的時刻，就是要這樣講話的，在這個時刻，不僅他們個人的命運由此決定，而且他們出生入死所進行的全部事業，即社會主義和革命的命運也由此決定了。

娜杰施達·克魯普斯卡婭曾出席這次會議，她寫信給季諾維也夫說："一切無分寸的語言"，"個人爭吵和口角"，這種氣氛使托洛茨基在心理上不可能繼續工作，"她對濫用伊里奇的名字也非常生氣。她私自向季諾維也夫表示，"對伊里奇的話的引證是不

適當的，也是不眞誠的……那是純粹的僞善。”⑨在這種氣氛中，托洛茨基企圖爲自己辯白的那種眞誠的同志般的態度顯得那麼笨拙。他的講話完全證明了布魯耶對托洛茨基1917年以後行爲的總趨向的觀察：“他們在討論他的黨……他對黨的團結有強烈的興趣。”這些話是布魯耶從《新路綫》中引出的，《新路綫》這篇文章是在十月中央全會不久之後寫的，是早自1920年以後托洛茨基態度的確切總結：……”黨的重心……是黨內生活的活躍，批評的獨立性和自我管理……。”使我們驚異的是，這些話概括了六十年後的“改革”所提出的完全相同的任務。

托洛茨基同志在他10月26日的講話中，令人信服地表白，他一生缺乏個人對權力的野心。他把有這種思想的人看作“雙料的惡棍”和“十足的瘋子”。但斯大林却需要證實一個神話，說，20世紀20年代的黨內鬥爭是那些願意或不願意捲入的人們之間的權力鬥爭。通過這個神話，他既能敗壞政敵的信譽，又能證明自己的權力鬥爭是正確的。這樣就把高貴降低到鄙劣的水平。1927—1929年，這種事又重演了，那時，和斯大林相對抗的布哈林是一個天生沒有虛榮心、沒有權力慾的人。

後列寧時期（更嚴格地說應是1922年以後）悲劇的一部分就是，當斯大林奪取權力的時候（他利用一切適於幹這種勾當的“雙料惡棍”），和他對抗的人却主要是一些沒有私人權力慾而且十分鄙視這種野心的人。這樣就使斯大林能夠奪得政府的大權。這時，他的對手才“吃驚地”發現，他們“被包圍了”，並且“網子越拉越緊”，使他們“無法爲自己辯白”，

更不能“回身反鬥”。托洛茨基的信和1923年10月的講話是被延誤的“衝出網子”的企圖。列寧1923年提出撤消斯大林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的建議也同樣是太遲了，因爲在那個時候，已經沒有人能夠執行他的建議了。托洛茨基1923年3月想從鬥爭中脫身的企圖，雖然在人事上是可以理解的，却導向他的失敗和最後的死亡。反對個人權力的鬥爭也總是爲權力而鬥爭（當然不是爲私人權力）。這是一個錯誤嗎？或是一次精力衰竭的事件？無論如何，在列寧支持下去挫敗斯大林主義及官僚獨裁制的興起之機會是錯過了。對此，托洛茨基負有歷史的責任。

（子美譯自英國《歷史工坊》1990年春季號）

註釋：

①本文初次發表於西比利亞激進的學術雜誌《回聲》1989年第9—10期。

②托洛茨基《新路綫》載於《青年共產黨員》雜誌1989年第8期，托洛茨基《史大林造謠學校》載於《歷史問題》雜誌1989年第7—9期。

③高亨《布哈林傳》俄文譯本，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④見《托洛茨基全集》（1926年蘇聯版）第8卷543—544頁。

⑤這裏附帶說一點，即是：托洛茨基的勞動軍事化思想可能產生於他的如何在缺乏物質刺激的條件下去提高生產力的研究，如果中央委員會不接受他上述的建議，而又繼續發佈命令要工人完成一定的生產任務，那時只有勞動軍事化的一條出路了。

⑥見《火花》雜誌1989年第24期第10—11頁。

⑦見邁耶≪托洛茨基檔案≫（1917，1922）第282 —283 頁。

⑧見≪列寧全集≫（蘇聯版）第54卷第325 頁。

⑨見克魯普斯卡婭1923年10月31日致季諾維也夫信，載≪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89年消息≫第201 —202頁。

托洛茨基傳略

（一九九〇年）

亞歷山大。潘佐夫

前言

關於這個人，十分難寫。他的爲人，是複雜的，多方面的，充滿矛盾的。他的遺著是浩繁的。早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他的文集已達十二卷（十四冊，按作者計劃，要出廿三卷，共廿七冊）。而這也遠非全部。目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正在準備出版一套八〇至一〇〇卷的托洛茨基文集。關於他的著作的論

【　本文作者潘佐夫，現爲蘇聯科學院國際工人運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歷史副博士。生於一九五五年。後入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學習。在該院學習時學會了漢語，是蘇聯的漢學家之一。畢業後，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國革命運動中的思想鬥爭和抗日戰爭史，也研究蘇聯革命運動史，發表過幾篇論文，其中五篇是有關托洛茨基的。現在正研究托洛茨基與中國革命這個問題，計劃寫一本書，取名「中國托派運動史」。

本文發表於蘇聯《歷史問題》雜誌一九九〇年第五期。文內小標題是《十月評論》編者所加。】

文很多，書目也有好幾十種。這些主要是在國外編寫和公布的。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們國內，却有許多人，由於對這些豐富資料的無知，却認爲，對於這個活動家的一切，我們早已知道。這事當然不能由讀者負責。應當負責的是那些從二〇年代末開始，就拿僞理論的假藥給讀者服用的人，他們所優先考慮的是安定社會，在爭論的過程中要求伙伴們的思想的一致性。實際上，這種觀念只是「人民裁決」論的巴枯寧翻版。在這種理論中，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說，要嚴格禁止青年們搞科學和思想，因爲「這些都是世俗的行業，會使青年們對一切正統發生懷疑。」

改革和公開性切實縮小了這個好鬥的教條主義的統治圈。但是幾十年積下的成見却還是很有力量的。幾代人學習幾個定理，使許多人產生一種他們能充分掌握嚴謹科學的幻想。要打破這種幻想，也不是很容易的。特別是，當這些幻想是和謊言、眞理、半眞理三者混合在一起的時候。主要的是，有了這些幻想之後，就不願意再費力氣去理解問題，自以爲，甚麼都知道了。

他們所知道的是，托洛茨基是列寧主義最兇惡的敵人，他的整個一生都是在革命運動的理論和實踐的所有問題上積極地反對布爾什維克。《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一書早已定下了這個理論的「基調」。直到今天，我國的一切著作，還是百分之百地堅持這個「基調」。一九八七年九月，作家維。米。伊凡諾夫還在《蘇維埃俄羅斯》雜誌上積極地堅持這種論調，他所打的旗號是：反對爲叛徒「小綱大」塗脂抹粉。實質

上就是反對對托洛茨基的政治傳記進行認眞客觀思考的一切企圖。

今天，隨着公開性進程之日益擴張，舊觀念也開始褪色了。早在一九八八年九月，《眞理報》上就發表了狄·阿·渦爾考岡諾夫的一篇論文，該文的結論是（雖然以十分謹愼的形式），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黨中進行積極活動的年代裏，「並不是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敵人。」一九八九年一月，在《旗幟》雜誌上重新發表了麥德維傑夫關於斯大林主義著作的第一部分。麥德維傑夫特別指出，在以後的歲月中，其中包括被逐出蘇聯之後，托洛茨基沒有進行過任何反革命的圖謀。在《文學報》、《莫斯科新聞》、《涅瓦》、《蘇維埃克里米》等報刊上又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之後，全蘇聯都知道了蘇聯內務部策劃暗殺托洛茨基的詳細情況。以後，比利卡·丹尼洛夫，考拉勃列夫，莫洛茨金，鮑德柴考金，斯比林和斯達爾采夫等人又發表了許多文章，在眞情實況的確定上，又邁開了新的步伐。在這些文章中，十分客觀地描述了托洛茨基一生各個時期的政治行爲。

與此同時，在時下充塞於報刊雜誌中的許多有關布爾什維克主義歷史的文章中，其中也包括渦爾考岡諾夫及瓦謝茨基的許多著作，托洛茨基還是時時以「惡魔」的面貌出現，說他愛革命中的自己更多於愛革命本身。有時也提到，他曾做過一些好事，但只是在總的畫面中輕描淡寫地帶上一筆而已。而大多數的文章還是堅持說到這個人的異乎尋常的無原則性。許多作家仍然十分頑固地認爲，在十月革命後的若干年中，托洛茨基表現得非常殘暴。

看了這些文章，使人不能不想起布爾加考夫劇本中的角色杜爾賓，他對他的朋友大叫說：「我們這一仗是打敗了！我們現在有另一個比戰爭，比德國人，比世界上任何東西更可怕的東西。我們這裏有一個托洛茨基。」眞的，還有甚麼東西更壞呢？我們現在著作界中的大多數人都比布爾加考夫劇本中的主角更清楚的了解，托洛茨基只能帶來暴力、血和淚。對於杜爾賓和他的同伙，托洛茨基只是政治敵人和軍事敵人的符號而已。

但是，在這一套理論中，總有點甚麼不協調的地方。特別是，當提到下面的話時：「托洛茨基同志是現時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幹的人。」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列寧會這麼沒有遠見？爲甚麼，他既然時常和托洛茨基爭論，而在臨死前的一封信中却給他以如此出色的評價？他既然注意到托洛茨基個性上的缺點（「過分自信，過於重視純行政方面的事」），又提到他的非布爾什維克主義，即在十月革命之前長期置身於布爾什維克之外，但爲甚麼又特別強調，不能把這個非布爾什維主義算作托洛茨基的「個人過錯」。

爲甚麼，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即在奪取政權的前夜，當推選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參加立憲會議的候選人時，除了其他黨員之外，又推舉了最近，即七月間和八月間才入黨的人，而又堅決地不准拉林•保克羅夫斯基和其他重入黨的人作候選人，却熱烈地主張推選托洛茨基呢？

爲甚麼，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尾，列寧認爲有必要送一個筆錄電話給托洛茨基，其中特別通知他：「通讀你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提綱，我認爲，總的說來，

很好，而且有些地方十分成功。但有很少幾點，我看，還要有些爭論。我提議，先在報紙上披露，然後，作爲一個小冊子重印出版。再加上若干注解。這對於向國外公衆介紹我們的新經濟政策將是非常成功的。」這個電話是發給托洛茨基的。但在我們意識中，却仍然頑固地把他看作「軍國主義的社會主義」之化身。要對新經濟政策作實質上的理解，我們廣大的黨員羣衆還是十分困難的。

爲甚麼列寧在其最後的日子裏，當他十分尖銳地感到政權有官僚主義蛻化的危險時（特別是關係到著名的格魯吉亞事件），他不向任何別人，却向托洛茨基尋求支援（事實上是建議和他結成一伙）？但我們却認爲，托洛茨基是行政官僚制的「祖師爺」啊。

他是怎樣一個人？托洛茨基就是這樣一個人，撇開他，我們就絕對無法了解我們國家一連串歷史。現在我們試圖把他政治傳記中若干最重要，最雜亂而又相應地最少被研究的幾頁加以思考領悟。

革命準備時期中的活動和理論

托洛茨基（勃朗斯坦），一八七九年十月廿六日（公曆十一月七日）生於烏克蘭赫爾松省的亞諾夫卡村。和上世紀末年俄羅斯進步青年的許多代人物一樣，很早，在十七歲時，他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這時，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日益左傾，從「狂熱的自由主義」轉向社會民主主義，也大大促使他直接參加工人運動。一八九七年，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人在尼古拉也夫建立了「南俄工人協會」。這個協會在烏克蘭許多城市中進行革命宣傳。一八九二年一月，

該協會遭到警察的摧殘，其領導人都被捕了。

坐牢和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年代（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二）是托洛茨基更深入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期。在西伯利亞，他和當地的和流放來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建立了連系（其中最接近的是烏里斯基和捷爾任斯基），參加了一九〇一年春季建立起來的西伯利亞民主協會，對民粹派和無政府主義者展開了爭論。那時，他用「安提德·奧托」的筆名，開始在伊爾庫斯克的一份雜誌《東方評論》上發表文章。這個雜誌是西伯利亞政治流放者的論壇。

大家都知道，這些年代，俄國社會民主運動度過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分化時期。《火星》報一派領導着黨力量的集結和聯合。托洛茨基是《火星》報最熱烈的擁護者，他想望更實際地參加該報的工作。一九〇二年秋季，他從流放地逃出來，開始參與薩馬爾的《火星》報中心（該報的代理人小組）。

托洛茨基的活動，特別是他所寫的那些文章，使他在社會民主黨人中獲得一定的聲譽（他在黨內的化名爲皮魯）。據一些資料說，薩馬爾的領導人克里然諾夫斯基根據列寧的個人建議，設法幫助托洛茨基出國。一九〇二年，他在倫敦會見了列寧。列寧對他的評價是，「一個十分能幹而有精力的人。」在倫敦，托洛茨基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又根據列寧、馬爾托夫和查蘇里奇的建議，托洛茨基參加了《火星》報的編輯部會議。在這個時期，馬爾托夫對他的影響最爲巨大。

在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工作時，托洛茨基是西伯利亞協會的兩個代表之一。根據

會議記錄，他和列寧的分歧是在議程的兩個要點上：關於黨章第一節和關於黨中央機關的選舉。從列寧所作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會議日誌」上可以看到這一點。他們二人共同主張的思想是，黨的建設是立足於各個組織自主的原則上，而不是立足於聯盟主義。關於黨綱問題，他們也沒有任何分歧。當時「經濟派」的領袖阿基莫夫認爲，在黨綱中寫上無產階級專政一條是不合適的。在向阿基莫夫進行激烈爭論時，托洛茨基確實講過一種想法，就是「只有在社會民主工黨和工人階級幾乎混爲一體」，而且工人階級已成爲民族的大多數時，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可能的。但是這一點並沒有引起列寧和列寧支持者的任何非議。而且托洛茨基也從來沒有以這個有爭議的前提爲根據而建立任何理論。相反，在兩年多以後，在論爭俄國社會主義之必然性時，他却強調：「當然，政治覺悟的增長是依靠無產階級的增長。當無產階級的數量已足以戰勝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時，就可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這並不是說：人口的壓倒多數應由無產階級組成，而是無產階級的『壓倒多數』應由有覺悟的社會主義者所組成。」

托洛茨基特別積極地支持列寧土地綱領的原則。托氏反對那些不相信農民革命潛力的人。他說，「有人告訴我們，在西方，社會民主黨在農民中沒有甚麼成功。但是在西方，當無產階級政黨出台時，革命的農民已經完結了他們的使命。而在我們那裏，情況就不同了。在那即將到來的時期，我們應當和農民結合。這既合乎農民的利益，也合乎無產階級的利益。」列寧高度評價托氏的發言。

大家都知道，在討論黨章第一條時，是圍繞着列寧和馬爾托夫的兩個公式。列寧認爲，拋開一切不說，擁護黨並參加一個黨組織，才能成爲黨員。但馬爾托夫認爲，只要能擁護黨就夠了。這樣，爭論就圍繞着對「黨」的概念及其組織建設原則。實際上，意見分歧中心是黨內民主和集中的相互關係問題。馬爾托夫和其他的支持者，托洛茨基也在內，主張廣泛的，有彈性的組織，其黨員可以不受嚴格的黨紀束縛。相反，列寧則主張集中化，特別強調，必須保持黨的堅定性、紀律性和純潔性。當時俄國正處在沙皇制度的壓制之下，反政府的政治活動很難展開，這種情況就決定了要建立一個堅固的，集中化的組織。但是，在革命民主運動參與人的心目中，還留有羅伯，　，特卡喬夫，涅却也夫及其他革命極端派的形象，這些人的名字是和不大光采的「組織上的極權主義」及「革命紀律」等概念分不開的。正是因此，所以在代表大會上，特別在代表大會後，托洛茨基一再申述一種思想，認爲個人在組織上隸屬於黨，必將導至一種蛻化，使黨蛻化成爲一個狹隘的，激進的，陰謀家的組織。在大會開過一年之後，在一九〇四年，托洛茨基在他所寫的小冊子《我們的政治任務》中，特別尖銳地批評了列寧的組織計劃。托氏想要說明，如果過份熱衷於集中主義，將造成甚麼樣的後果。在那裏，托氏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黨組織（即黨機關—— 潘佐夫註）將取代黨，中央委員會將取代組織，最後，一個『獨裁者』取代中央委員會……委員會決定『方向』，但在『人民沉默』時，又取消了這個『方向』……職業革命家的組織，更確切地說，是他們的上峯，

才是社會民主意識的中心，在這個中心之下，只是一些嚴守紀律的技術機能的執行者。」痛心地認識到，托洛茨基的這些預測何等確切。但是托洛茨基本人，在過了多年之後，回想這些事情時，却寫道：爭論把列寧的組織政策推向「荒謬的邏輯終點」。他駁斥一種觀點，說甚麼，斯大林主義的方法是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制定的。他說：「我年輕時寫的那本小册子中所做的預測，並沒有達到那樣的歷史深度，如某些作者毫無根據地強加在本人身上的那樣。列寧組織政策的本身並不是一條直綫。他曾多次反對黨中的過份主義，而呼籲下層反對上層。最終，黨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之下，在巨大的變動和震盪之下，有時向這邊搖擺，有時向那邊搖擺，還是保持了民主和集中的平衡。」由於對黨章有分歧，所以在黨中央機關的選舉上，他也反對列寧。投票的結果，如衆所周知，是列寧的勝利，這樣，托洛茨基就進入孟什維克的行列。

他在孟什維克派中沒有逗留很久。一九〇四年，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可能性問題上，他和孟什維克領袖們之間的分歧達到了如此程度，導致托洛茨基於九月間宣佈退出孟什維克派。但是也沒有參加布爾什維克派。

俄國一九〇五年一月事件促使他返回祖國。他十分積極地投身革命，成了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主席赫魯斯達列夫—諾薩爾的副手。在後者被捕之後，托洛茨基就成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首腦。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初被捕，一九〇七年一月再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在這個時候，托洛茨基進行了緊張的理論研究工作和寫作，他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到戰略問題上，其中包括革命的不斷性和新時期中俄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進程的聯繫。在一九〇六年，他寫了《總結與前瞻》，在其中，他系統地申述了他的不斷革命論。這是一年前他和巴爾佛斯共同討論的理論。

關於這個理論，可以系統地表述如下：俄國的資產階級不能領導革命運動，因此，俄國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只有在得到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之下才是可以想像的。只有得到農民支持的工人政府才有能力解決革命所面臨的全部問題。資產階級專政，甚至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都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專政必然能完成社會主義任務，附帶也完成民主任務，同時又給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一個有力的推動。而西方無產階級的勝利將保障俄國免除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並保障社會主義的勝利。

我們看到，托洛茨基絕對沒有否定農民作爲無產階級的盟友之革命作用。反之，倒是過高地估計了這種作用。因爲按照他的思想（如在《總結與前瞻》中所陳述者）推論下去，俄國農民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已經準備支持無產階級專政。同樣，他對農民中某些階層的獨立政治活動的能力却有些估計不足。因此，他認爲，在解決革命民主任務時，沒有必要讓農民（即相應的農民政黨）對政府的政策施加影響。但是，他却不排除非無產階級集團的代表進入工人政府，反而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他寫道：「健全的政策使無產階級必須吸收小市民、知識分子或農民中有影響的領袖參與政權。全部問題在於，是誰主持這個

政府的政策，誰能在這個政策中構成單一的多數。當然，可以稱這個政府爲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或稱之爲無產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專政，最後也可以稱之爲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問題在於，這個政府中的領導權屬於誰？通過這個政府對全國的領導權又屬於誰？當我們說到工人政府時，我是說，領導權是屬於工人階級。

這樣，托洛茨基的理論就是在俄國進行直接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他早於列寧多年，建立了這樣一個理論，說明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國家中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是在一個社會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落後的國家中，作爲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最薄弱一環的國家中，無產階級能比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中更早地取得政權……說甚麼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取决於一個國家的技術力量和資料，這種觀念是簡化到極點的「經濟」唯物主義的偏見。這種說法與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據我們看，俄國革命將創造這樣一種條件，在這個條件之下，政權可以轉到無產階級手中（而在革命勝利時也應當轉入無產階級手中）。

那時，列寧的觀點却與此不同。如衆所周知，列寧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俄國的資產階級，就其階級情况來看，實在沒有能力把他們自己的革命進行到底，但在俄國，直接的社會主義革命條件還沒有成熟。因此，在開始時，革命的進程還需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但是這個革命却採取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的形式。與此同時，革命反沙皇制度的决定性勝利，並不能導向無產階級專政，而只能導向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也就是兩個階級

共同的政權。工農專政清除中世紀殘餘，以便廣泛而迅速進行歐洲式的（而非亞細亞式的）資本主義發展，並壯大城市中和鄉村中的無產階級，造成羣衆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必然會給西方社會主義革命一個強有力的推動，這個西方社會主義革命，不僅能保障俄國免除復辟的危險，並且能使無產階級在較短時期內下手奪取政權。

他們兩人的觀點，都根本有別於孟什維克的革命觀，按孟什維克的觀點，俄國革命只有在自由派資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是可能的，因此，應該把政權交給自由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將使俄國無產階級比過去有較大機會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如果我們暫時放下這三種觀點的鼓吹者在這個時期的激烈爭論不談，就可看出，其中任何一個觀點的實現可能性，都依賴於人民羣衆有無採取革命行動的決心。例如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就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採取了進行社會主義的路綫，在革命進程中，布爾什維克要在主要的，現實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作業中，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問題當作「副產品」而附帶地加以解決。的確，托洛茨基的綱領是超前了，但這絕對不能證明，他的這種觀點是毫無意義的。還不要忘記，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幾年裏，托氏的小冊子《總結與前瞻》曾經再版多次，並且譯成外文，被看作對十月革命的理論說明。

一九〇七年春，托洛茨基再次從西伯利亞逃走，重新到達倫敦，在那裏參加了俄國社會主義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這時，他仍然沒有參加任何一派，却費了不少力氣去作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

間的調解工作。爲了這個目的，一九一二年夏，他重建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範圍之內的「八月聯盟」。實際上，這個聯盟只集結了托洛茨基的追隨者，也有少數「崩得派」分子，孟什維克分子和取消派分子。托洛茨基對社會民主工黨各派聯合問題的觀點始終不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仍然如此，雖然他已經採取了堅定的國際主義立場，而且在整個戰爭過程中都是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口號下對帝國主義政策加以譴責。

托洛茨基的聯合活動，客觀上有害於俄國的及國際的社會民主運動。正是在這個時候，列寧對托洛茨基十分反感，給他一個最鄙視的稱呼：「小猶大」，這決不是偶然的。無論如何也無法證明，托洛茨基在這些年份裏的政治路綫是正確的。但是我想指出，這個綽號在二十年之後才變得十分出名，而列寧本人，在公開爭論中却從來沒有使用過它。直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廿一日才公之於衆。這一天，《眞理報》上發表了列寧一九一一年寫的一篇筆記稿《關於小猶大托洛茨基因害羞而臉紅》，但是這篇筆記，列寧本人却從未拿去發表過，不論當時還是以後。說到兩次俄國革命之間這段時期托洛茨基曾犯過許多原則性的錯誤，他本人也多次承認。例如一九一九年他談到自己，曾寫過下面的話：「作者對社會民主工黨中互相鬥爭的各派之評價曾陷於錯誤。……在僑居國外時，作者站在兩派之外，低估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歧的道路上，實際進行的是分化和組合，一邊是不屈不撓的革命者，而另一邊却是日益被機會主義和投機取巧行爲所腐蝕的分子。」

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

二月革命推動了僑居美國的托洛茨基。他很快地感覺到俄國所發生的事情之過渡性，所以立即在幾篇文章中，對那些號召人們支持臨時政府的孟什維克領袖們加以尖銳的批評，再次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托洛茨基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戰爭、國際革命等的立場和列寧從瑞士寄給聖彼得堡《眞理報》編輯部的《遠方來信》中所陳述的立場是相同的。這樣，列寧和托洛茨基兩人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分別得出關於俄國二月革命所造成的形勢之實際一致的戰略結論。如果看到，當時由施里雅卜尼考夫、加里寧、莫洛托夫和另外幾個老布爾什維克所領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俄國局和斯大林、加米涅夫所主持的《眞理報》編輯部，都不能對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答覆，就更應該強調這一點。列寧一九一七年四月，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彼得堡市代表會議及全俄代表會議上所提出的《四月提綱》，在黨的多數領導人的頭腦中引起了眞正的轉變。

托洛茨基於五月間回到彼得格勒。他立即參加了名爲「聯合社會民主工黨員區際組織」(「區聯」)。這個組織的成員中，有很多是托洛茨基的老戰友。區聯派曾經提出黨內各派合流的主張（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但當托洛茨基歸來時，這一派已經放棄了和護國派妥協的態度，而完全採取了國際主義的立場。一九一七年五月，他們開了一次會議，他們所作的決議和布爾什維克第七次全俄代表會議的決議大體上相同。列寧關於這件事曾寫道：「區聯派的政治決議，基

本上採取了同「護國派決裂的正確路綫。」這一切就打下了區聯派和布爾什維克聯合的基礎。在一九一七年五月末的彼得格勒各區杜馬的選舉中，他們聯合行動。區聯派的成員，除托洛茨基之外，還有許多著名的革命家，如沃洛達夫斯基、越飛、加拉罕、魯那察爾斯基、曼努伊爾斯基、烏里茨基、尤列涅夫。區聯派的積極活動，實際上是擁護布爾什維克的活動，這樣，使他們不僅在彼得格勒的工人中，而且在布爾什維克派中獲得了尊敬。正是因此，在七月危機中，區聯派遭到的鎮壓，其殘酷程度並不亞於布爾什維克。七月廿三日，托洛茨基被捕，並押送到「克雷斯特」監獄，直到九月二日才得釋放。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召開時（一九一七年七月底到八月初），托洛茨基仍關押在監獄中。在這次代表大會中，正式接納區聯派成員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大會承認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運動中的個人功績（當時沒有人想提及他的錯誤）。先是缺席選舉他爲大會名譽主席，然後選舉他爲中央委員會委員。在選舉中央委員時，就票數來說，他和加米涅夫都位居第三（僅次於列寧和季諾維也夫），在一四三張選票中獲得一三一票。這樣，就是被認爲是黨的四大領導人之一。除此之外，大會還決定，提名他爲立憲會議選舉的候選人（候選人中有列寧、季諾維也夫、柯倫泰、魯耶察爾斯基）。

托洛茨基從監獄出來之後，立即參加抗擊科爾尼洛夫的組織工作，後來又參加反臨時政府武裝起義的直接籌備工作。和大多數中央委員一樣，他這時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業已成熟的革命之政治準備和技術準

備上。而且全部精力都用於將蘇維埃儘快地布爾什維克化。他把彼得格勒衛城部隊的士兵爭取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並武裝工人。九月二十四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通過一個决議，「推選」托洛茨基爲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作了主席之後，他就展開了武裝起義的實際準備工作。九月中旬，他掌握了蘇維埃所設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權。在這之前不久，他還當選爲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一批委員之一（除托洛茨基之外，當時政治局委員還有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索科爾尼洛夫、布勃諾夫）。

從九月到十月，中央委員會中進行了有關武裝行動日期和前途的爭論。布爾什維克所負的責任是重大的。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起義，魯耶察爾斯基大體上同意他們的觀點。列寧的觀點完全相反，他從九月中旬就號召立即奪取政權。大多數委員承認，「武裝起義勢在必行，而且業已成熟。」但又認爲，由於一系列具體的原因，黨還沒有準備好一個成功的行動。有些黨工作人員認爲，最好等到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的時候，指望獲得大會的支持，才開始起義。可以說，斯大林就是採取這種立場。一九二〇年四月，斯大林在慶祝列寧五十歲壽辰的莊嚴集會上的演說就充分雄辯地證明這一點。這時斯大林說：「我們中央委員會决定，在鞏固蘇維埃的道路上繼續前進，召集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始起義，並宣布蘇維埃代表大會爲國家權力機關，那時藏匿着的伊里奇不同意這一點。雖然有這些要求，我們還是沿着鞏固蘇維埃的道路繼續前進，於十月二十五日出現了起義的前景。」

但黨中還有另一些領導人，他們想利用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口號，不過是爲了動員羣衆，爲了在代表大會快開會時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開始行動作好技術準備一事，提供一個合法的擁護而已，完全不必等待代表大會召開之後。托洛茨基就是這些領導人之一。他在十月十八日之後，在彼得格勒蘇維埃會議上的講話就是證據。顯然是爲了迷惑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右派，他在回答代表所提關於布爾什維克武裝行動的可能性這一問題時，就宣稱，這事還沒有決定，但是「如果反革命試圖破壞這個代表大會，我們將予以反擊，這個反擊是無情的，而且我們將把這個反擊進行到底。」當然，托洛茨基是革命政變的堅決主張者，但是，如果把革命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那就不能公開地說，正當代表大會開會的時候，將可能發生武裝起義。列寧對托洛茨基的這次講話是贊成的，他把上引的聲明看作一個欺騙花招。他在十月十九日寫道：「這難道還不容易懂嗎？托洛茨基不能，沒有權，也不應該在敵人面前講出比這更多的東西。難道不容易理解嗎？黨應該在敵人面前掩盖自己的決定（武裝起義的重要性，武裝起義已完全成熟，各方面的準備情況等），而且在公開行動的時候，還要把過錯和責任推到敵人身上。只有小孩子才不懂這些。」

看到這一切，我們可以正確無誤地斷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的準備工作中演一個突出的角色。在蘇維埃政權的最初年代裏，沒有人對此有所懷疑，其中也包括托洛茨基的敵人。

新政權中的工作和爭論

在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中，托洛茨基擔任外交人民委員。可惜，決定第一屆人民委員會名單的那次會議沒有記錄留下來（根本沒有作記錄），因此沒有足夠的把握來確定那次政府職位的選定是怎樣通過的。根據托洛茨基本人的回憶，列寧開始提他作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候選人，理由是，他是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首腦，而奪取政權，正是這個蘇維埃幹的。但由於托洛茨基的建議，未加討論就把列寧的提議否決了。這時列寧又提議，派托洛茨基爲內務人民委員，因爲蘇維埃政權的首要任務，是和反革命進行鬥爭。托洛茨基的回憶說：『「我反對，除了其他理由之外，我提出民族性問題，值不值得把我是猶太人這件事送給他們作爲他們反對我們的補充武器？」列寧幾乎發火了：「我們這裏是一個偉大的國際革命，說這種廢話有甚麼意思？」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展開了一個開玩笑的論爭。我回答說：「革命是偉大的，但糊塗蛋還是不少。」列寧說：「是的，但我們和糊塗蛋是一樣的嗎？」我說：「一樣也好，不一樣也好，這次我們把愚蠢減少一點，爲甚麼在一開始就給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煩呢？」結果，托洛茨基得到斯維爾德洛夫和其他幾位同志的支持。斯維爾德洛夫建議：「必須拿列夫·達維道維奇〔編者按：即托洛茨基〕對準歐洲，就讓他拿下外交部吧。」列寧同意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廿九日（十二月十二日），托洛茨基作爲最有權威的黨領導人之一，和列寧、斯維

爾德洛夫、斯大林一起，進入中央委員會特設的「小局」。由於當時情況十分特殊，中央委員會開全會比較困難。因此，授予該小局一種特殊權力，「凡必須由當時住在斯莫爾尼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成員予以決定的一切非常事務，都可由該局決定。」

對於新政權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締結一個全面的民主的和約。托洛茨基就負責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沒有能說服協約國，使之承認中止戰爭的必要性，於是蘇維埃政權就開始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德國及其盟國進行單獨的講和的談判。

在進行布列斯特談判時，看來，在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發生了十月革命後第一次短暫的意見分歧。爲了了解托洛茨基當時的觀點，首先要看到以下的情況：托洛茨基並不比別人更少地明白，俄國沒有進行軍事行動的能力，他並不贊同布哈林立即進行「革命戰爭」的號召。但他認爲：有必要盡可能長時間拖延談判，目的是給歐洲無產階級一個時間去理解蘇維埃革命這個事實，及其所實行的全面民主和平政策。托洛茨基的立場和列寧的立場並無差別。列寧曾指出：「托洛茨基的策略是拖延時間，這一點是對的。」他們二人觀點之分歧處，在於，把簽強盜和約的時間拖延到甚麼程度。列寧認爲，要堅持到德國人提出最後通牒的時候。而托洛茨基認爲，應給歐洲工人一個無可爭辯的證據，說，我們是在刺刀之下，才放棄了民主和約的原則。按照托洛茨基的想法，如果不這樣，帝國主義者就會把談判看作「巧妙安排角色的喜劇」，因此減弱了十月革命對工人羣衆的影響。因此，才有下面的公式：「我們停止戰爭，我們復員軍隊，但

我們不簽訂和約。」

當然，現在，當我們已經知道，事情是怎樣發展的時候，覺得他這口號有些冒險。但在當時，對黨領導的大多數而言，這個口號並不冒險。因爲他們認爲，他們的最高責任是，作一切可能作的事，以加快世界革命的到來。很多共產主義者都特別寄希望於德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布列斯特協議的簽訂，將使德帝國主義者把部分的軍隊從前綫調回，以鎮壓德國無產階級的可能的行動。除此之外，對於當時德國能否進攻尚在兩可之間。何況，德國人已經不打了，已經坐在談判桌上來了。

托洛茨基的立場有它政治上的優點。它使人們無法譴責布爾什維克黨，說他放棄了全面民主和平的原則。而且，排除了協約國以俄國不履行盟國責任的正式藉口而進行干涉。最後，也可以因此而大大緩和列寧和「左派共產黨人」之間的意見分歧。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談判接近危機的邊緣時，黨內的「左派」就吸引了更多的擁護者。在這種條件之下，如接受德國的最後通牒，就可能引起布爾什維克的分裂。

當然，這並不是說，托洛茨基的立場是無懈可擊的，對托洛茨基立場之嚴厲非議，可能是在下面兩個方面：第一，在敵人快速進攻之下，大部分大砲、其他軍用物資、以及大片土地可能落入德軍之手，這樣就將大大削弱蘇維埃俄國的力量。第二，還有另一種危險，德國人順利地展開攻勢，不再和蘇維埃俄國談判和約問題。不過，黨內許多領導人都把這種危險看作暫時的。

托洛茨基的公式，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公

曆一月廿四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取得了多數人的贊成。在第二天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也得到多數人的贊成。因此，托洛茨基就按照兩個執政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行事。在布勒斯特，他拒絕了德國的最後通牒。的確，在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曾有一個私人默契，即堅持到德國方面提出最後通牒時，在接到最後通牒之後，就不再堅持。但是，又不能不承認，這種默契是違反中央委員會決議的，托洛茨基沒有收到列寧關於和約簽字的指令。關於最後通牒的事，托洛茨基曾經請示，對請示的答覆是一個電報（由列寧和斯大林簽名）。電報說：「我們的觀點你是知道的，直到最近我們還堅持這個觀點。」怎樣去理解這份電報呢？是人民委員會主席命令簽訂條約呢？還是肯定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呢？恐怕應該是後者。電報上簽名的，不僅有列寧，還有斯大林。斯大林是不會知道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曾經有一個私人默契，而電報還強調，在對中央「拉德」的戰爭中有進展。（註）

二月十六日德國指揮部宣布，中止暫時休戰，從二月十八日十二時起恢復軍事行動。在二月十七日晚間的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那時德軍還沒有開始軍事行動，列寧建議，立即向德方送交重開和約簽訂談判的建議。這時，托洛茨基當然反對列寧的建議，而且當時所有注視形勢發展的人都認爲德國指揮部的聲明，只不過是一個外交花招。這時，要投票決定的問題是：「如果事實上是德軍進攻，而德奧的革命高潮還沒有到來，我們是不是要簽訂和約？」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答案都是要簽訂。當德軍的進攻已十分明顯時（

二月十八日晚間），托洛茨基贊成向德國提出立即簽訂和約的建議。在二月廿二日，他正式聲明，請求立即撤消他在人民委員會中外交部長的職務，這就意味着，蘇維埃國家政策必須轉變。

當然並沒有因此而撤消托洛茨基的職務，俄國最後還是不得不在比所有條件更壞的條件下簽訂了和約。還必須注意到，當時局勢極端複雜，而且充滿矛盾，必須採取正確的政策。

一九一八年三月，托洛茨基被指派爲陸軍部長和最高軍事會議的主席。同年四月又同時兼任海軍部長。九月又被任命爲新設立的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議主席。因此，他領導了創建紅軍的工作，又領導動員紅軍去粉碎國內敵人和國外敵人的工作。在這裏不要忘記，必須在甚麼情況之下和用甚麼社會材料去組成這個紅軍。原來的沙皇軍隊是瓦解了。士兵們，是一些不識字的農民，都不願意打仗了，既不願爲沙皇打仗，也不願爲蘇維埃打仗。而且沒有時間去創建一個新軍隊。在這種情況之下，共和國軍事會議的主席，首先必須有鋼鐵一樣的意志、決心、魄力和自我犧牲的精神。這些素質，托洛茨基都有，而且很多。在短短的時期內就把紅軍建立起來了。這不僅是依靠強制的方法（如採用死刑等等）。和其他布爾什維克一樣，托洛茨基是採用共產主義理想之廣泛的宣傳，並注意加強紀律，以鞏固這個軍隊。在他的武器中，不僅有「國內戰爭巨棒」，也有鮮明的革命語言。當然，他認爲，「沒有壓制，就無法建立軍隊。」同時他又認爲，「無論如何，不能用恐嚇建立軍隊。」他在國內戰爭過去數年之後曾寫道：「沙皇軍隊之崩潰並不

是由於缺少壓制，克倫斯基想用恢復死刑來拯救沙皇軍隊，却只毀了它。在世界大戰的灰燼中，布爾什維克建立了新軍隊……建立新軍隊的最強大有效的凝結劑是十月革命思想。」在紅軍中克服游擊主義，吸收舊的軍官幹部進入紅軍，在這些方面，他經常得到列寧的贊助。正是同列寧結成同盟，托洛茨基在這些年月裏才能對所謂「軍事反對派」（斯大林，伏羅希洛夫，斯米爾諾夫等人）的活動家們進行鬥爭。這些人都是反對建立常備軍的。

在嚴峻的考驗時刻，在游擊主義和紀律蕩然時期，使用嚴厲手段是根本必要的。公開的國內戰爭進行了。列寧高度評價托洛茨基在這些年月中的活動。例如一九一九年七月，列寧主動地給予托洛茨基一種空白委托書，這是一種特殊的信任狀，這是表示信任與支持的最高形式。在這個空白的委托書上，托洛茨基可以書寫他認爲必要的任何決定。列寧事先告訴托洛茨基，委托書末尾寫道：「同志們，我知道托洛茨基所採取處置的嚴厲性，我相信，絕對相信，托洛茨基同志的這些處置是正確的，適當的，爲完成他所負擔的工作是必要的，我百分之百地贊成這些處置。弗·烏里揚諾夫（列寧）。」當然，也有意見分歧的時候，但在政策的方針上，列寧和托洛茨基是一致的。

作爲共和國軍事會議的主席，托洛茨基直接參與對高爾察克，鄧尼金，尤金尼奇，白色波蘭軍作戰計劃的制訂。因保衛彼得格勒，他被授與紅旗勛章。他所指揮的紅軍，主要是由農民組成。托洛茨基不能不看到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聯盟的必要性，蘇維埃政權的命運以決定性程度系於這個聯盟。因此，要堅決把

握與中農聯盟路綫之原則上的意義，堅決地批評黨內在這些年月中出現的對這個問題的忽視，或只是表面上的重視。例如一九一九年三月，他從伏爾加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即使在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條件之下，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必須在很大程度上以中農爲出發點，要吸收中農參加社會主義經濟。」

革命的敵人企圖在革命領袖之間傳播不和，他們宣布謠言說：「在他們之間，對於中農問題有巨大分歧。」列寧二月七日在《眞理報》上發表文章說：「托洛茨基同志已作了他自己的答覆……謠言我和他之間有意見分歧，這是最荒謬無恥的謊言，這是地主，資本家，或是他們的自願或不自願的爪牙所散布的。在我這一邊，完全肯定托洛茨基同志的聲明。我們之間沒有任何意見分歧。」

此外，「軍事共產主義」的實施，特別是糧食徵集制，日益破壞着農民對蘇維埃的信任。必須改變政策。托洛茨基正是俄共（布）領導層中最早談論這種必要性的人士之一。一九二〇年二月，托洛茨基在烏拉爾，領導經濟工作一段時間，他在實際工作中開始認識到，糧食徵集制的辦法是耗損自己。回到莫斯科之後，一九二〇年二月，他以列寧、克里斯廷斯基、布哈林、加米涅夫等人的名義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關於糧食政策的意見初稿」。在這個文件中，提出了以實物稅取代糧食徵集制的想法。這個文件的標題是：「糧食政策及土地政策的根本問題」。其中說：「糧食政策立足於徵收剩餘糧食（超過需要標準者）。這樣就使農民只耕作足夠生產一家所需糧食的土地。關

於徵發超過三頭乳牛的條例，又使農民私自宰殺奶牛，並使他們去做販賣肉類的投機生意，進而導致奶品經濟的破壞。工業失去勞動力，農業演化成爲自給自足的經濟。而這些東西又破壞了立足於徵收剩餘糧食的糧食政策之基礎。糧食資源有趨於枯竭的危險。要對這種經濟退化作鬥爭，只有採取下列的辦法：(1)以一定百分比的扣除代替徵發（一種適當累進賦物稅），使較大面積的耕作和較好的土地加工能得到好處，(2)規定，按農民上交糧食之多少而給以工業品，不僅對地區和村莊如此，對每一個農戶也是如此……總而言之，十分明顯，目前實行的依照糧食定額的一刀切徵發政策，入倉時的連保政策，及一刀切的工業品分配政策，必然導致農業的滑坡，導致工業無產階級的消散，最後破壞國家的經濟生活。」

由此可見，托洛茨基的建議還是十分謹慎的，特別在觸及到經濟最關鍵問題時，即市場發展問題時。除此之外。這些建議的實施還必須分別進行，主要是在比較富裕的農業區（西伯利亞，頓河流域，烏克）。據作者的意見，在中央各省，除強制徵發之外還可以根據耕地面積及耕作情況而採取不同的補充強制徵發，同時建立一個「更廣泛，更正確，更實際的蘇維埃經濟。」可是大家不要忘記，這事是發生在「軍事共產主義」的極盛時代，是在採取新經濟政策之前一年。這個文件的附注也帶有特殊的謹慎性。附注說，所提交的材料「並不是將行公布的草案，而只是提交中央委員會進行討論的草稿。如果這一點能夠做到，其行文應該是大不一樣的。」

托洛茨基的建議，在中央委員會上以四票贊成十

一票反對而被否決。列寧本人也不贊成這些建議。托洛茨基自己也不完全相信自己的結論是正確的，他對討論的結果表示滿意，並積極地利用當時公認的方法：「勞動軍」，超經濟強制等方法，繼續對社會主義直接道路進行理論上的探索（黨內其他理論家，如布哈林等也在這樣做）。這時就萌發了「工會國家化」的概念。如果以新經濟政策的情況來觀察這個概念，它當然是錯誤的。但這個概念是從「軍事共產主義」制度必不可免地引申出來的。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年底到一九二一年初，批判了這個概念，這正是他感到有改變經濟政策的必要性時。採用新經濟政策，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組織方法上的急劇轉變。托洛茨基也很快放棄他的這些概念。一九二四年八月，托洛茨基寫道：「因爲經濟政策的新路綫是立足於衆多的企業轉向商業原則和一定範圍的自由市場，所以工會向國家化方面的演進，不僅將遇阻力，並且會遇到相反方向的推力。」

反黨政官僚化的鬥爭

自一九二一年起，托洛茨基就積極地從事於新經濟政策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的探討，其基本注意點轉向計劃和市場的交互關係，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工業產品的成本，滿足市場的需要，及鞏固經濟中的國營部分。他再也沒有回到軍事共產主義的思想了。相反，他還勸阻那些認爲可用軍事共產主義的方法來提高經濟的人。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他寫給某人的信中說：「這種非常措施，只能在十分短暫的時期中收到效果，即羣衆認爲別無其他辦法時，在社會主

發的長時間延設的條件之下，勞動紀律要日益依靠自動性，依靠工人們對自己的勞動成果興趣之增加。鐵路綫不能靠壓制和「擰緊螺絲」，要依靠勞動人民的自動和關心，依靠社會輿論的集體控制，依靠生產的正確安排，以及其他。」

逐漸地，在他理論分析中，黨內生活民主化問題開始佔更大的地位。由於黨機關和國家機關官僚主義蛻化的危險日益增大，這個問題就成了更現實的問題。在理論上和政治上都很不成熟的人紛紛進入黨內，又很難限制他們入黨。在國內戰爭時代，經常接納每一個自願獻身爲蘇維埃政權奮鬥的人入黨。一九二二年，據黨員重新登記的資料來看，俄共（布）的黨員有 9.27 %是半文盲。一些黨員，只機械背誦幾句馬克思主義的文句，當然談不上創造性。在國內戰爭結束之後，情況就變得更加複雜了。列寧曾警告性地指出，來自那些對「躋入執政黨懷有極大興趣」的人之實際存在的壓力。由於在俄國還沒有形成公民社會，居民的大多數是半家長制下的農民，缺乏任何民主傳統，就使情況更加複雜了。盲目的半文盲的羣衆已經習慣於忍受壓迫，就在黨政官僚中尋找他們的獨裁者，這些黨政官僚們又轉而尋找他們的領袖。斯大林就成了這個領袖。

在俄共（布）的領導層中，首先看到這種官僚主義蛻化的人是列寧。他在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年的文章和書信中就說過這件事。而他也就成了那些奪得無限權力的官僚們的第一個犧牲品。病時，他成爲拘禁在家中的囚犯，死了又變了偶像。第二個犧牲品就是托洛茨基。列寧本來把托洛茨基看作和官僚制度作

戰時的同盟者。官僚們反托鬥爭的第一步是政治局中三個成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結成一個幫。三人中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單獨同托洛茨基較量，不論在威望上和理論修養上都不能。「三人幫」利用列寧的病，想方設法孤立托洛茨基，方法就是取消最高機關中經過民主方式作出決定的可能性。同時又在俄共（布）及共產國際中發動一個敗壞托洛茨基名譽的運動。

面對「三人幫」和他們同伙人的攻擊，托洛茨基進行了反擊。但他和他的敵手作法不同。最初，他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個人身上。一開始，他只要求他們，對黨政機關官僚主義蛻化進行公開的討論，要求擴大黨內民主，要求取消根深蒂固的「機關恐怖」制度。他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寫給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的信，在《眞理報》上發表的一系列論文，及小冊子《新路綫》，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一九二四年五月），和其他發言，都是關於這些問題。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的信中說：「這種制度在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之前（即一九二三年四月八日之前—— 潘佐夫註）已大體成立，在大會之後又加以最終鞏固和形成，它比「軍事共產主義」最嚴厲時期的制度更加遠離工人民主。黨機關的官僚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現在完全沒有對全黨關心的問題進行公開的交換意見。……書記處的官僚主義應該結束了。」托洛茨基又把機關官僚化看作黨內另一現象之最重要根源。這另一現象就是小集團現象，它從內部破壞黨。他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寫給黨代表會議的信中說：「機械的集中主義必

然伴隨着小集團現象。這小集團現象又是對黨內民主的惡毒諷刺，這是最可怕的政治危險。」不要小集團現象，要嚴格遵守集中原則的黨內民主。　托洛茨基就是爲此而戰鬥。要維護每個黨員作獨立判斷及勇敢堅持其意見的權利。

「三人幫」對托洛茨基這些活動之答覆，是擴大派別鬥爭。正當中央委員會一九二四年八月開擴大會議時，他們曾開過一次共同思想者的會議（到會者有斯大林，布哈林，魯祖達克，李可夫，湯姆斯基，加里寧，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伏羅希洛夫，米高陽，卡岡諾維奇，奧爾忠尼克茲，彼得羅夫斯基，古比雪夫，烏格蘭諾夫，另外還有幾個人）。在這次會議上，組成了所謂七人委員會。這七人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湯姆斯基和古比雪夫。這個超組織的公開的派別機構的候補委員有捷爾任斯基，加里寧，莫洛托夫，烏格蘭諾夫，福隆茨。實質上，這個「七人委員會」篡奪了黨最高機關的大權。他們預先討論政治局會議上應該討論的問題。正如納道契夫所寫：「這一切，都是爲了，在政治局開會之前，先準備好一個一致對付托洛茨基的步驟，對所討論的問題都發表相同的意見。」對托洛茨基的攻擊加強了。多次把他過去的、十月革命之前的錯誤拿來，算作他的罪過。

托洛茨基曾試圖擊破其政治的團結一致。他把主要打擊集中到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身上。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公布了他的文集第三卷第一部分，包括他一九一七年的作品。他給這本書寫了一個導言，題目是《十月的教訓》。書中提醒黨，要牢記這兩個政治

活動家在十月革命　的準備和進行時期的一些錯誤。他有意加重對他們行爲的批評（托洛茨基寫道：他們已經「滾向孟什維克主義」。）。但他却隻字不提斯大林的眞實態度。斯大林的眞實態度是十分反對起義的，而且斯大林是和加米涅夫共同主持《眞理報》編輯部的。托洛茨基最希望的是打破他的孤立。他顯然不願加劇鬥爭。甚至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他也不排除和解的可能性。在他的文章中，首先是要表明，在黨的領導人的一生中，總難免有些時候，犯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因此，只談托洛茨基一個人在十月革命前的錯誤，是沒有遠見的，而且對發動這種討論的人也是不利的。他多次指出，「現在，在時過若干年之後，還試圖用這些東西（指意見分歧——潘佐夫註）作爲武器來反對當年犯有錯誤的人，是太可憐了。……研究意見分歧，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也不應該成爲反對那些執行過錯誤政策的人的方針。」

但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却以爲，托洛茨基所說的這一切，實質上都是對他們的辱罵。他們要求把托洛茨基趕出政治局，並撤消其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把托洛茨基搞得完全失去政治聲望之後，他們兩人（夥同斯大林，布哈林，及很多黨領導成員）展開了一個反對所謂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他們從十月革命前某個時期，即列寧和托洛茨基進行爭論的那個時期，列寧著作和托洛茨基著作中摘取一些文句，以此爲根據，說托洛茨基一貫反對列寧主義。這個運動顯然是不乾淨的。表面上是布哈林先下手的。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即托洛茨基的小冊子出版之後大約過了三個星期，《眞理報》發表了編輯部文章：《應當怎樣撰寫「十月」的歷史（關於托洛茨

基同志的《一九一七》》。但是十分清楚，布哈林不是這個運動的策動者，而且在運動中也不起主要作用。對托洛茨基進行主要打擊的人是「三人幫」成員加米涅夫。十一月十八日，他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成員及全市黨積極分子會議上作了一個大型報告《是列寧主義，還是托洛茨基主義？》。（後來，他又在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蘇總工會共產黨黨團會議上及軍事工作人員會議上作了同樣的報告，並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眞理報》上發表了。）還有斯大林，他於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蘇總工會共產黨黨團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批評托洛茨基主義的講話（這個講話又發表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眞理報》上）。另外還有季諾維也夫，他在十一月三十日的《眞理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是布爾什維克主義，還是托洛茨基主義？》這些論文，這些講話，還有另外幾個人，如奎林，庫西寧，索科爾尼柯夫的論文，還有共青團中央委員會及共青團莫斯科市委，列寧格勒市委的集體論文，這些東西都馬上編印成爲論文集《關於<十月革命的教訓>》。加米涅夫，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的講話也都編入其他論文集中，在莫斯科及外省發行。此外，又編印了論文集《列寧論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摘自聯共（布）黨史》。這本書於一九二五年初出版，同一年又出了再版。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托洛茨基爲了答覆這些文章，寫了《我們的不同意見》，但是沒有發表。這時在一九二四年夏秋之交，斯大林——季諾維也夫集團中已經出現了很深的裂痕。

在關於《十月革命的教訓》的問題鬧過之後，斯大林實際上成了托洛茨基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

爭論時的仲裁人。他的地位更加強大了。他把這兩個人放在自己庇護之下，而尖銳地攻擊托洛茨基主義，同時却又不准擴大對托洛茨基本人的鬥爭。一九二五年一月，托洛茨基被免去人民委員會中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的職務，也免去了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但是，看來，由於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的教訓≫的爭論中的某些表態，斯大林就放過了托洛茨基，仍保留了他在政治局中的席位。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一月會議（一九二五年）的决議上還寫有一個保留條件：「如果托洛茨基試圖破壞或不執行黨的决定，中央委員會就認爲，托洛茨基不可能再留在政治局中，而且將向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聯席會議提議撤消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員會中的工作，而不必等黨代表大會。」五月間，在「三人幫」解體之後，托洛茨基被授予一些三等職位，即全國租借委員會的主席，電業局局長，全蘇國民經濟會議科技部主任等職務。

一九二五年的一月十七日的决議宣布，圍繞「托洛茨基主義」的討論告一段落，但同時又决定，還要繼續研究，以求在黨內和黨外說明「托洛茨基主義的非布爾什維克性」。其中也包括在政治教學大綱上列一專題，以揭露這個思想的政治流派。這時，托洛茨基已被罷黜，隨之而來的是，以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爲一方，以扮演理論家角色的斯大林爲另一方（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底提出「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展開了爭奪政權的鬥爭。這樣，就暫時放鬆了反托鬥爭。但在一九二六年，當「新反對派」的領袖們承認他們過去進行反對托洛茨基運動是錯誤的，而且

托洛茨基又同他們聯合起來時，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鬥爭又以新的力量燃燒起來。

托洛茨基經過長時間的考慮之後，才決定同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結成一伙。他用心分析了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前夕和大會進行時「新反對派」（或稱爲列寧格勒反對派）和黨領導大多數之間強烈表現的一切分歧，仔仔細細考慮了同他們結爲聯盟的「利」和「弊」。他並沒有參加了這次的黨內爭論。因此，我們只能根據他個人的書面資料來判斷他和這次爭論的關係。這些資料主要是日記性的，還有文獻中所保存的若干封私人信函這些文件的一部分寫有特異的標題，如「同季諾維也夫合伙」，「口號和意見分歧的分析」，「關於列寧格勒反對派」）。從這些文件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充分了解，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是同樣的「機關人員」（假若不是更壞），他們二人不過是反對中央多數派的「機關反對派」。正是因此，他認爲，列寧格勒派的政治領導方法及經濟領導方法，其煽動性的喧嚷，地方把頭式的專橫，等等，在國內引起了對列寧格勒領導層的極端不滿，再加上，列寧格勒的工作人員在不同時期成百成千地從列寧格勒派遣出去，分布到全國各地，這些人對列寧格勒體系也十分不滿。這些事實是完全無法否認的，對這些事實的意義也不可輕信。在這個意義上說，列寧格勒領導層的更新，列寧格勒組織在全黨關係上少打官腔，無疑地是有積極意義的事情。除此之外，他還知道，列寧格勒的情況並不是獨一無二的。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在列寧格勒，不過是把全黨共有的缺點表現得更明顯

、更醜惡而已。」認識到這一點，他也反對斯大林，布哈林集團對「新反對派」採取的純官僚主義的壓制方法。托洛茨基相信，「對機關式的列寧格勒體系採取機關式的壓制方法，只能在列寧格勒產生一個更壞的機關。因爲對　小集團的機關鬥爭中，　必然會深化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傾向。」在他這一邊，他建議，在聯共（布）各級組織中實行一次黨內生活健康化，　從今天的黨制度轉向更健康的黨制度，不要「三人幫」、「四人幫」或「九人幫」，其途徑是，在全黨組織中進行正常的、充滿生氣的工作，從最高層，即從政治局開始。

在傾聽這些爭論時，托洛茨基當然不能忽視這樣一個情況，那就是，爭論的中心不僅僅在「機關鬥爭」問題上，而且也在政治的根本問題上。在這些問題的解決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他自己，在一九二五年底和一九二六年初，顯然出現了實際一致的態度。當時的情況是有決定性的。結果使托洛茨基得出一個結論：不僅他自己一個人，所有共產主義活動家也是一樣，是以完全自然的，通俗社會學的態度得出的結論，就是說：「列寧格勒上層領導人的態度，是無產階級先進部分對我們整個經濟發展的命運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的政治憂慮感之官僚式的扭曲的反映。」在一九二六年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三人第一次公開地以一致的立場出台。三個月之後，在七月全會上，出現了他們基於共同綱領的聯合。

聯合反對派所挑起的爭論，在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兩年之中一直延續着。這個爭論之軸心是，在資

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之下，蘇聯社會主義能否建成（勝利）的問題。斯大林的答覆是肯定的。托洛茨基的答覆是否定的。托洛茨基對這個問題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只有在生產力達到最高水平的國家中，革命取得勝利之後才能建設社會主義（保證沒有外來的資本主義復辟）。大家已經知道，這種水平在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已經達到。（但是，布爾什維克却認爲，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最後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夜！）至於說到蘇俄，她眼前的任務是：盡快地克服她和最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托洛茨基認爲，沒有歐洲主要國家中無產階級的勝利，俄國不可能進入社會主義。因爲，第一，世界資產階級經常圖謀用武裝力量推翻蘇維埃政權；第二，世界經濟「最終要控制世界每個部分，即使這一部分是處在無產階級的統治之下，而且建設着社會主義經濟。」當然以上所說，並不意味着，托洛茨基否定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性。他寫道：「問題不在於，在蘇聯可以不可以和應該不應該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問題等於問：無產階級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中可不可以應不應該爲奪取政權而進行鬥爭。……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也是世界革命鬥爭的組成部分，和在英國進行礦工罷工及在德國建立工廠支部一樣。我們每一個經濟上的成功都意味向歐洲革命的靠近。」當然，黨官僚不支持托洛茨基的概念。這些官僚把在最近時間內切切實實地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一事，看得比抽象的世界革命利益更重要。斯大林的封閉式的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理論，就給官僚們這樣一個前景。如果實現這個理論，借托洛茨基的話來說：「把蘇聯境內現

在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一切，都預先算之爲社會主義，不管蘇聯境外將發生甚麼事情。」

把蘇聯經濟進程和世界市場發展之間有一個十分密切相互關係這個問題提出來，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托洛茨基在他的分析中也有錯誤的地方。他承認，當前資本主義體系正處在逐步崩潰的狀況之中，在最近數年中，將發生社會主義革命，至少在歐洲各大國中是如此。至於資本主義長期穩定的可能性，在現存社會結構之下還能來一個生產力的新的蓬勃發展，他都切切實實地予以否定。他認爲，這些都不符合於馬克思主義。

大規模理論問題的研究，並沒有把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官僚體制的鬥爭推向次要地位。相反，這個鬥爭是更加增強了。他寫給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衆多信件，他在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年的多次講話，其中也包括在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七、八月和十月（一九二七年）聯席會議上的講話（這些會議討論了撤消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中央委員會職務問題）都可以作證。他對蘇聯政權官僚主義蛻化危險性之鮮明而憤怒的警告却主要是對準官僚機構的本身。這些機構已經一天比一天地更加官僚化了，托洛茨基的講話只激怒了那些官僚，於是他們不惜採取任何手段去孤立托洛茨基，並使他徹底地名譽掃地。他們不停地策劃一些著名的挑釁行爲。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這些挑釁中，其規模最大者就是十月革命十周年紀念遊行時，斯大林的黨羽故意制造一些針對反對派成員的街頭衝突。這些都是事先準備並計劃好的。

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事件的罪責全部推到反對派領袖身上。事件發生後不久，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都被開除出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二八年一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圖。就在這之後，托洛茨基照舊繼續其反對官僚獨裁制度的鬥爭。據他兒子西道夫的統計，僅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到十月的短短時期內，他就向他的同志寄發了八百多封含有政治內容的信函，拍發了五百多件含政治內容的電報。但是他已經注定失敗了。當時，若想阻止黨政官僚權力迅速鞏固過程，已經是不可能了。一九二九年二月，托洛茨基被驅逐出蘇聯國境。

流放國外

他被送到土耳其。但是，他在那裏（馬爾馬拉海中的一個小島—— 博林克卜），居留的時間並不長，漂泊的歲月又開始了。離開土耳其之後，他先到法國，然後到挪威，最後到墨西哥。一九三二年，當他還寄居土耳其時，他被取消了蘇聯國籍。

托洛茨基僑居國外時的活動，值得特別敘述。在這裏，唯一要強調的一點是，他這時的政治路綫鮮明地顯出反斯大林特點。他公布的一本接一本的著作，都是揭露斯大林主義。讀者已經知道，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歷史問題》，《斯大林僞造學派》，還有《蘇聯是甚麼和它向何處去？》。在三十年代末尾，他開始撰寫一本有關斯大林的專著。托洛茨基在國外撰寫的許多其他著作，也都帶有反斯大林主義和反官僚主義的傾向。其中最大的是自傳《我的生平》，還有兩卷頭的《俄國革命史》。除了理論活動和寫作活

動之外，托洛茨基還花費很大精力去建立一個他的擁護者之統一的國際組織，其基本目的是推翻斯大林的獨裁。一九三〇年，他在巴黎建立了一個這樣的組織，名爲「國際左派反對派」，其任務就是「重建國際」。這個新的「國際」，就是「第四國際」，是一九三八年九月成立的。

對於托洛茨基在國外的活動，有各種不同的評價。有的意見認爲，他已經成了一個反蘇分子和共產主義最兇惡的敵人。如果認爲，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蘇聯政權的官僚主義蛻化毫不相干，而且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沒有不好的影響，那在邏輯上，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但我認爲，這種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托洛茨基的鬥爭，並不是反對蘇聯這個國家，而是反對篡奪十月革命果實的斯大林官僚制度。不是反對那些自認爲在建設眞正社會主義的人民，而是反對那些欺騙人民的人。直到臨死之前，他還是忠於他在一九二七年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結束其講話時所作的呼喚：「擁護社會主義祖國？是的！擁護斯大林路綫？决不！」用托洛茨基最大傳記的作者多伊徹的話來說：「即使是在最熾熱的爭論中……他也經常強調，在任何情況之下，他和他的支持者都將無條件地保衛蘇聯去反對那些外來的敵人。」

托洛茨基反斯大林鬥爭的結果是悲劇性的。一九四〇年八月，在墨西哥城近郊他的寓所中，被一個西班牙共產黨員雷蒙·麥加德爾致命地傷害了。那個人實際上是依照蘇聯內務部的命令行事的。看情況，一開始，在反托陰謀中，他僅僅是一個配角。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廿四日的夜間謀殺托洛茨基失敗之後，他才

成了主角。五月那次謀殺，是以墨西哥共產黨員著名畫家墨克西吉。大衛。阿爾法羅。西凱羅斯爲首的一伙人幹的。五月廿四日，麥加德爾第一次進入托洛茨基的家門，在此後的三個月中，他曾十二次會見托洛茨基，不僅獲得主人一個人的好感，而且獲得其全家成員的好感。然後，那血腥的案件就發生了。在那次照常的訪問時，麥加德爾進入托洛茨基的書房，用冰斧對準他的頭部加以一個有力的打擊。第二天，托洛茨基就死了。後來，瞞着人們，給兇手授了一個蘇聯英雄的稱號。

革命的護民官，十月革命的英雄，紅軍的創建人，在黨領導層中僅次於列寧的人物，在羣衆中擁有極大威望的人，這就是直到二十年代中葉整個俄國所認識的托洛茨基。「兩面派」，「小資產階級投降派」，「專爲破壞而鑽進黨內的反蘇分子」，這就是斯大林主義者強使人民接受的托洛茨基形象。

但他仍然是一個革命家，是列寧最親密戰友中唯一能終身不肯在斯大林獨裁面前低頭的人。他在死前數月所寫的遺囑中說道：「我在這裏沒有必要再去批駁斯大林及其代理人所作的愚蠢而僞造的誣衊。我在革命的忠誠方面沒有任何污點。不論是直接地或間接地，我從來沒有和工人階級的敵人進行過幕後妥協或談判。成千成萬反對斯大林的敵手由於同樣的誣蔑而成爲受害者，革命的新的一代將要恢復這些人的榮譽，而且將給克里姆林宮的劊子手們以應有的處分……」

「在我四十三年的自覺生活中，我自始至終是一個革命者，其中有四十二年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

進行戰鬥。如果我能再從頭開始，當然我將避免這種或那種錯誤。但我的生活總方向是不會改變的。我死也要做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辯證唯物論者，當然也是一個無神論者而死。我現在對人類共產主義前途的信心和青年時代相比，不僅沒有減少其熱度，而且更加堅定了。……」

「生活是美好的。讓下一代把生活中的醜惡，壓迫和暴力都清除掉吧，讓他們更充分地享受生活的幸福吧。」

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也有很多失誤，有時還是很嚴重的，但總的看來，他自始至終都忠於他爲之獻身的那件主要的事業。

註：電報中還說：「我們再重複一次，這就是，在基輔的拉德（烏克蘭反革命議會）手中，是一無所有了。如果德國人現在還不承認這一事實，他們將來總會承認的。」

新僞造歷史學校

——評當代蘇聯托洛茨基研究的一個流派

（一九九〇年初）

亞歷山大。潘佐夫

托洛茨基在 1932 年流放中，出版了他的最好的書籍之一——《斯大林僞造學校．對不肖門徒的文獻的修改和補充》。他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的幾年前，暴露了並且主要在文件方面令人信服地批評了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觀念中所有最重要的立場。那個歷史觀念不久在我國變成了無可質疑的教條。托洛茨基的著作固然被斯大林派宣佈爲非法。蘇聯讀者只在幾個月前才有機會讀到這本著作。（見：《歷史問題》，1989 年 7-10 期，1990 年第 1 期）。

斯大林僞造學校支配了我們的著作界達半世紀之久，不但在對托洛茨基本人的政治活動的分析上，而且在考察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整個歷史的各個方面，決定了歷史學家和著作家的處理問題的方法。而且，

編者按：本文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是蘇聯科學院國際工人運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歷史學博士，對蘇聯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思想言行很有研究，寫過許多論著。

只有在最近，隨著開放過程的擴大，激進教條主義和舊圖式的局限的範圍才開始受到侵蝕。一個歷史知識的新領域在研究者眼前開啓了：嚴肅地、客觀地概述托洛茨基的政治傳記的機會已經出現。比立克、丹尼洛夫、夏波須尼可夫等人的著作已經出版。這些人的著作把托洛茨基一生中的各段時期的政治行爲以相當高的科學水平加以描述。

（見：比立克的《托洛茨基，在了解關於他的眞相的道路上》——Sobesednik 雜誌，1989 年，第 33 期；丹尼洛夫的《我們開始了解托洛茨基》——EKO 雜誌，1990 年第 1 期，（編按：中譯本見本刊總 153 期）；科拉布列夫的《爲甚麼 [要研究] 托洛茨基？》——政治教育雜誌，1989 年，第 2 期；莫洛特西琴的《當了 120 天的戰爭人民委員——從過渡的歷史到一個群衆性的正規紅軍的建立》——軍事史雜誌，1989 年，第 8、10 期；波茲徹柯爾定的《“新路線”：悲劇的開端》——青年共產主義者雜誌，1989 年第 8 期；斯碧林的《從內戰和干涉時期的俄共（布）的歷史上 [取來的材料]》——蘇共歷史問題雜誌，1989 年，第 3 期；史塔徹夫的《托洛茨基：從一部政治傳記上取來的幾頁》——M 出版社，1989 年；夏波須尼可夫的《托洛茨基——在“東方觀察家”上的合作者》——科學院的專門新聞、歷史、語文學和哲學系列，1989 年第 3 期）

然而，儘管有這些著作，有關托洛茨基的眞相，也只有經過很大的困難，才爲它自己開闢了一條道路。客觀的、科學的出版物淹沒在文章和書籍的廣闊的洪

流中。在這個洪流中，托洛茨基還是像過去一樣以愛他自己在革命的角色比愛革命還要深的「邪惡天才」形象出現。然而，只有少數幾個作家繼續「揭露」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一心一意地要繼續《簡明教程》的傳統。

（見：伊凡諾夫的《他們正在重新裝扮出賣耶蘇的猶大》——蘇俄日報，1987年9月27日；米納也夫的《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和列寧主義的外表的變形》——蘇共歷史問題雜誌，1989年第12號；波諾馬勒夫的《沒有鎮壓就不可能建立十支軍隊》——軍事史雜誌，1989年第8、10期）。

大多數歷史學家和作家，雖然在外表上由於這個或那個理由，不夠堅強到脫離過去的評價，但卻還是要把「時代精神」考慮在內。我們可以在他們的作品中，追溯到把他們自己建基在特殊觀念上的傾向。這些觀念，在內部，是完全客觀的，但在外部卻是矛盾的、折衷主義的。在這些觀念的極限之內，他們對托洛茨基之作爲革命的實踐者的服務，卻有局部的接受和容忍。在這同時，他們與斯大林主義圖式中的一連串中心論題，還保存著原有的關連——首先是托洛茨基的理論觀點和列寧的理論觀點完全相反這個論題。因此，當這些作者留意到托洛茨基的政治活動的時候，他們之泄漏了一點點內情，不但不是意外之事，甚至也是正面的事。這也許只會令讀者增強了這個人是毫無原則的想法。凡塞茨基和伏爾科果諾夫的許多作品就最完全地反映了這種歷史研究的傾向。事實上這兩個人可以稱爲這種傾向的創立人。

（見：凡塞茨基的《清算，斯大林、托洛茨基、齊諾維也夫：幾種政治命運的片斷》，M出版社，1989年。這本書中討論托洛茨基的那幾章在該書出版之前及以後，被作者重覆地發表在一連串的報刊上（例如：《鼓動者》，1989年第18期；《爭論與事實》，1988年第34期；《白俄羅斯共產主義者》，1989年第11、12期，1990年第1至3期；《共青團眞理報》，1989年5月19日；《文藝報》，1989年1月4日；《新近的歷史》，1989年第3期；《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1990年第1期；《蘇聯的工會》，1989年第14至17期）。也見伏爾科果諾夫的《勝利和悲劇》：《斯大林的政治畫像》（M.1989年）一書中關於托洛茨基的段落，以及他在《眞理報》（88年9月9日）、《羅地尼》雜誌（1989年第7期）和《三軍中的共產主義者》雜誌（1989年第19期）上的文章。）

在他們最近著作中所公式化的觀念，卻寫進了許多報刊的文章中。這明顯是因爲，在它們裡面所包含的解釋，不需要編者或讀者與多年來支配了他們意識的錯覺決裂。但是，這種歷史研究的傾向讓群衆知道得愈多，那末，要求批判性地自我檢查也愈強。你看，問題不只是恢復有關於已變成斯大林最大對手和受害人之一的那個人的歷史眞相。不了解托洛茨基及他的思想，我們絕對不可能了解我國的整段時期，因此也就更難找到目前的改革道路。

那末，具體說來，凡塞茨基和伏爾科果諾夫的立場是由甚麼組成的？他們的辯論系統的基礎是甚麼？

這個辯論系統的那些方面是可以採納的，那些方面是不合現實而應該排斥的？

在本質上，他們的觀念是由以下內容組成的：從1903年（那就是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一直到1917年夏天，托洛茨基，在革命運動的所有戰略與策略的問題上（如果你高興的話，除了聯盟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內的地位這個插話性問題外），都以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觀念，主動地向列寧進行鬥爭；托洛茨基只在偉大的十月革命前四個月，由於群衆運動暴風雨式的革命熱情和向左移動，才把這個鬥爭暫時停止。

可是，以極端錯誤的不斷革命論爲基本精華的「托洛茨基主義」，和列寧主義間的主要差異，仍然存在。雖然列寧非常了解這點，他還是要利用托洛茨基的組織和宣傳能力，「長時間以來試圖使他『回到』所需要的一邊」（伏爾科果諾夫的《勝利和悲劇》第1卷第1章第167頁）；關於與列寧的關係，托洛茨基「一般地而且就整個而言，卻保存在‥‥那個範圍」（《新近歷史雜誌》，1989年第3期第151頁），而且甚至在十月革命的勝利和紅軍的締造上，扮演一個特別的角色。但是，「與馬克思主義的正確信念相分離，使他成爲『一時的英雄』」（伏爾科果諾夫的《勝利和悲劇》，第1卷第1章第165頁），而且「由於列寧生病時、特別是他死後的新力量出現，托洛茨基主義就使自己被人感覺到：

「除了特別大的野心以外，一個堅強的、獨立的思維能力，但是帶著微弱的世界觀的『水晶球』[預

言］，慢慢地引導托洛茨基到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而且歸根到底是，蘇維埃政權的）不妥協敵人的陣營中去」（同上書，第259頁。明顯地，那些不要走上跟斯大林主義的社會主義鬥爭道路的人們，則有微弱的、依賴的思維能力和堅強世界觀的水晶球！）

凡塞茨基從最廣闊意義上陳述了他的立場：「整個事情包含在這樣的事實中：在黨內，托洛茨基以最集中的形式，反映了黨員中那些試圖依靠被他們教條主義地解釋的、19世紀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的人們‥‥。在文字上承認列寧主義‥‥在行動上，他們明顯地低估了列寧關於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的發展新階段的教訓」（《新近歷史雜誌》，1989年第3期第152頁）。

是這樣嗎？我們要考察所提出的最重要的觀念立場。

是的，在很多年中，托洛茨基和列寧，曾經爲了一連串建立革命黨的問題，進行火熱的爭論。但是，這事比凡塞茨基和伏爾科果諾夫所說的複雜得多。所以，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只是就議程上的二點發言反對列寧：黨章第一節以及關於黨中央機關的選舉問題。這從代表大會的會議紀錄，以及從列寧所編輯的《俄國社會民主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會議日記》上，都可看得很清楚。（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1903年7至8月，會議記錄》，M.出版社1959；《列寧全集》第7卷第403至421頁。）

沒有一條列寧所定的黨綱的提綱受到托洛茨基的

爭議。相反地，他在那個問題上是支持列寧的。

那末，爲甚麼他在黨章第一節上支持馬爾托夫呢？懷疑托洛茨基幾乎每一個活動的凡塞茨基認爲，托洛茨基的行爲顯示出他傾向於改變原則和信念、傾向於拋棄革命的鬥爭形式，特別是這種做法可以保證他得到眼前的政治效益。」（凡塞茨基的《清算》一書，第55頁。）那些行爲？關於這點，我們只好猜測了。（例如，凡塞茨基甚至明顯地懷疑托洛茨基在1902年第一次從流放地逃走時都懷著某種惡意。他特別著重，當托洛茨基逃亡時（凡塞茨基說是「逃向國外」，事實上是逃向沙瑪拉），他丟下了妻子和兩個女兒（見：《新近歷史雜誌》，1989年第3期第139頁）。我想，這裡沒有必要來解釋，托洛茨基之從流放地逃走，並不是要躲開他的家庭，而是要積極參加革命工作。在與托洛茨基的關係上，凡塞茨基也不能逃避受人懷疑呢。）

眞正發生的是甚麼事情？我想，如果我們了解到，列寧與馬爾托夫之間的意見不同的主要點是黨內民主與集中主義之間關係的問題，我們才能了解眞正發生了甚麼事情。因此，這些爭論就轉變到「黨」的觀念，和建黨的組織原則。如果馬爾托夫和他的支持者（其中之一就是托洛茨基）主張建立一個廣闊的、有彈性的組織，一個由相同思想的人自由結合起來、與嚴格黨紀沒有關係的聯盟；那列寧則相反地以一個集中主義的堅定保衛者而發言，特別著重保護黨的堅固、一致和純潔的必要性。列寧的願望可以解釋爲：他希望克服小集團作風和避免組織在地下工作的情況下垮台。

我們也必須在這裡了解馬爾托夫派的立場。你看，羅伯斯比爾、卡卓夫、爲車也夫和其他的極端的革命家的活生生例子，仍然留在這些參加革命民主運動的人的腦海中，而且，「組織的集中主義」和「革命紀律」的觀念已作出足夠的讓步。正因爲如此，馬爾托夫和托洛茨基不能夠接受列寧在他的小册子〈怎麼辦？〉中所著重的觀點：

「我們運動中的活動家所應遵守的唯一嚴肅的組織原則，就是嚴守秘密、最嚴格選擇成員，培養職業革命家。只要具備有這些條件，就能保證有一種比「民主制」更重要的東西，即革命者之間的充份的同志信任。····眞正的革命家的組織會用一切辦法來清除其中的不良份子的。（〈列寧全集〉，俄文版第6卷，第141頁。）

因此，正是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而且特別是在它以後，托洛茨基堅持不懈地重復指出，個人在組織上隸屬於黨，最後會使黨墮落爲一個狹窄的、激進陰謀的組織。（他的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更充份地發現在他的小册子〈論政治工作（策略和組織問題）〉（日內瓦，1904年）中。）

他在建黨問題上支持列寧（這在現實中只發生在1917年夏天），只當他了解到「[列寧]個人的組織政策並不代表一直向前的路線的時候。他[譯按：列寧]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斷然拒絕黨的過份集中主義，而且呼吁下層黨員起來反對上層。在那天快過去的時候····黨保持了民主因素和集中因素之間的必要的平衡。」（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傳》，T.P.Benson出版，

1985年，第140頁）然而，一當列寧在1922年開始完全覺察到這個平衡似乎受到破壞，托洛茨基也於1923年覺察到這點。他就跟著列寧下了決心，向這個當時正在黨內形成的「恐怖機構」制度反叛。

以後我還要再談這個問題。在目前，我想要著重這一點：托洛茨基在1903至1907年就建黨問題批評列寧，並不是站在左或右的機會主義立場，而是公開地站在民主的立場。很痛心的是，他當時所警告的許多話，完全在斯大林主義的實踐中證實了。

現在要談談托洛茨基和列寧之間關於革命的理論問題的不同意見。從1905年到1917年3月，他們的不同意見的本質，事實上，是在於兩個觀念之間的矛盾：托洛茨基爲之而戰鬥的不斷革命論，和列寧所精心闡述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托洛茨基的理論可以用以下的簡明形式來表達：俄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革命運動，因此，不可能設想民主革命在俄國的完全勝利，除非通過依靠農民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只有工人政府，在農民的支持下，才有權力解決由俄國革命運動提上議事日程的一系列問題。資產階級專政既不能，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也不能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專政不但無可避免地實現社會主義任務，而且在同時實現民主任務。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也同時給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一個巨大的推動力。無產階級在西方的勝利，不但保護俄國免受資本主義的復辟，而且保證把社會主義建設推行到底的可能性。（這個理論首先被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總結與前瞻，革命的動力》中闡述出來（1906年）。

凡塞茨基寫道：「這個理論，在文字上是革命的，在事實上，卻接近右傾機會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的路線。」他又寫道：「不管托洛茨基要不要，客觀上說來，他的目的是使事情發展到使工人階級孤立、使革命招致失敗的地步。」（見：《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雜誌，1990年，第1期，第52、53頁。也見於：《白俄羅斯共產主義者》雜誌，1989年，第11期，第54頁。不難注意到，在這裡，凡塞茨基修改了斯大林主義對不斷革命論的定性：「它是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瓦解其力量的理論」（《一個國際間諜的死亡》——《眞理報》，1940年8月24日。）

是這樣子嗎？是不是凡塞茨基可能看不到托洛茨基的觀念結果成爲在俄國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我想他是看到的，因爲不可能看不到。更有甚者，很可能就是因爲這點，才解釋爲甚麼他老是拒絕接受它。否則的話，他就會承認，托洛茨基已經在1905-1906年，在列寧[提出]好久以前，創立了在一個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而且是必然性的觀念。

還有，這並不簡單是某種「獨立奪取[政權]」，也不是先進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階段，而是在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的關係都非常落後，而且是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最弱一環的國家。他於是不得不爭辯說，托洛茨基並沒有否認農民在將會到來的革命事件中與無產階級專政團結一致所起的革命作用；你看，到結果，他的觀念就變成爲：俄國的農民在無產階級專政符合它的利益的情況下是準備支持它的。

托洛茨基說：「明智的政策促使無產階級要與小

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農民中有影響力的領袖們的權力聯合在一起」（托洛茨基的《總結與前瞻，革命的動力》，M出版社，1919年，第39頁。）那也是「招致工人階級孤立」嗎？

最後，承認托洛茨基的觀念是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就會逼使在我們上面所述的歷史研究傾向的支持者也要放棄他們論題中更重要的一點——「托洛茨基主義」與列寧主義存在主要的、而且也是不可逾越的分歧。

對〔列寧和托洛茨基〕這兩人的觀念不帶偏見地作一個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到，在二月革命以前的時期，這兩人之間就已經有許多共同點。列寧和托洛茨基在不相信俄國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潛力上，已經非常接近。這使他們斷然主張，俄國革命在開頭就已經成長到超過古典資產階級民主的極限（究竟在哪個階段，那已經是另一問題）。但他們在一連串的國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會支持俄國的革命過程這個遠景上，也有共同的看法。

列寧寫道："要得到勝利，俄國革命有它自己的足夠力量。但是它沒有足夠力量來保持勝利的果實。····俄國革命需要俄國以外的預備力量，它需要旁邊來的幫助。有沒有這樣的預備力量可以給我們看見呢？有：西方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列寧全集》第13卷第17頁）。

不用說，在這些年頭，在他們的共通觀念之間也有許多分歧。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列寧估計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遠景，是非常謹慎的。他認爲只有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爲廣闊地、深入地發展歐洲式而非亞洲式的資本主義而肅清本國的封建殘餘，加強無產階級在

城鄉中力量，就會開啓革命向社會主義階段過渡的可能性。（有關他這個理論的闡述，可見例如第11卷，第1至131頁。）

只有在1917年3、4月間暴風雨般的革命活動的情況下，列寧才把他自己的理論的一連串論點撤回（而且托洛茨基也把他的不比列寧少的論點撤回），改變方向而朝社會主義革命推進。正如以後所著重指出的，在這些改變的過程中，當布爾塞維克向前行進時，“他們就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當作主要的眞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副產品，順便地加以解決。”（《列寧全集》第44卷第147頁）

因此，列寧的立場在所有基本問題上，實際上是與托洛茨基的結論相同。如果有人一定要在這點上使自己滿意的話，他只要把列寧的《遠方來信》和《四月提綱》與托洛茨基在1917年3月底和4月初在紐約的《新世界》及《新生活》上發表的幾篇文章相比較，這兩個革命家的結論相同是明顯的。（同上書第31卷第11至57、113至118頁；《托洛茨基文集》第3卷第1部份第3至23頁。關於這個問題，伏爾科果諾夫的結論說，托洛茨基在5月底回到彼得格勒而且仍不知他要加入那個黨（孟塞維克或布爾塞維克），卻能夠在4月4日布爾塞維克的會議上發言反對列寧的《四月提綱》，眞是引起最大的驚奇（見：伏爾科果諾夫的《勝利和悲劇》第1卷第1部份第58、67頁））。

因此，對托洛茨基而言，他就沒有必要重申他過去與列寧爭論時所表達的不正確的意見，雖然凡塞茨基和伏爾科果諾夫現在卻以這一點來譴責他。（同上書第159、193、194頁；凡塞茨基的《清算》第55頁。）

我們反而有理由假定，由於列寧達成了在俄國立即進行社會主義轉變的意見，所以他應該重新思考他過去與托洛茨基的理論討論。至少越飛的1927年11月16日給托洛茨基的信證明了這個看法。（這封信是以托洛茨基對越飛逝世所作的兩篇演說的前言而發表，見《托洛茨基畫像》Benson出版社1984年第229至241頁。）

越飛在這封信上說："我曾經不止一次告訴過你，我親耳聽到列寧宣稱，在1905年正確的不是他，而是你。將死的人不會說謊。現在我再度向你重述這件事。"（引自《托洛茨基畫像》第240至241頁。）

那時所討論的，不用說是不斷革命論。當然，越飛的回憶不能作爲無可爭辯的眞理，但是，也不能把他的回憶排除在外。越飛是布爾塞維克黨最正直的人之一，他大概不會在他死前幾分鐘做出違背他良知的事情。

無論如何，我們已經證實，二月革命及其以後的革命事件的發展，已幫助人們清楚了解托洛茨基和列寧之間曾有過的理論分歧，由此仍然斷言"托洛茨基主義"和列寧主義之間還留下甚麼分歧，實在是沒有根據的。

可是凡塞茨基和伏爾科果諾夫，爲了繼續抓住這個論題不放，就堅持要從十月革命和十月以後的俄國革命運動史上，尋找證明。他們在很想證明那無可證明的事時，常常不停止公開的欺騙，是不足驚奇的事，以凡塞茨基爲例，這就是他在這方面所做的事。他著重地指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立場"並不是像別人在過去所寫、所說的那樣不停地消極"（那就是說，消極，但不是不停地消極），他局部地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托洛茨基和列寧之間在準備武裝暴動時期所發生的不同意見。（凡塞茨基的

《清算》第62頁；《新近的歷史》雜誌，1989年第3期第142頁。）

在這一點上，他事實上把一個等號放在托洛茨基立場和加明尼夫及齊諾維也夫的觀點之間。眾所週知，後兩人是反對革命的。他用了加明尼夫在《新世界》報上所寫的文章作爲證明，那篇文章指出，除了加明尼夫本人和齊諾維也夫以外，“好幾個講求實際的同志”也參加了反對暴動的人的行列。（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1917年8月至1918年2月，莫斯科，1958年第116頁。）

引用了這個宣告以後，凡塞茨基著重地說：“所謂講求實際的同志，他的心目中主要是指托洛茨基。”（凡塞茨基的《清算》第77頁）爲甚麼呢？因爲“政權問題恰好被他始終如一地與蘇維埃大會連結起來”（同上書第79頁），因爲托洛茨基在10月18日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會議上回答代表們一連串提出的關於布爾塞維克用武裝來表態的可能性問題時，已經清楚地說出，這件事還沒有決定，但是“如果反革命力量一顯示要擊碎大會的企圖，我們就會以反攻來回答。這種反攻不但是無情的，而且我們會把它進行到底”。（《談判和彼得格勒蘇維埃新聞》，1917年10月19日）

他繼續以這種方式演講，而在所有的這種說理中，一點都沒透露實情。列寧早就知道托洛茨基的眞正立場，所以非常稱贊他的10月18日演說，而且在事實上把上面所引的解釋看作一種隱蔽的技倆。他著重地說：“只有小孩子才不懂那點。”（《列寧全集》第34卷第423頁）

這是不是意味，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夕，他

們之間一般地說來沒有甚麼不同意見？不是的。但是他們的意見不同純粹是技術性的：托洛茨基要利用召開蘇維埃大會的口號作爲合法動員群眾的掩護，而且爲了在技術上保證今後任何時候，並不是僅在召開大會以後，能夠有權利發言；但是，列寧在9月10日已經號召趕快奪取政權。

把我們的注意力放在上面所說過的每句話，我想我們會正確地看出：托洛茨基跟列寧在一起，在十月起義的準備工作上，扮演一個領導的角色。這個結論將會變得更清楚，如果我們把以下考慮在內：在二月事件以後一段時期，黨的大部份老幹部並沒有朝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走。當然，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聯合上，列寧佔第一位。就是因爲如此，托洛茨基明顯地有完全的理由在他的日記上如此寫道：

“假如我1917年不在彼得堡的話，十月革命仍然會發生——在列寧的人格和領導的條件下。假如列寧和我都不在彼得堡，十月革命就不會發生：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層就會阻止它發生····假如列寧不在彼得堡的話，我就簡直不能應付布爾塞維克的首腦們的反對，反對「托洛茨基主義」（那就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早就在1917年5月開始，而且革命的後果就會是個問號。我重覆一句，單是列寧，十月革命還是會成功”。（托洛茨基的日記和信件，Teneflay出版社，1986年第84至85頁）

不用說，凡塞茨基試圖反駁那個觀點，但是，不幸的是，他做得很不準確。第一，他從以上的引話中，割去了第一句和最後一句來歪曲托洛茨基的思路，爲了再一次證明他有“自大狂”。（見：凡塞茨基的《清算》第73、94頁）第二，他重新提起斯大林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對托

洛茨基在十月的行爲所作的特點的描述。（見同上書第72至73頁）但是，正如他們所說的，評論還是多餘的。

伏爾科果諾夫還用了類比的方法。例如，他爲了希望能夠證明，托洛茨基與列寧對比起來，是一個在內戰時期主張嚴格措施、“在前線使用鎖壓和死刑”的人，所以不止一次地從托洛茨基的回憶錄中提出“引句”：“沒有壓制就不可能建立一支軍隊。在指揮軍火庫中沒有死刑，就不可能領導一大群人走向死亡。必需把兵士放置在前線有死亡的可能性和在後面有被處死的必然性之間。”（引句來自：伏爾科果諾夫的《勝利和悲劇》第1卷第166頁；《眞理報》1988年9月9日）

首先使人注意到的是引用引句時的疏忽。在原著中，這三個建議是如此提出的：“沒有壓制，就不可能建造一支軍隊。在指揮軍火庫中沒有死刑，就不可能領導一大群人走向死亡。只要那些邪惡的無尾人猿對自己的技術如此自傲、稱自己爲人民、建立軍隊和發動戰爭時，指揮官定會把兵士放置在前面是死亡的可能性、後面是死亡的必然性的位置上。”（托洛茨基的《我的一生，一次寫自傳的企圖》柏林1930年，第2卷第141頁）（企鵝出版社版本，1986年第427頁）。

但是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托洛茨基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清楚地寫道：“但是，即使如此，軍隊也不是建立在恐懼上。沙皇的軍隊之所以崩解，並非因爲缺乏壓制。從大戰的廢墟上，布爾塞維克建立了一支新的軍隊。····新軍隊的最強的基石就是十月革命的思想。”（同上出處）

這裡最明顯不過的是，伏爾科果諾夫對引句的刪節和

歪曲，完全曲解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因爲托氏主要是要證明，紅軍的建軍方法是與過去的軍隊截然不同的。

現舉另一個例子。伏爾科果諾夫在他的《勝利和悲劇》一書中，寫了一大堆關於列寧在托洛茨基加入布爾塞維克黨以後知道他“在政治上的偏狹思想”。遺憾的是，他差不多沒有舉出事實來證明這事。唯一的例外是從高爾基對於與列寧會見的回憶錄中所引來的文句。這段引文的最後一段，從字面上看來，應該是對托洛茨基的不偏袒的評價：“有雄心的。而且在他的心中有一些從〔德國〕拉薩爾那裡來的不好的東西。”（伏爾科果諾夫的《勝利和悲劇》中的引句。見該書第1卷第1部份第166頁）

這樣的話是眞正從高爾基的“列寧傳”中來的，不過，這些話只在1931年在向“托洛茨基主義”無拘束地鬥爭的時期中第一次出現的。在高爾基原來的文本中，列寧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評論托洛茨基：

“是的，是的——我知道！有人對於我與他的關係說了一些謊話。現在有很多關於我和托洛茨基的謊言。····你可能找到另一個能夠在差不多一年中組織起一支充份發展的軍隊，而且能夠贏得軍事專家的尊敬的人。我們有了這樣一個人。我們大家都有了他！而且——也會有白痴”。（《俄國近代人物》，彼得格勒，1923年第243頁。在我們的歷史研究學中第一個引起大家注意高爾基回憶錄的這種“準備”的人是科拉布列夫（見科拉布列夫選集，第61頁））。

伏爾科果諾夫證明列寧反托洛茨基主義的情緒的唯一論點，就這樣變成毫無根據。這些毫無根據的宣稱，可以在凡塞茨基和伏爾科果諾夫關於托洛茨基的各種斷語中找

到，甚至說，在列寧領導下俄國已經轉向新經濟政策的軌道以後，他還保持對“戰時共產主義”思想的忠誠。而這簡直不是偶然的，因爲這個說法並沒有證據。同樣地，我們也不可能認爲凡塞茨基從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9次代表大會（1920年3至4月）上的演說所引的句子有說服力，或者是伏陀拉佐夫在他批評托洛茨基觀點的文章中的觀點（見：《白俄羅斯共產主義者雜誌》1990年第2期第57至59、61頁），以及〔批評〕托氏在第9次代表大會上演說的記錄。（見：伏陀拉佐夫的《歷史的選擇與歷史的不同道路，布哈林之反對托洛茨基》，《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1988年第10期）。

這種接近的方法是與對托洛茨基的無知有關，托氏的經濟觀點在1921年經歷了深刻的進化。托洛茨基在把新經濟政策看成爲社會主義經濟的組織方法而突然轉變的同時，與包括布哈林在內的其他“軍隊式的組織”的理論家一樣，毅然拋棄了他在過去所持有的過分簡單化的觀點。尤其是，在那時候，他主動地使他自己忙於解決新經濟政策的理論與實際問題，特別是計劃與市場的互相關係、生產效率的提高、製造品成本價的減低、市場的飽和和國有化經濟部門的加強等問題。列寧非常贊同他的工作。（見：《列寧全集》第54卷第314頁）。

托洛茨基不再退回“戰時共產主義”的觀念。他反而始終如一地暴露那些認爲經濟可以由如此極端的方法來提高的共產主義的錯誤。（見：《蘇聯的共產主義反對派》，1923年至1927年，來自四大卷1988年Benson出版社的《托洛茨基檔案》，第2卷第76頁）

在這一點上，贊同伏爾科果諾夫利用托洛茨基在1923

年10月8日向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管制委員會的成員寫的信作爲托氏保持“戰時共產主義”世界觀的證明，是完全不正確的。這封信沒有要求（像伏爾科果諾夫所寫的）“對農民政策要強硬起來”、“勞工要軍事化”等等。（見：蘇共中委會新聞，1990年第5期第165至173頁）

伏爾科果諾夫把托洛茨基的經濟思想和普列奧布拉仁斯基的經濟思想劃一等號，也是極爲錯誤的（見：伏爾科果諾夫的《勝利和悲劇》第1卷第1部份第194至195頁），仔細分析就會顯示出他們的主要分歧。托洛茨基在基本上是不同意普列奧布拉仁斯基的主要觀點——這位“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基本法則”的作者，事實上極力主張有必要以掠奪農民爲代價，加速增加工業中的國家資本。至於托洛茨基，他著重：“需要在世界經濟的環境中”考慮價值規律、私有部門的管制和社會主義積累法則之間的相互關係。在這方面，他敏銳地對以下這個事實的危險作出評論：普列奧布拉仁斯基的研究方法很可能“會轉變爲”斯大林主義排除其他一切經濟、政治發展模式的“完結了的經濟前景”。（《蘇聯的共產主義反對派》1923-27年第1卷第225頁）

眾所週知，他對這種模式持極爲否定的態度。他曾公開宣佈，斯大林的政策是“擰緊人們眼睛”的政策，實現這個政策，會“不管蘇聯境外將會發生甚麼事情，都迅速稱呼蘇聯境內發生的和將會發生的一切事情爲社會主義。”（同上書第2卷第145頁）

凡塞茨基和伏爾科果諾夫對於托洛茨基在20至30年代發動反斯大林主義官僚的鬥爭目的和方法所作的推理和有關眞相，也是毫無證據的。對於他們兩人而言，這是一個

鬥爭——除了是“一個沒有人支持的獨裁者的陰謀”以外，便不是別的東西了。這陰謀的目的是，“用社會主義民主的思想來掩飾”純粹策略的目的；破壞黨的中委會的信譽；根據他們兩人的觀點，托洛茨基的慾望事實上只有一個：變成俄國共產黨（布）的領袖。（見：凡塞茨基的《清算》第14、22、23、32、36、40、41頁，伏爾科果諾夫的《勝利和悲劇》第1卷第1部份第81、135、163、165頁）

根據這種說法，凡塞茨基和伏爾科果諾夫把托洛茨基在那幾年所發表關於黨和國家機構眞正復興的演說，統統看成爲煽動、使黨不要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緊急任務作出決定的企圖。斯大林爲反對托洛茨基而實行的種種詭計，被他們兩人評價爲完全正確 （見：凡塞茨基的《清算》第42頁；伏爾科果諾夫的《勝利和悲劇》第1卷第2部份第162、202頁）；托洛茨基本人活動的一般方向（特別是在他被迫移居國外時期），被看成爲反黨、反蘇 （見：凡塞茨基的《清算》第43、50、100頁；伏爾科果諾夫的《勝利和悲劇》第1卷第1部份第28、30、252頁），因此斯大林的做法是合法的。

所有那些都可以被認爲是眞理，如果不是由於以下兩個情況的話：第一，在1923年，當托洛茨基第一次發言指出需要擴大黨內民主時，他沒有理由要去爭奪權力：他是革命的保衛者、十月的英雄、紅軍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他在俄共（布）領導人物中理所當然地被認爲是僅次於列寧的，而且沒有其他政治局成員能夠在受人民的愛戴上或者在理論修養上與他競爭。假如沒有由齊諾維也夫、加明尼夫和斯大林所開始的反對他的派系活動，他可能會得到黨

內大多數有影響力的活動份子的支持，也許繼承列寧的人就是托洛茨基。（對於這個問題的更詳細討論，可以閱瑪納德多哥也夫的〈三頭政治〉、〈七人集團〉StalinNedelya出版，1989年第1期。）

第二，托洛茨基在20年代和30年代所寫的、關於黨和國家之內的專橫官僚統治，以及關於斯大林主義專斷的氣氛日益惡化，都是眞實的。我們現在所知的不比托洛茨基所寫的更壞。當然，我們可以像以前那樣認爲他是喜歡從事派系鬥爭的、反蘇的。我們也可以認爲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與黨和國家機構的官僚墮落沒有關係。對我來說，這樣的結論似乎是毫無根據。

以上是簡述當代托洛茨基研究的幾個傾向之一的情況。這個傾向在目前似乎是這個歷史知識範圍內的領頭傾向。那末，甚麼原因使這個傾向的支持者與眞理作嚴重決裂？我想，這是由於思想的惰性。整個而言，這個思想的惰性就完全是我們的社會科學的特徵。　開放政策已使歷史學家大吃一驚。觀念的轉變似乎造成很大的痛苦。我們感到同樣重要的是，到今天爲止，托洛茨基在民權上和在政治上的平反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這個事實同樣地對許多社會科學家有很大的影響。所有這些證明，我們僅僅是開始走向重建歷史眞相的道路。

【兆立譯自〈馬克思主義〉月刊第3卷第8、9期刊出的B.Simons（西門思）的英譯文。這篇文章在1990年初首次發表在〈近代社會的工人階級〉雜誌上】

理解托洛茨基

——論布魯耶

曼德爾

一

永遠不會犯錯誤的人，世界上是沒有的。托洛茨基在分析政治局勢時，特別在作出政治決策時，不止一次犯了錯誤，正如在他以前，列寧、盧森堡、恩格斯、馬克思也犯過錯誤一樣。他的護身甲有缺陷，正如所有男人和女人，他們的護身甲都有缺陷。不過他的護身甲仍舊是金子一般光耀的，令人欽佩，以後還要令許多世代的政治活動家、知識份子以及普通的讀者欽佩他。

這位偉大的革命家，現在從布魯耶所寫的傳記中，大踏步走出來了。我們看見了一個非常富於吸引力的人，——比較他的敵人和他的崇拜者所傳說的更加富於吸引力。他決不是他的朋友盧那恰爾斯基所描繪的那種目空一切的傲慢的嚴厲的領袖，固然他一天到晚忙於政治的組織的工作。托洛茨基是很富感情的，時常傾向於遷就，他的保留姿態能夠表達他的深刻的感情。他能夠同廣大群衆交流感情，這種能力，在本世紀中是很少人可以匹敵的。但他也能夠贏得和保持着私人的友誼和感情，例如，大家知道的他和拉可夫斯基的關係。

同所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一般，他的興趣並不局限於政治和經濟方面，而是十分廣泛的。他精通

文學，哲學，歷史，自然科學，軍事學，技術學和繪畫。馬克思最喜歡的一個拉丁格言，即說："我是人，我有一切的人性，"——這個格言無疑適用於托洛茨基。布魯耶這本著作的一個次要的優點，就是突出托洛茨基的深刻的人性，使之爲讀者所知曉。

二

同列寧比較起來，托洛茨基在策略方面和政治方面稍遜。列寧是天生的領袖，善於以自己爲中心團結一大群能幹的合作者，既能發揮他們各自的特長，又能把他們融合爲一個日益增加效力的整體，他能夠成功建立一個布爾雪維克黨，這是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則是最勇敢的革命理論家和戰略家，二十世紀工人運動中沒有人能夠同他匹敵的。即使今天看來，他一九〇六年寫的《總結與前瞻》一書，其分析也是令人驚嘆的。本世紀的全部歷史都概括在這個分析中了。

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惟有托洛茨基預見到在帝國主義支配的輪廓下，不平衡的配合發展律的作用，使得無產階級能夠領導第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我們今天可以說，這是第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這革命不是發生在工業最發展的而無產階級數量又比他處更多，文化又比他處更高的國家，而是發生在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在俄國，無產階級政治上是最進步的，社會政治力量的對比是最有利於它的，特別由於那裏的統治階級是軟弱和腐敗的。這個勝利將能觸發國際革命的過程，以此克服最前進的工業國家中工人運動的弱點。如果沒有國際革命接踵而起，那麼無產階級政權在俄國長期保存事實上就是不可能的。我們看見，最近七十年來，革命的成功和革命的悲劇

都符合於托洛茨基的預見。

然而第一個國際革命浪潮失敗的結果，俄國無產階級政權却不是因資本主義復辟而喪失，而是被官僚群篡奪去的，——這一點，托洛茨基在一九〇六年却未曾預見到。他到一九二二年才感覺到了，列寧也是此時感覺到的。所以"熱月反動"的意識縈繞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和行動達十五年長久，如果不說一直縈繞他到他被史大林派遣的兇手刺殺了的時候。

但正如一九〇六年早已預見十月勝利一樣，又如後來擴大應用不斷革命戰略於所有較落後的國家一樣，"熱月反動"的意識也不是從法國革命移植到俄國革命的一種概念。這概念所以有意義，只是由於歷史已經國際化了，因爲階級鬥爭也國際化了，這國際化是帝國主義時代所造成的。

俄國資產階級，作爲一個階級來說，已因內戰失敗而粉碎了，它的一切野心和意向都消失了。它不能奪回政權。資本主義復辟的力量只能從十月革命所創立的新社會萌發出來，這種力量只能依靠勾結帝國主義和完全依賴帝國主義才能贏得勝利。可是，帝國主義，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陷於深沉的無可救藥的危機，工業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此起彼伏的鬥爭浪潮衝擊了它，嚴重的經濟危機衝擊了它，日重一日的相互鬥爭衝擊了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不斷的反抗也衝擊了它。

十月革命的尙未喪失的勝利品，可見其命運是必然聯繫於階級鬥爭的勝負的——更恰切地說，是聯繫於世界規模的一切社會政治鬥爭。"熱月反動"問題是同世界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過程分不開的。事實上，在共產黨領導人中，惟有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二三年就懂得這個道理。布魯耶的書，其主題之一就是指出這

個事實，托洛茨基晚年如此重視建立第四國際，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雖然如此，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三三年之間，蘇聯"熱月反動"的意義和內容仍是俄國各派共產黨人之間內部鬥爭的中心問題。對此，布魯耶的書提供我們比多依徹的三部曲更多的細節，更多的重要結論。

左派反對派，從一九二三年起，就正確地認識到：黨和國家有官僚主義變質之危險。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勞動階級的辦事員，如果專職做辦事員，就有可能變成壓迫者，壓迫勞動階級。這話果然應驗了，托洛茨基因之能夠概括爲一個公式，即說：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剝奪了！（由此又在經濟上產生許多後果）。

可是，這樣一種反革命，並非社會的反革命，即不是復辟資本主義，正如法國的"熱月反動"並非簡單復辟革命前的舊制度一樣（舊制度是半封建的貴族當權，是專制君主制）。這是一種政治的反革命，是以勝利的革命所建立的一個社會爲基礎的。

這兩種反革命的區別，反對派在鬥爭初期並未認識清楚，反對派的領導人中，很多人認爲"熱月反動"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或者至少過份機械地將此二者相提並論。當時的鬥爭有三條戰線：一，反對官僚，二，反對耐普曼（Nepman）（城市新興的資產階級中間商），三，反對富農。當史大林及其一夥人一九二九年突然進行極左的轉折，即在農村強迫集體化，在城市瘋狂工業化，此時反對派就面臨嚴峻的考驗了。一部份領導人，先是皮亞塔可夫，後是普列奧布拉仁斯基，史米爾加，和拉狄克，認爲這個轉折就是，至少部份地是，證明反對派主張是正確的。這些人以此爲藉口，替自己投降史大林作辯護。反對派的另一部份

人則堅持無產階級的反官僚的國際主義的基本立場，在托洛茨基領導下，繼續進行他們的反對〝熱月反動〟的鬥爭。他們就需要進一步弄清楚蘇聯〝熱月反動〟的含義了。布魯耶的書於是引導我們一步深一步地追隨反對派和托洛茨基在這方面思想的發展。這是他這本著作的最重要的部份。

多依徹的書在這個問題上所作的遲疑不決的互相矛盾的分析，是經不起全面的歷史的檢查的。多依徹記述那個強迫的集體化，稱之爲〝自上而下的革命〟。既然在此以前，社會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反革命，那麼這件事情怎麼能夠稱爲〝革命〟呢？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對這件事情有中肯的分析，而他的一段分析又爲蘇聯今天改革的激進的批評所更加尖刻地證實了。法國工業的大發展是雖可賓黨奠立基礎的，但直到拿破侖執政府和帝國時代才眞正開始發展。難道可以根據這點稱拿破侖時代爲〝第二次革命〟麼？蘇聯的幾次五年計劃，究竟是十月革命的產物呢，還是史大林主義的產物呢？

今天，我們能夠作出最後的結論了，對這個問題不會有大的爭論。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九年這個時期內一切積極的建設都是十月革命的產物；至於那些大量屠殺，饑荒，貧困，壓迫，浪費，歧視，以及隨之而來的種種現象，則都是史大林主義的產物，官僚獨裁和某一社會階層政權的產物。多依徹嚴重低估了這一切。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是不能爲這一切災難分担責任的。我們不能不同托洛茨基和托派那樣不懈地進行反對這些罪惡的鬥爭。

那個在俄國獲得勝利的政治反革命，只能靠政治革命去推翻。可是歷來都有一種爭論，關於官僚統治能不能自己改革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布魯耶反對

多依徹，一般說來是對的。人們引證歷史上的一一稱之為"自上而下的革命"，如奧地利皇帝約瑟第二和俄羅斯皇帝亞歷山大第二，可是事實說明這一類先例是不徹底的，是沒有完全廓清舊制度的。要保障進步，就必須完全廓清舊制度。這一類所謂"革命"可以釋放進步的力量，但其本身的功能則是要進行某種改良以阻止人民革命的爆發。正是因為它們不能像真正的人民革命那樣徹底，所以它們總是拖了人民的後腿（有時也會促成人民革命的發展）。但長久下去它們還是不能阻止人民革命的。對於亞歷山大第二與俾斯麥，[illegible]，對於赫魯晓夫和戈爾巴喬夫說來也將如此——不管後二事與歷史上的先例之間有多少差別。

必須理解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群衆鬥爭二者之間的特殊的辯證法。對於資本主義以後的世界說來，這個辯證法還更加重要，更加適用。官僚群不是一個階級，不像奧地利的在宮廷供職的貴族，也不像普魯士的容克地主。在無產階級具有巨大的社會經濟潛力的蘇聯，是不能與歷史先例中人民群衆在社會內所佔地位相比的，因此這個辯證法更加應當強調其重要。如果布魯耶能夠把這一點說清楚，那是很有用的。

三

不管多依徹的三部曲有多少弱點（這部曾獲得[illegible]讀者遠多於布魯耶書所要獲得的），它却建立了一[illegible]歷史功績，即它打破了緘默和誹謗的封鎖圈，——[illegible]是史大林派和資產階級歷史家以及同路人和各派[illegible]主義者，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在這位十月革命領導紅軍創建人周圍所建立的牆垣。對於人數不多的[illegible]

及其周圍的同情者來說，這部三部曲顯然是不需要的。但在他們以外這部書却成爲一條道路，引導幾十萬讀者走向眞理。多依徹的書，遠非布魯耶在某一點上所暗示的，是辯護史大林。它是在這部份世界輿論中打破史大林神秘化的一個階段。

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大會的秘密報告，也可以這樣評價。把赫魯曉夫報告看作"巧妙地辯護史大林"那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是歷史的盲目。對於全世界幾百萬共產黨員來說，赫魯曉夫報告表示史大林崇拜已經結束，而非巧妙地繼續保持他的權威。那時，百份之九十九的人也是這樣看的，連最堅決擁護史大林的人也懂得這一點。

布魯耶企圖把他對於多依徹的批評系統化。這個企圖是沒有根據的，而且不公平的。他的書中有二章含有這種批評。其中都是議論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事件的。一章名爲《革命的危機》，一章名爲《退卻》，在此二章中，都是蓄意寫成片面的爭論。我們完全同意於布魯耶對於克隆斯塔特事件的判斷，這判斷有帝國主義檔案庫中的文件爲根據，不過托洛茨基當時自己不知道這些文件。但多依徹對於一九二一年悲劇，對於革命中這個發生轉折的一年的解釋，是遠勝於布魯耶的。

歷史的背影，大家都知道：那時，生產發生災難性的低落，饑荒，無產階級數量銳減，西方第一次革命浪潮低落，同時白軍在內戰中遭受確定性的失敗，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也結束了。以列寧和托洛茨基爲首的布爾雪維克黨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決定實行新經濟政策組織退卻，並在共產國際內採取反對極左冒險主義和反對季諾維埃夫和布哈林所主張的"進攻"，爲了抵制這種傾向，列寧和托洛茨基便主張一種統一政

策給共產黨人一條路線，要他們在進行任何奪取政權的鬥爭以前先去做群衆工作，爭取多數。這一切是合符邏輯的，首尾一貫的，建立在正確理解現實的基礎上的。當時，社會力量的對比要求這樣做，客觀的形勢也按這個方向走去。布魯耶（同多依徹一樣）正確地說明了這一切。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布爾雪維克黨卻不合邏輯地，絕對沒有根據地改變了他們對於在俄國行使政權的態度。他們本來應當說：內戰已經過去了，階級敵人已受到致命的打擊，不能很快復原的，現在我們必須果斷地擴大民主，特別在黨內，在工會內，在蘇維埃內擴大民主。但他們不這樣說，布爾雪維克黨中多數的人，包括列寧和托洛茨基，反而轉到相反的方向去，說道：內戰既然過去了，無產階級的毅力和動向將容易與其理想和使命一同發揮出來。如此，如果我們經濟上的退卻之後再來政治上的退卻，那就有致命的危險。所以我們必須加強紀律，加強自上而下的控制，加強集中制，政治的民主必須大大地縮小。

不僅如此，這種分析還被用爲一種楷模，或寧可說一種根據，以此成立一個公式，即說：經濟放鬆的時候必須配以政治緊縮，這種公式流行了幾十年，使得西方自由派的教條主義者一切預見和預言都流於破產。

上面那個分析，事實上是錯誤的。這個分析導致了災難性的政治結論。如果說，耐普曼對於蘇維埃政權的威脅更大於高爾恰克或威郎格爾對於蘇維埃政權的威脅的道理，難於證明的話，那麼我們更難於證明：一個勞動階級，不能參加政治決策，而日益退居於消極支持政府機構的地位的，反而比較能夠積極自覺進行鬥爭反對明的和暗的反革命的更加有力量。此外

，在那種經濟形勢之下，布爾雪維克黨也應知道，最大的危險不是資產階級反革命，而是勞動階級的遠離政治和消極，這種情況反過來又引致了政治反革命，引致了"熱月反動"。

革命的昇起和降落，最後分析起來，是受社會力量的對比所決定的，而非受兩大政治陣營中發生甚麽事情所決定的，在此力量對比中，勞動階級內部發生了甚麽事情，同資產階級及其盟友內部發生的事情比較起來，即使不是更重要的，至少也是同樣重要的。

在工人階級遭遇物質大困難的時期內，如此加強黨政機關的權力和發號施令的手段，爲此縮小和最後取消工人的民主，那就是等於促成工人階級政治活動的銳減和政治作用的縮小，因而改變了社會力量的對比，而不利於工人階級。托洛茨基和列寧在一九二一年還不懂得這個道理。一年以後，他們就懂得這個道理了。但在這一年之內已經造成損害了（我們還不能說這損害是不可補償的）。一黨制已經確立了。一黨內部已經禁止派別活動了。黨內無派幾乎是黨外無黨的必然結果，因爲黨內每個派別都是潛在的第二黨。史大林做了這唯一的黨的總書記。黨機關同時異常迅速地增長起來——十月革命後專職做黨務工作的只有幾百個人，到了一九二二年八月間已有一萬五千人了。

多依徹的書有一件功績，即是說明了這個轉折點具有徹底的決定的性質。布魯耶的書卻未曾反映這一點。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明白承認這一點。在一段重要的自我批評中，他以如下的話說到他的政治生活：

> 禁止了反對黨，勢必至禁止自己黨內的派別；禁止了黨內的派別，最終也要宣佈黨的領袖是不會錯誤的而禁止黨內不同於領袖的思想。如此

由警察製造出來的清一色的黨必然導致官僚無罪論。這就是一切踐踏法律和貪污腐化的源泉。

世界上，像多依徹那樣的作家，在他的書中獨闢專章寫出那種機制，而其分析現在又爲歷史所證實，並爲蘇聯好多人所承認（雖然布魯耶尚未承認）。——

那樣一個作家怎麽會被指責爲巧妙地替史大林辯護呢？顯然這個指責是不能成立的。

此外還有一種議論，大意如下：在一九二一年，在禁止異黨方面，列寧和托洛茨基固然同樣犯政治上的錯誤，史大林做黨的總書記固然事實上是列寧任命的，但這個時候托洛茨基比列寧更應當受譴責，因爲這個時候他在工會問題上採取了反民主的立場。他這樣做，就是替史大林開闢道路。史大林做了總書記，就是表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聯盟在工會問題上失敗以後，普列奧布拉仁斯基，克勒斯廷斯基和塞勒布里亞可夫三人退出書記處，這三人是擁護托洛茨基的。

可是，這裏，我們必須糾正一般人對於托洛茨基在工會問題上的錯誤的片面判斷。在這個問題上，布魯耶接受了多依徹的不完全的立場。事實上，工會問題，如一九二〇年所討論的，並不能簡單化爲工會離開國家而獨立（相對的）的問題，或者工人階級對於工業管理人保持自治活動的問題（工業管理人是愈來愈加官僚化了的）。如果簡單在這個問題上來討論，那麽列寧是對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是錯的。但工會問題是包含着管理問題。誰來管理工業呢？

在工會問題這一方面，列寧主張一長制，工廠完全由廠長管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沒有明白提出工會自己管理的問題（工人反對派則是主張工會管理如正式黨綱那樣說的），他們在文件中提出了一些決定性的建議，布魯耶，同多依徹一樣，未曾引用這些建議

，或者未曾注意到這些建議，我們在一九五五年已經提到這些建議了。（注1）

從以後的事實回顧起來，可以明白，簡單地依靠工會自治來抵制廠長的管理是無法阻止官僚化的。那些廠長都是脫離了生產群衆的官僚。反對官僚的鬥爭，必須在三條戰線上進行：㈠保衛工人的直接的經濟利益；㈡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在工人階級內和在蘇維埃內）；㈢立法，即規定工人管理工廠和整個經濟。至少對於最後一點，托洛茨基一九二〇年是走在列寧前面的。

四

布魯耶在多黨制和一九二一年轉折點的中心問題上遲疑不決，這事特別令人驚訝。因爲他的書中特別貢獻之一正是提出了托洛茨基思想上和行動上一個特點，即托洛茨基一貫不妥協地堅持工人階級有自我活動的能力和自我組織的能力。

托洛茨基從一九〇五——〇六年起，就是論述蘇維埃組織的第一個理論家。他當時甚至預見到，下次俄國革命中蘇維埃將在全俄各地興起。列寧直至一九一七年著作《國家與革命》時候，才接受了這個也是來源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思想。共產國際直至一九一九——二〇年才普遍化了這個思想。從此，這個思想就成爲普遍的原則，適用於全世界上一切以無產階級性質爲主的革命。盧森堡、葛蘭西及其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間，又對這個思想進一步發揮，托洛茨基則是早於一九〇六年破天荒地就在理論上提出這個思想了。

托洛茨基不是工人階級自我組織論的理論家及其實際行動的領導人，他便須進一步去完善他的有組織

的工人運動的思想，尤其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以後，共黨和社會民主黨確定分裂時候，更必須如此做。列寧也是在爲統一戰綫而鬥爭時沿着這條道路走去的，他先發表了《共產主義左傾幼稚病》的著作，接着共產國際召開第三次大會。托洛茨基的思想則更加準確地集中在工人運動問題，由此形成了一種理論，認爲工人運動是一個包括矛盾的有機的整體。這個整體，一方面有政治的分化，有衝突，有時還有激烈的鬥爭;另一方面則反映階級的團結，共同的鬥爭，一致的行動，反對階級敵人和共同危險，追求共同的利益。這個情況如果從經濟觀點看來是對的，從單一的職工會組織得到了完全證實的，那麽從政治的平面看來也同樣是對的。

托洛茨基對於法西斯的分析，他估計工人統一戰綫在阻止德國法西斯興起有重大作用，他的幾項策略建議，他的不懈努力，警告希特勒上台對於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將構成精神上的危險，——這一切都是托洛茨基對於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最光輝的貢獻。在這個問題上，布魯耶搜集到了很豐富的資料。托洛茨基對法西斯的攻擊，乃是他的工人階級自我組織論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通過他這一部份的理論，我們可以理解，蘇維埃（工人代表會議）爲什麽既是工人階級統一鬥爭最有效的最自然的武器，又是工人階級實施政權的最有效的武器。托洛茨基在其搏鬥中，我們往往看見他提出驚人的見解，其中之一是他能預言（布魯耶此處用的是PREDICAT 他不愛用PROPHE—TIC，因爲PROPHETIC 帶有宗教的色彩，而托洛茨基的預言則是科學分析和直覺相結合的），托洛茨基在多年以前就已預言：西班牙將出現蘇維埃，初時是反法西斯民兵會議的形式。一九三六年，西班牙果

眞出現了這樣的蘇維埃組織。

托洛茨基的一切政治活動，當然以工人自我組織論爲核心，但他有弱點，並不能始終一貫地堅持這個原則。例如，一九二一年，他就違反了這個原則，此外，據布魯耶記載，托洛茨基同列寧一樣，一九一〇年竟站在考茨基一邊反對盧森堡。當時，盧森堡主張群衆政治罷工。盧森堡如果成功，那麼對於整個工人運動和德國階級鬥爭說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這個問題是密切聯繫於工人階級自我行動和自我組織問題的。

歷史證實，工人的"平均"階級意識是多分聯繫於他們的具體鬥爭經驗，因之又聯繫於他們親身經歷的鬥爭的具體形式的。布魯耶如果能更加強調這一點，那就更有用了。

我們應當感謝布魯耶，他有勇氣敢於闖入，至少部份地闖入那個禁區。我們餘伍中人至今還不敢涉足這個禁區哩。這就是托洛茨基年輕時寫的≪我們的政治任務≫，這本書是瑕瑜互見的。列寧認爲這是一本壞書。然而，正如某些歷史家那樣在其中尋覓史大林主義的種籽，黨和蘇維埃官僚化的種籽，結果只是嘲笑那個歷時二十年的，產生史大林主義的完全而複雜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包含了三次革命和二次反革命，包含了幾百萬男女的進攻和退守，包含了鉅大社會力量之間的各種不同的對比，也包含了這些力量對比對於包含列寧在內的領導人的思想的反映。那些歷史家那樣做，是走錯了路的，因爲≪我們的政治任務≫正是一本向那種官僚化宣戰的書。

很難得否認，一九〇五——〇七年的列寧或一九一七——一九年的列寧曾經修改了他在≪怎麼辦≫一書中所作的某些論斷，對於職業的革命家應當具有的

"雅可賓黨人"的徹底的集中的領導作用。他原來沿着一個方向走得太遠了，一經覺察，就迅速通過其他道路退回來。我們特別在他寫的《十二年》論文集的序言中看見他主張最廣泛地實行民主原則，主張實行領導人選舉制，主張在合法的群衆的黨內進行公開辯論。他在更高的理論平面上說道：

> 當然，成功〔按指職業的革命家的黨的成功〕的第一個根源在於工人階級由於客觀的經濟的原因有一點與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其他的階級不同，即是工人階級以其最優秀的分子組成社會民主黨〔按指馬克思主義的黨〕，卻有極大的本事自己組織起來。如果沒有這個條件，那麼職業革命家的組織就將是一種兒戲，一種冒險，一種純粹招牌。我的《怎麼辦》一書中不止一次強調說：職業革命組織能夠存在的唯一原因就在於他同那個即將自發投入戰鬥的眞正革命的階級發生聯繫。（《列寧全集》第13卷）

這裏引來的列寧的話，其中雖然發生"聯繫"一語還可繼續發揮，但我們已可視爲正確表達先鋒隊組織（作爲一種完成特殊任務的組織），群衆自發性和工人階級自我組織三者之間的關係了。

說了以上這一切之後，我們就可以評估《我們的政治任務》這本書了。這本書不過是一種關心和警告，防止民主集中制的兩大成分之一在黨內片面地發展起來，在理論上，尤其在實踐上，更尤其在黨行使國家政權，而群衆的自我行動又陷於衰退的時候。布魯耶作了一件好事。他闡明了這本書的意義，於是打開了禁區。

我們的結論是不說自明的：眞正的工人階級自我組織，即具有眞實權力，包含全體工人階級（至少其

中大多數）在內的蘇維埃網絡——只有在多黨制基礎上才能實現。

這個結論不僅僅因爲工人階級總是追隨不同的黨派和不同的政治潮流的事實而證明是正確的。禁止工人跟隨它們走，這並不同於限制資產階級或帝國主義的權利和勢力；寧可說這是打擊工人階級一大部份人的權利和他們的政治創意力。沒有自由的政治辯論和鬥爭，工人階級的政治教育和活動就將迅速變質，那時工人就將先普遍消極，跟隨你走，然後表現官僚式的服從，群衆的智慧於是低落下來，最後萬事不關心，到處說假話取代了那種活生生的工人民主。

偉大的盧森堡最早預見到這種道理，那時她還在熱烈擁護俄國革命哩，她還未曾看見一九一八——二〇年的內戰情況哩。從一九二一年起，她的警告（在她被殘暴殺死以前三年所作的警告）就逐步顯示出來，而且爲歷史經驗所證實了。

她說：

> 如果政治生活在全國範圍之內被窒息了，那時蘇維埃就必然陷於癱瘓。沒有普選，沒有無限制的集會權利，沒有各種思想的自由鬥爭，那歷生活就要枯萎，各種公共事業就會變得有氣無力，而社會上只剩下一個官僚主義是生動活潑的。（盧森堡一九一八年十月寫的《俄國革命》，見一九六九年巴黎版）

五

布魯耶的書帮助我們去回答一個問題，這是從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四〇年時期中蘇聯歷史上的問題，歷史家和青年人都要提出來的，更不用說工人先鋒隊了。蘇聯以後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提出這個問題。這個問

題就是：你們怎樣解釋史大林如此刻毒仇恨，如此兇殘迫害托洛茨基，他的家族和他的朋友呢？

我們可以撇開事情的純粹心理方面，如私人敵對、妒忌、羨慕、知識自卑感、強烈的犯罪感、局部的瘋狂發展爲全面的駭人的瘋狂。這一切都是事實，但這一切都絕對不足夠拿來解釋爲甚麼具有這種心理的個人，能夠在這樣一個從偉大的革命產生出來的大國中發洩他的瘋狂到了近於不受限制的程度呢？在這樣一個大國，經得了這樣一個革命的經驗，不僅釋放了經濟上的潛力，而且提高了幾百萬人精神上和文化上的素質。

要作出一種更加符合科學的，更加首尾一貫的，那就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場大戲的二個敵對主角的政治作用上，把他們看作二種敵對的社會勢力的代表，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傳統和不同的價值：一個是代表無產階級的，一個是代表官僚的。

史大林的仇恨，長久以來就是官僚中一大部分人的共同仇恨。托洛茨基的反官僚的鬥爭，在一大部分的工人先鋒隊看來，基本上是正確的；差不多全體的老布爾雪維克，也不同程度地和不同時期地（這是悲劇），認爲正確。這裏說的老布爾雪維克，包含那些起初擁護史大林的人在內。

權力積累起來，漸漸集中於個人手裏了，"熱月反動"又導致拿破侖主義和史大林專政了，於是殘存的事物或殘存的人，凡沾染了十月革命的綱領或思想的，甚至凡沾染了馬克思主義的解放人類的傳統的，都爲那些服務和鼓吹政治反革命的人所憎恨。既然這是一場政治的而非社會的反革命，它同馬克思和列寧相聯繫的那條臍帶是不能剪斷，於是這個制度便披掛了奇形怪狀的"馬列主義"的外套，自命爲一種傳統

的合法繼承者，而其實它是日復一日踐踏這種傳統的，所以它並不滿足於僅僅消滅那些反對它的主要人物，凡潛在反對它的人都必須被它迫得不敢說話。

在這些反對者當中，惟有托洛茨基堅持說話，不僅攻擊史大林主義，而且根據馬克思主義傳統解釋爲什麼會出現官僚專政。這樣一來，他就不可避免地成爲整個制度的主要敵人了。他的著作挖掉了這個制度的地基，雖然只是在理論上挖掉它。爲此原故，招來了系統性的迫害，人家決意要全盤抹煞托洛茨基的事業和思想。這是符合於幾萬人組成一大群特權者的自我保衛和自我辯護之本能的。史大林不過是這一大群罪犯中最有效力和最無羞恥的劊子手而已。這個解釋是比較前面的解釋更能令人信服的。

但這個解釋仍舊是不夠的。一般對官僚層來說，特殊對史大林來說，如果我們把他們看作害怕思想，害怕綱領，害怕揭發，害怕批評的分析，甚至把他們看作需要自我辯護，那就未免太恭維他們了，這一切在他們迫害托洛茨基，托派以及後來全體布爾雪維克黨上面，當然發生了作用，但除此以外還有原因。

托洛茨基和反對派中的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其所以被史大林和官僚群視爲"第一號人民公敵"，乃是因爲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能夠堅定地將對史大林，史大林派，以及官僚群批評和揭發化爲針對工人階級的政治活動。這個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受過教育的，又在革命的時代中受過二種活動經驗所鍛鍊的，這就是在一九〇五年以前和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三年之間，學會了結成小團體的活動；以及在一九二八年或一九三二年，學會了窺測工人活動的微弱的信號。他們學會了怎樣去參加和影響那些微不足道的鬥爭。他們學會了地下組織的藝術，耐心地建立聯繫，那怕一個工

廠中只有二個反對派工人，或一個大學中只有三個同情的學生，或只有二百個工人提出抗議，或一個極小規模的罷工。

史大林也是經過這種活動的，他也知道這種活動的方法，因此害怕托洛茨基和布爾雪維克會採用當初反對沙皇而得成功的手段來反對他。他能夠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實行妥協，列如他對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間的幾批投降派實行妥協，但他無法對那些在工人和青年之中進行宣傳和鼓動的人實行妥協。

他的想法並沒有錯，至少從歷史的觀點看來沒有錯。試想一想，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的革命中和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中，如果當時有布爾雪維克列寧派的組織在那裏活動，結果將會怎樣呢？即使他們只有一千人，即使沒有托洛茨基在他們背後，他們也不僅能夠代表本國的共產主義傳統，並使之具體化，而且能夠在最近十至十五年中同人民一起提出抗議，同工人一起提出要求。如此，我們就可以理解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是否存在於蘇聯，是關係於官僚專政能否長期存在下去的。由此可見，史大林仇恨和迫害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並非僅僅仇恨和迫害思想上的敵人；他仇恨和迫害的，是這樣一派共產主義者，唯有他們能夠帮助蘇聯工人階級去挖掉官僚特權和政權的基地而推翻之。

托洛茨基身上，那些被史大林和官僚所仇恨的品質，正是今後蘇聯工人和青年所要歡迎的和仿效的品質，這就是：不屈不撓地保衛工人的政治利益和物質利益，進行鬥爭反對官僚主義；擁護社會主義的民主；反對社會的不平等；反對特權；反對不受約束的權力；反對不公平；擁護婦女，青年，少數民族的權利；

反對歧視和壓迫。布魯耶帮助我們回頭跟着托洛茨基一起生活，熟悉他的日常生活細節，一年復一年，一月復一月生活下去。由此，我們知道了托洛茨基被開除出蘇共以後作爲反對派的倡議者和領導者一些鮮爲人知的生活方面。這是這本名貴傳記的最大貢獻之一。感謝布魯耶的努力，托洛茨基才能成爲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完整的政治組織的記述，並非過分地以托洛茨基爲中心的個人傳記。

這本書不僅寫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塞道夫，其中還寫了許許多多突出的活動家，他們都給布魯耶寫活了，布魯耶給他們每個人以姓名和政治地位，他們都是本世紀中最純粹的英雄男女。他們從不屈服，從不把一切歸於宿命。他們始終保持信心，堅信這場噩夢終有完結的一天。他們全體被殺死了。據一個目擊者說：他們像大橡樹那樣倒下去，一面咒詛史大林，一面呼喊蘇維埃政權萬歲，世界革命萬歲。我們要以有他們而自豪。將來，所有的蘇聯工人都要以有他們而自豪。有了他們，一切派別中唯獨我們可以坦然面對蘇聯人民而無愧色，無犯罪感無迷惑感。這些英雄保全了共產主義的榮譽和完整。

不幸的布哈林，在莫斯科第二次審判中面對"法官"作了最後的發言。他說：眞的，應當做托洛茨基來建議和作出這一切。他這話也許含有某種婉惜之意，是的，應當做托洛茨基來不倦地鬥爭，以求解放蘇聯的工人階級，使之在本世紀的子夜擺脫希特勒和史大林的恐怖。感謝布魯耶寫這本書，當代千萬人得以更明白懂得這個道理，而且懂得我們的事業並未喪失。

六

布魯耶這本書包含了半個世紀的世界歷史。書中

當然不能說盡一切事情。我們當然有自己的想法，認爲某些地方可以進一步發揮，某些地方應當删去，某些地方應當補入。

我們婉惜，布魯耶沒有提到托洛茨基分析美國黑人問題時所起的先驅者作用。（注2）我們也婉惜他沒有提到一個事實，即馬克思主義者之中唯有托洛茨基曾於一九三八年預言：如果爆發新的世界戰爭，歐洲一切猶太人就有肉體被消滅的危險。他也沒有提到史大林主義的第一個政治失敗，即西班牙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黨"受審判時，起初被控告爲同佛郎哥合作的罪名（這是無耻的譭謗）最後卻被定罪爲企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惋惜，布魯耶強調了巴多夫斯基同志五十年代向波蘭輸入托洛茨基思想的作用以後，却沒有提到我們的彼得。烏爾同志的作用，他是捷克反對派中最可尊敬的同志，爲他的托洛茨基主義繼續受官僚的攻擊，而且在斯大林的監獄中坐了六年。

我們特別驚訝，布魯耶那樣處理托洛茨基平反的問題，以及正在進行中的要求平反運動，——不僅西方新聞記者當作頭條新聞來寫，而且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重要派別也在進行。

我們從來不要求蘇聯政府——它是官僚層的政治代表——在政治上給托洛茨基平反。我們從來不承認它有資格做這事情。托洛茨基的政治作用和他的思想是一個歷史問題，只有蘇聯和國際的工人階級有資格判斷。我們從不懷疑他們的判斷最後將爲蘇聯共產黨所接受。

另一方面，我們要求過在法律上給托洛茨基平反，我們還須繼續這樣要求，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里昂·塞道夫在第一次莫斯科審判中，被檢察官和審判官控

告爲犯有駭人聽聞的罪，而且被缺席判決爲犯了這些罪。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審判的判決書中重申了第一次的判決。這就是托洛茨基被宣佈爲"人民公敵"，他的著作被禁止在蘇聯流通的法律根據。

現在，蘇聯的最高法院已經莊嚴地撤消這三次莫斯科審判的判決書了。蘇聯最高法院已經給那些根據完全僞造的證據而被判刑的老布爾雪維克平反了。托洛茨基難道是例外麽？在這個時候，除此之外還有甚麽方式在法律上給托洛茨基平反呢？

所以托洛茨基法律上平反的問題應當在更直接的政治平面上提出來。蘇聯萬千勇敢的男女正在進行運動，要求法律上給所有在史大林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包括托洛茨基在內，支持這樣一個鬥爭，難道不是我們的起碼的國際主義責任麽？布魯耶多半已經改變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如果他尚未改變，那麽希望不久之後他會改變。

但以上說的幾點都不能改變我們對於這本書的總的評價。這是一本大書，因爲它是客觀的，能感動人的，學識淵博的，它作出了我們同意的結論，現在和將來，它都是不可缺的工具，用來教育幹部和吸收同情者，我們還須等待很長久時間才會看到另外一本更好的托洛茨基傳，——也許要等待到蘇聯所有檔案都開放的時候，甚至在開放了一段時間以後。

（注1）見恩斯特·傑爾曼著的《布爾雪維克黨內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一九二〇——二一年）》發表於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第四國際》。

（注2）喬治·諾瓦克正確地強調了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上的貢

獻。他闡明了美國革命者的政治任務的中心方面。見印度巴羅達出版的《無產階級政治》一九八〇年第1／2期上發表的喬治·諾瓦克的文章《托洛茨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也簡單明瞭地介紹了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出的不平衡的配合的發展律並爲不斷革命論作辯護；不斷革命論就是以此發展律爲基礎的。喬治·布萊曼又更詳細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的）美國黑人問題的思想。

（子美 摘）

托洛茨基問題國際研討會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曼德爾

一個討論里昂。托洛茨基的國際科學研討會，在九〇年六月廿六至廿九日於西德伍珀塔爾市舉行。是次研討會由當地的大學主辦，全球超過一百廿位學者出席。其中十八位專家來自蘇聯，四位來自中國，十二位來自東德，另外十二位來自東歐國家。其餘分別來自西歐、北美及拉丁美洲國家。

每一位參與者就討論會事先準備一篇論文，合共超過一千五百頁。其中一部份將會以多種文字出版成書。

研討會上提出三個主要議題：一、托洛茨基由十月革命至其放逐出國期間，在蘇聯所扮演的角色。二、他對蘇聯社會分析的貢獻。三、他在發展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

不過，有一部分論文則論述其他問題。例如，一位英國學者議論托洛茨基與西班牙革命；一位奧地利學者談論托洛茨基及其道德，還有多位蘇聯學者討論托洛茨基與文學。來自列斯大學的格。班頓則評述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問題，而北京一位大學講師也論及此問題。

這些論文的科學性水平很高。在四天的辯論中，報告的氣氛是輕鬆的，許多論戰亦絕不是武斷的。會上沒有敵意的爭論，或者私人攻擊。這些辯論充滿了生氣，但又具有開放和多元化的精神。蘇聯學者經常與其他蘇聯學者爭辯，西方學者之間，托派之間，甚至非托派之間，都互相爭論。

這裏只能指出研討會上重要的論稿。其中最精彩的是來自東德的赫斯特（Herbst）的出色論文，他在論文中提出五年來蘇聯歷史學家如何處理托洛茨基的問題。史丹福大學的費爾新斯基教授（Felshinsky）論述托氏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出現明顯失敗後所提出的「世界革命」觀念的正確性。來自莫斯科馬列學院的菲索夫教授 （Firsov），則評論托氏在共產國際的聯合陣線政策的實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樣來自馬列學院的柯茲洛夫（Kozlov）和南斯拉夫盧布爾雅那大學的布列托夫（Britovtvek ）二教授，則談論托氏關於蘇聯特爾米多的觀念。

其中一個重要的論稿來自莫斯科的第米塞夫教授（Demishev）所論述的托氏思想對解決蘇聯今天面對問題的關聯性。

研討會首先着眼於蘇聯的第一篇關於托洛茨基的博士論文。這篇文的作者是一位年輕文學史家，他說：「托洛茨基成了我的偶像。」

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與者，以其極之客觀的評論受人注意。一般而言，他們對於托氏抱有既中肯又批評的意見。同樣地，西方參與者也抱有這種意見。雖然會上有不少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托洛茨基主義懷有敵意，並批評托氏，但是他們仍然承認托氏及其

思想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是次研討會亦揭露不少事件，使人驚愕。莫斯科馬列主義學院的樸士高定博士（Podshekoldin）就談到一些歷史性的記錄文件或檔案資料的發現，顯示出斯大林曾經將一九二三年在首都共產黨組織內對反對派文件進行投票的結果加以偽造。資料顯示後者實際上得到多數票贊成。

有不少蘇聯專家也洩露一些以前不可知的眞相，就是關於列寧與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至二三年的緊密合作關係。其他資料顯示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間，基洛夫（Kirov）身邊的一批重要的「溫和派」斯大林主義領導人，贊成讓托洛茨基返回蘇聯。

蘇聯將出版托氏傳記

華錫斯基（Vasetsky）一度是蘇聯「新聞社」的反托出版物的專家，他在會上宣佈幾週內將會出版一大本托氏文選，該文選由他自己編纂。保宜教授（Broue）宣佈莫斯科已決定出版他寫作的托氏傳記的俄文版。

一批學者是第四國際的成員或同情者，也發表論文。其中有墨西哥的阿基拉（Aguilar），西班牙的阿巴刺先（Albarracin），美國的高非（Goldfield），波蘭的哈斯（Hass），英國的班頓，西德的羅斯卓（Louscher），巴西／法國的盧威（Lowy），意大利的邁丹（Maitan），比利時的曼德爾（Mandel），西德的蒙尼達（Moneta），加拿大的莫羅（

Moreau ）。

一些自我界定爲托派的流派也有代表出席，包括法國的保宜，英國的甘普（Kemp ），法國的馬力（Marie ），希臘的拉廸斯（Raptis），英國的廸田（Ticktin）。

出席會議的還有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孫兒和爾可夫（Volkov），及來自莫斯科的安東諾夫—— 奧西哥（V. Antonov-Ovseenko ）後者曾著作有名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作品，他父親在十月起義時領導民衆攻打彼得格勒的冬宮，在一九二三年是「左派反對派」的創辦人之一，在一九三七年被斯大林下令殺死。

會上有些人曾經在斯大林主義的古拉格群島集中營、納粹集中營及資本主義國家的監獄裏坐過牢，他們坐牢的時間加起來超過二百年。會上一個感人的時刻，是蘇聯一間最大工廠加馬士拖拉機廠（有十四萬工人）的共青團的「布哈林俱樂部」年青領導人貝斯金（Pisigin），呼籲全體起立，悼念托洛茨基、托氏兒子西道夫（Sedov ）、布哈林、齊諾維也夫（Zinoviev ）、雷可夫斯基（Rakovsky ）及所有斯大林主義恐怖統治下的受害者。全場默哀一分鐘。默哀者包括了斯大林主義兇手的受害者以及曾經一度是這些恐怖手段的辯護士。歷史就是這樣……

（明秀譯自≪國際觀點≫）

托洛茨基問題討論會在莫斯科舉行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八日）

比蘭尼

1990年8月中，在莫斯科召開了一個會議，討論九〇年代托洛茨基主義的意義及如何重建第四國際。

會議由「重建第四國際工人國際」召集，出席者有「工人國際」各國的代表及蘇聯國內獨立工會運動的工人。會議選擇了在托氏被斯大林謀殺五十周年時召開。

有一些會議參加者開始對托洛茨基主義感到興趣，並不是因爲他們接觸到第四國際，而是因爲他們自己的研究。一名同志對我說：「我從官方的『反托』材料中抄寫它們引用托氏的說話，然後到圖書館試圖找出被斷章取義引用文句的原文。然後我抄寫全文，開始對托氏的主張有全面了解。當時我還在高中。我與朋友合作將托氏的作品翻印及散發。」

另一位同志是從一名年長的親戚處聽到關於托氏鬥爭的故事。那位長者曾支持「左派反對派」，但幸運地逃過斯大林的大清算。

這位同志被同學認爲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因爲他在勃列日涅夫時期上學時，在一次歷史課上談到布列斯特—— 列托夫斯克和約的問題時，他舉手發問：「那麼托洛茨基的論點不是也成立嗎？」

這位同志現在公開提出的問題是：是不是十月革命本身以及「內戰」中對反革命分子的「紅色恐怖」，導致斯大林主義興起。

我們因而要一再解釋，導致斯大林主義興起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革命受到孤立。

我們尋求建立第四國際的蘇聯支部這個工作，也不斷要回到這些根本問題上。

斯大林主義是否列寧主義的延續？勃列日涅夫的時候，官方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爲他們想說明斯大林主義是好的。現在，從克里姆林宮到白宮，整個反動的輿論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爲他們想說明列寧是壞的。

第四國際針對這個普遍的情緒，會不懈地戰鬥和發展。這裏所有工人疑慮地看看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將大門打開讓資本主義進入，他們會聽我們說的話。

例如，卡拉干達（蘇聯哈薩克第二大城）獨立工會運動一名礦工對我說：「我們最大的恐懼，是他們會以『經濟不化算』的理由關閉礦坑，而我們則無權發言。」英國礦工不是面對同一問題嗎？

我們與這些在圖書館裏認識托洛茨基主義的同志聯繫本身，解決了≪工人報≫兩年前的一個爭論。

當時，我們寫了一個標語，說「托洛茨基主義在蘇聯有生命力」，有些同志問：「你們怎知道？」有些同志堅持說：「大清算已將托洛茨基主義者全部毀滅，使工人階級各散分化。」

我們的回答是：思想比斯大林的鐵腕更爲有力。我們相信，托洛茨基主義並沒有被摧毀，它在蘇聯仍活着。　　（英國≪工人報≫）

莫斯科會議的決議

比蘭尼

八月下旬在莫斯科參加紀念托洛茨基被弑四十周年的四十多位人士，來自不同背景。會上，十四人（有些略有保留）聯署了一份聲明，表達了他們對某些根本問題的共同看法。

聲明開頭說：「我們要討論出一個眞正社會主義的綱領，能適應工人和所有勞動人民的階級利益。」

聲明指出，當思想由廣泛人民掌握時，就會成爲物質力量。「蘇聯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迫切任務，是宣揚革命馬克思主義，在仍然混亂的工人階級運動中推介革命馬克思主義。」

聲明認爲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就不可能由勞動人民通過進行政治革命取得解放。只有第四國際及其重新發展的蘇聯支部，才可以成爲這個政黨。

聲明強調，社會主義「只可以被視爲全球性的制度……我們鼓吹世界工人階級革命。」

聲明建議「在一九九一年在莫斯科召開一個會議，考慮成立第四國際的蘇聯支部，作爲重建第四國際的一項工作。這會議將歡迎所有尋求重建第四國際及爭取建立蘇聯國內獨立工人政黨的人士。」

爲籌備這次會議，「工人國際」成員及蘇聯的同志組成了一個委員會，在會議舉行前出版一個資訊刊物。

八月會議的與會者，有更多人聯署了第二份決議，要求在國家及政治平面平反里昂·托洛茨基——「

他與列寧一道是十月革命的領導人及紅軍的創建人。」

平反托洛茨基之後，必須「立即平反所有由於支持托洛茨基的思想而被判罪的布爾什維克。托洛茨基是列寧領導下的政治局內唯一堅持到生命最後一日仍與斯大林主義鬥爭的人。」

（英國≪工人報≫1990年8月25日）

會議參加者發言摘錄

英國≪工人報≫記者

在四十位參與者中，有來自哈薩克斯坦煤礦場的礦工，他們正爲籌備成立獨立的礦工工會。他們只有時間參與部分會議，沒有參加討論在蘇聯發展第四國際的有關議程。

莫斯科大學的學生，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共產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組織都有成員參與，也有一些人來自奧倫堡和別茲可夫。

曾經艱苦努力爭取令托洛茨基在蘇聯歷史的地位得以重新確立的一些學者和教師，也參與了討論。

「工人國際」的代表，則從匈牙利、南斯拉夫及西歐前往莫斯科。

××　　××　　××

主持會議的是史維域夫（Zverev），他屬於蘇聯一個名爲「紀念碑」的組織，該組織專門爭取平反被斯大林清算的受害者。史維域夫本人則致力於宣揚托洛茨基的政治歷史。

貝聆（Pilling）是「工人國際」的執委會成員，

他說：蘇聯工人階級面對的困難，基本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相同，就是要建立獨立於國家的工會，並與其他國家的工人兄弟姊妹聯繫，這就需要一個工人政黨，也需要一個國際工人政黨。貝聆說：「托洛茨基偉大之處，在於他是第一個人走出來領導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並揭露了由布哈林及斯大林主張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的反動性質。今日，同一斯大林主義官僚層陷入了嚴重的危機，這個官僚層要由工人階級推翻，蘇聯工人階級要在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前列擔負其角色。」

耶哥溫可（Yakovenko）是莫斯科一名工人，他說，「托洛茨基是偉大的人，但他的主張並非全部有用。即使是由他而不是由斯大林上台，也會有個人崇拜。」耶哥溫可主張通過「更大的經濟效率」（即實行市場經濟）來保持「全面的自由」。

匈牙利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波洛尼（Borovi）回應耶哥溫可的意見，描述了匈牙利在恢復資本主義的時候工人面對着失業和通貨膨脹的威脅。

一名「共產主義者聯盟」（一個無政府主義組織）的成員說：「我今天很高興與托洛茨基主義的同志一起交談。我們必須共同努力，保衛現存的國有財產。」

一位莫斯科的學生說，西方的模式並不吸引他，因爲這樣做蘇聯只會變成另一個智利或印尼，但他見不到除了經濟私有化之外，還有什麼其他出路。

波洛尼回答說，這不是「計劃經濟」對抗「市場經濟」的問題。問題是：由誰來決定經濟發展，如何作出這些決定。波洛尼主張工業應交由工人組成的工人委員會來主宰。

拜廸（Biets）是《共產主義幽靈》報紙編輯，他抨擊主張向西方開放的人。他認爲，向資本主義開放對工人是沒有好處的。

羅高雲（Rogovin)是社會學教授，寫了不少關於托洛茨基的文章。他打開了另一個討論。他說，蘇聯政府正試圖證明斯大林主義是列寧主義的延續，但「所有歷史經驗證明斯大林主義是在打敗列寧主義之後才勝利的。」

羅高雲呼籲與會者放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稱謂，與所有列寧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包括曾經是共產黨員的人）聯合。他認爲，托洛茨基預見了蘇聯會走兩條路：或是國有財產關係被反革命推翻，或是官僚層被革命推翻，而後者可以避免出現內戰。

比蘭尼（Pirani）是「工人國際」成員，他回應羅高雲最後的說法，認爲托洛茨基並不預見可以與斯大林主義官僚層「和平」協議，因此，並不能保證推翻官僚層的政治革命會是「和平」的。

比蘭尼說，蘇聯工人以成立獨立工會及進行罷工的行動，抗衡戈爾巴喬夫政權，已走上這條革命道路。

一位來自奧倫堡的同志向與會者建議必須尋求方法以廉價版本的形式出版托氏著作。

維諾夫（Voinov）是歷史教授，他指出，許多共產黨的領袖在斯大林未清算他們時，也是手上沾滿迫害他人的血，他們現在已經平反了。「但是托洛茨基是列寧時期政治局成員中唯一至死仍與斯大林戰鬥的人，他却未被平反。」

（英國《工人報》1990年8月25日）

反官僚層的先驅

——紀念托洛茨基遇難五十週年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日）

軍　行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給斯大林派遣的兇手傑克孫刺殺死了！

這宗暗殺，是在格別烏的精密策劃下完成的。傑克孫假冒第四國際的同情者，混進托氏的寓所下毒手。事後逐漸披露的資料，已證明斯大林是主使者。

冤案獲得平反

斯大林雖擁有龐大的國家機器（包括宣傳機器），但手中毫無眞理、正義，於是要靠捏造罪名誣衊、處死以至暗殺等最卑鄙手段，去殘害不同政見者；差不多一整代老布爾什維克領袖、幹部」(除病逝的列寧等人以外），都被他殺害了。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次大會的報告，詳細列舉了斯大林的許多罪行，那只是官方承認的一部份。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中，曾製造了三次大審判案，以叛國者、帝國主義間諜、人民公敵等莫須有罪名，處死了一大批領袖和幹部，早被驅逐出國的托氏也被

缺席判了罪。幾年前，在人民的壓力下，蘇聯法院已作出平反，宣佈這三宗審判案的被告被控的罪名都不成立。既然在這些案件中，托洛茨基都是重要的被告，甚至案件以他爲名，那就是同時宣佈托氏無罪，過去對他的指控都是誣陷了。實際上，當時由杜威博士等國際名人組成的調查團，已經根據資料證明托氏等被告無罪。現在，經過半個世紀才正式平反，雖然很遲，但依然表明：斯大林誣害政敵的罪行，最終仍不得不由官方予以證實。

戈爾巴喬夫近日還下令，要給斯大林時期的幾千萬受害者進行複查、平反，再次顯示出斯大林罪行的駭人聽聞！這種情況，有如中共幾十年來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而被迫加以平反一樣。（其中一例是：中共在抗戰初期汚衊中國托派和陳獨秀領取日帝津貼，充當漢奸；多年前終於由大陸史學家所批駁，中共黨史研究室副教授王洪模也在官方刊物上指它是「毫無根據的」。）

反官僚層的先驅

斯大林要萬里追殺托洛茨基，特別反映出他對托氏所代表的政治思想和事業非常懼怕，深感到托氏這位反官僚層的先驅的潛在威脅。

托氏從1924年起，已經提出蘇聯必須民主化，反對國家和布黨的官僚化。他是第一個人，從理論上剖析了蘇聯特權官僚層產生、發展的過程和原因，說明它是蘇聯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必須進

行政治革命推翻這個官僚層及其專政，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政制，才能解決蘇聯的主要社會矛盾，蘇聯經濟才可能飛躍發展（詳見托氏著：≪被背叛的革命≫）。

托氏同時論證了：斯大林已完全背叛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事業，使第三國際及蘇聯共產黨徹底墮落成了官僚層的工具；各國共產黨也變成了克里姆林宮的外交侍從。托氏反對斯大林的「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理論，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也因此，必需建立新的國際，以取代第三國際而領導世界革命。第四國際於是在1938年正式成立，提出其≪過渡綱領≫，在思想理論和鬥爭經驗各方面，繼承了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革命傳統，保持了革命運動的承續性。

這些事實，使斯大林視托氏爲最可慮的政敵、最大的眼中釘，必須加以拔除。

托氏的去世，令世界革命運動喪失了極重要的領導人，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

但歷史很快就證明：斯大林不但背叛了世界革命，而且，還在1943年索性把第三國際解散，亦即是把政治上早已腐爛的屍體埋葬，連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也不要了。各國共產黨從此更加追求自己的狹隘民族主義利益。而只有第四國際，才一直不懈地堅持革命鬥爭，不斷地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張向群衆宣傳、鼓動，闡釋新的事變，指出人類應走的道路。

新的證驗

幾十年來，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中，托洛

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都從正或反方面得到證驗。他從二十年代起在蘇聯爭民主、反官僚的革命主張，也在五十年代的東德、匈、波、捷等國家的反官僚革命或鬥爭中，特別是近年來在東歐、蘇聯的結束一黨專政的革命或鬥爭中，得到證驗。

但由於斯大林主義官僚層及其各國支持者（共產黨）一向冒充代表社會主義、馬列主義，因而嚴重地敗壞了社會主義、馬列主義的形象，大大地帮助了資本主義勢力在東歐一些國家中乘虛而入，迅速壯大，特別是東德，竟給西德帝國主義的銀彈政策所「統一」（等同於吞併）了；但統一後的德國，困難和問題將日益增多，甚至在將來，強大的德國會第三次引發世界大戰，重演過去的大悲劇，這就顯示出，人民將來仍要在戰爭還是社會主義這兩者中選擇，而後者則顯然是唯一的出路。

以波蘭來說，團結工會政府近來實行市場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靠攏，但很快已結出許多惡果，步履維艱，矛盾重重。再向資本主義道路走去，矛盾和惡果將更大，工人階級的反抗會更強。

現在，東歐、蘇聯都在產生各種左派，一方面反對官僚專政，另方面反對資本主義，堅持科學的社會主義，即民主的、自管的、非全面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儘管它們的初生力量仍很微弱，但不少左派的政治方向大體上是正確的，在自由的政治環境中，很有機會獲得群衆支持，從而壯大起來。其中許多組織都有可能與第四國際連繫和合作，在政治上會產生共鳴和一致性。

托氏在俄國革命和蘇聯建國過程中所起過的非常

重要作用，在斯大林當權及以後一段長期間內，都完全被抹煞了；但多年以來，蘇聯以至中國的史學家已公開給托氏以良好的評價—— 雖然還未完全如實地評價；而且，1924年以後主張蘇聯和黨民主化、反對官僚專制、繼續努力國際共運等進步事蹟，仍未加以正面肯定。

不過，隨着蘇聯、東歐民主民族運動的蓬勃發展，這些國家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熱心研究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張；而托氏的部分著作也開始在蘇聯等國重新出版發售。這將會大大有助於復興馬克思主義（包括托洛茨基主義），爲當前面對的政治思想危機提供一條出路，重新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的理論遺產進行思想武裝。

歷史在前進

托氏逝世後，五十年來的歷史發展說明了：

第一、斯大林及其繼承者領導的蘇共，以及追隨他的各國當權共產黨，縱使掌握了全國政權，擁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力量，却對人民實行極權專制統治，使盡一切卑污手段（包括羅織罪名、製造冤案、監禁以至處死、造謠欺騙、暗殺，等等），對任何反對者或不同政見者施以殘酷的迫害。它們竟然使用一切卑鄙的手段，表明它們已腐敗到無以復加地步，預告了它們的最後失敗。結果，冤假錯案被迫要平反，造謠欺騙被戳穿，暗殺罪行被揭發，一黨獨裁制被群衆唾棄和爭取結束它。

第二、托洛茨基（以及他的支持者和組織）雖然

長期間受盡迫害打擊，他本人和許多同志遭到格別烏暗殺，他們的思想主張受到污衊歪曲，革命形象遭到造謠破壞……但眞理始終會戰勝罪惡，歷史總要向前進，眞相總會大白；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及其許多國家支部）的經歷就是這樣「翻身」的明顯例子。

第三、今天，在全人類面前受到廣大群衆排拒、反對的，其實是斯大林主義（它全力維擁官僚層利益和極權專制的統治），而不應該是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的破產，它的一個個政權走向崩解，爲群衆的興起消減了一些大障碍，爲革命領導的成長開啓了新的機運，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張也將得到日益增多的群衆認識和接受，使第四國際的政治影響擴大，力量加強，從而對革命領導危機的克服作出貢獻。

托洛茨基昭雪了嗎？

——他的外孫說，他對於俄國的意見歷史證明是正確的——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伏爾可夫

墨西哥城，夏日，一個陽光明朗的、空氣清涼的早晨，屋子和花園，寂靜無聲。一個老人從屋裏走出來，邊掃地，邊進入大門的門廊。花園修飾得很好看，這裏那裏有仙人掌，有雛菊，又有其他的花，正在盛開，散發出紅光、黃光。

一點看不出這裏曾發生甚麼暴力事件；但還是有表明恐懼的痕迹留下來的。這是一座樸素的、寧靜的屋子，鄰居都是中產階級的人家，從墨西哥城驅車半小時就可以到這裏。可是，屋子朝牆外的窗子至今還是半堵塞的；屋子四角又有崗樓，雖然現在那裏，沒有人守衛。外牆仍舊砌得很高。

這是里昂·托洛茨基遺下的房屋。他是俄國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是紅軍的締造者和統率者。他就是在這座屋子裏，在流亡中，被一個叫做拉蒙·麥

加德的人所殺死的。這個兇手僞裝爲他的信徒，混入他的身邊，半個世紀以前，8月20日殺死了他。事情發生好多年以後，這個兇手才在私人談話中承認：他是蘇聯的秘密警察，奉上司命令來殺死托洛茨基的。

在這50周年紀念的日子，這座屋子，作爲博物館，又對外開放了。最近，墨西哥成立了一個研究院，叫做"政治避難權和公共自由權研究院"。院址就設在近旁。這個博物館現在就屬於這個研究院管轄。

由於蘇聯以及東歐諸國發生了戲劇性變化的原故，那一天，蘇聯駐墨西哥的大使也參加博物館的開館儀式。

對於愛斯特班·伏爾可夫（托洛茨基的外孫）說來，過去一年異乎尋常的形勢發展，證實了他的外祖父的一些看法。63歲的伏爾可夫說："現在大家宣稱社會主義破產的只是斯大林的官僚主義，他的極權主義制度。托洛茨基早已說過，這種制度沒有歷史的生命力，不會成功的。這種制度毫無社會主義成分或共產主義成分。托洛茨基又說，蘇聯官僚也許要在蘇聯完成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托洛茨基還是在50年以前說過這話哩。"

伏爾可夫身高約爲6.7英尺，身裁中等，頭髮白了。他的額頭突出瘦骨嶙嶙，尤其他眼神總是凝視着對象，—— 這些都像照片上的托洛茨基。他是一位化學工程師，居住在距離外祖父家只有幾分鐘路程的一個富庶的住宅區內。因爲他是托洛茨基的外孫，所以一生坎坷。他的母親，托洛茨基的女兒，1933年在柏林自殺了。他的父親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他的舅舅里昂·西道夫，托洛茨基的兒子，死在法國，1938年被人

毒死的。他的童年是在柏林和維也納度過的。他也曾同他的流亡中的外祖父一起住在土耳其的普令基波島，最後住在墨西哥。

但伏爾可夫不願意回答他生活上的問題。他說西班牙話，帶有濃重的墨西哥口音。他顯然有意把話題轉移到托洛茨基及其遺產去。他提到托洛茨基時，只稱“托洛茨基”，不稱“外祖父”。這是表明，他說的不是他的家庭問題，而是政治思想，世界歷史，發生過重大作用的人物，暗殺事件。

他說：“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中的貢獻，是傑出的，衆人皆知的。但他還有一個貢獻，即是爲反對斯大林主義，反對斯大林僞造歷史而鬥爭。”爲了這個鬥爭，托洛茨基被流放了好多年，最後被奪去了生命。

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娜塔利亞是1937年1月9日來到墨西哥的。在此以前，他經歷了艱苦的流亡生活。他原名白朗斯坦，是俄國革命領導人之一，又是最重要的理論家和軍事家之一。1923年，爲了革命的方向和方法問題，他同斯大林進行了一場生死鬥爭。他在這個鬥爭中失敗了，於是一落千丈。1927年被開除出黨；一年之後被放逐到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1929年他被驅逐出國，住在土耳其的普令基波島；1933年他遷居法國；二年之後又遷居挪威。在挪威，被軟禁了幾個月。其他歐洲國家都不許他遷去避難。最後由於墨西哥一羣托派（其中有著名畫家里維拉）的活動，他於1937年遷居墨西哥。

里維拉及其夫人弗里達·加洛（她也是畫家）將他們的屋子“藍屋”供給托洛茨基居住。但主賓雙方

因事發生爭論，托洛茨基便將這座在墨西哥城的“藍屋”交還里維拉夫婦而搬到這座屋子來了。現在這座屋子距離“藍屋”不遠，位於維也納大街和穆勒洛斯大街的交叉點上。托洛茨基是1939年5月間搬來的。在這裏，同在流亡中其他地方一樣，總有一羣人，他的信徒，同他們夫婦住在一起。其中有做秘書的，做翻譯員的，做警衛員的。墨西哥的一羣托派也自願地來此守夜。

伏爾可夫被外祖父接到墨西哥時，只有13歲。他當時住在法國。他至今還保留着外祖父的印象，覺得老人不知疲倦地積極地工作。

“他每天很早就起來，餵兎子，餵鷄，然後進書房去工作。他一天絕大部分時間都在書房工作，在那裏看書，寫字，或口授書信。”

“他有一個異乎尋常的頭腦，又有豐富的精力。他完全確信自己的思想是正確的。他毫不懷疑自己正在進行的鬥爭。這就使他具有一種心安理得、一往直前的心態。”

這座屋子的主要建築物中有一個小房間，白天也是陰暗的。伏爾可夫少時就是住在這裏。一扇低矮而狹窄的小鐵門可以通往托洛茨基的寢室。這寢室很樸素，只有一張短床，一個衞生間，一張圓桌，一頂草帽（娜塔利亞戴的），一枝手杖，兩個鏡框（都是里昂·西道夫的照片）掛在牆上。窗子是狹窄的，上面裝有鐵柵欄。

另一個狹窄的厚鐵門則是通往書房去的。托洛茨基每天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書房內。今天，書房桌子上堆着許多書；一塊剪報已變黃了，那是從《聖路易

環球民主報≫剪下來的，時間是1940年2月2日。這塊剪報放在空椅子面前的吸墨紙墊板上。2頁打了字的稿紙放在吸墨紙墊板的左邊。桌子上常用的文具當中有幾支筆，一個墨水瓶，一封攤開的信，兩隻圓形的淡黃色的玻璃杯，已經破了的。一張墨西哥大地圖掛在背後的牆上。一張小床擺在遠處一個角落。幾張椅子和三個書架則從這堵牆邊擺到那堵牆邊。此外，房內沒有擺設了。

廚房是小的。飯廳狹而長。飯廳過去就是秘書們的辦公室。再過去是娜塔利亞的書房。托洛茨基搬來以前，這座房子的所有窗子都是封閉的，堵塞了一半的，以致在早晨陽光之下也是陰暗的。

伏爾可夫對於這座房子的回憶中，至今留下不忘的印象，最多的是“同志的友誼，相互的感情，溫暖。”他說：“這簡直是一個大家庭，其中有一個家長，對人親切，關懷，又有幽默感，在談話中從來不缺少鹽和胡椒。”

伏爾可夫又記起了：“當時大家經常感覺到在圍城中過生活。”

他至今還氣憤地說：“斯大林派報紙上經常攻擊我們，譭謗我們。他們公然叫嚷「托洛茨基是美國帝國主義僱用的奸細。」在此以前，他則說托洛茨基是納粹的走狗。可是，斯大林同希特勒訂立協定以後，他們改變論調了。這一切都是胡說八道。”

1940年5月24日夜裏，一羣武裝的人在共產黨員畫家大衛·阿發羅·西格托斯領導下，闖入這座屋子，要殺害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寢室內至今留下十幾個彈洞在牆壁上就是這件暴行的明證。托洛茨基和娜塔

利亞沒有受傷，但伏爾可夫腳上中了彈，秘書羅勃。綏東。赫德則失踪了，——幾天之後，發現他被綁架，最後被殺死。

伏爾可夫說："托洛茨基本是一個幸運的人，經過那幾年國內戰爭也平安無事。"說到此，伏爾可夫停頓一下含笑說："可是，這一夜還是娜塔利亞救了他。托洛茨基睡着了，她喚醒他下床。托洛茨基白天用腦過度，夜裏總要吃安眠藥的。他聽到槍聲，還以爲街上有甚麼宗教迷信活動哩。"

這個襲擊事件，使這座屋子增加了防衛措施。通向花園的窗子堵塞得更小了，有些還裝上2英寸厚的鐵板。剩下的一個陽台也撤掉了。屋內房門都裝了鐵門。外牆則增高1英尺，另外構築了一個崗樓。

托洛茨基的好多張照片，在墨西哥照的，有釣魚的，有郊遊的，有採仙人掌的，現在還掛在這個博物館的一個小畫廊內。伏爾可夫指着這些照片說："這不是他日常做的事情，偶然幾次而已。那夜襲擊之後，這一切事情都不做了。"

伏爾可夫回憶一件事，即每天早晨起來，托洛茨基總要對娜塔利亞說："娜塔利亞，他們又讓我們多活一天了。"

兇手拉蒙·麥加德化名比利時人杰克·莫蘭，新聞記者，通過某一位親密朋友的介紹，混到托洛茨基身邊來。他自稱爲同情者。

1940年8月20日，星期三，他來看托洛茨基，携帶一篇論文，請托洛茨基指正。那時，托洛茨基正在花園餵兎子，兩人見面後一齊進書房去。托洛茨基坐下來看文章，麥加德則繞到托洛茨基背後去，用一把

登山斧猛砍托洛茨基的後腦。托洛茨基次日即因傷重死去了。

麥加德受審，定了罪，判了20年徒刑。他1960年6月刑滿釋放，1978年死於古巴。公開說話時，他否認同斯大林、同蘇聯的秘密警察有任何聯系，而自稱爲托洛茨基的信徒，隨後覺悟受騙，而自覺行事的。但報載，麥加德獲得了一枚“蘇聯英雄”的勛章，死後葬於莫斯科的克格勃公墓。

托洛茨基死後，這座屋子並未空關，娜塔利亞·西道娃仍住在那裏，直至1960年。她於1962年死於巴黎。她的骨灰現在同托洛茨基的骨灰一起埋葬在這座屋子的花園裏，上面立了一塊簡單的小型的墓碑，碑上飄揚着一面蘇聯國旗。

伏爾可夫也住在這座屋子裏，他睡在以前秘書們工作的房間，直至1972年。“我在那裏結婚的，我的女兒就是在那裏出生的，”他說。

托洛茨基的故居是在1975年開設爲博物館的，大部分的費用由伏爾可夫負擔。差不多二年以前墨西哥城才接管了這座屋子，作爲公立的博物館。屋內外一切保持1940年的原狀。

重新開館的儀式上雖然有蘇聯大使正式參加，伏爾可夫却未期待他的外祖父在蘇聯國內的身份能夠迅速改變。

伏爾可夫說：“托洛茨基在蘇聯官僚手中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他在俄國革命中的豐功偉績是必須承認的，但他的政治思想還是不許傳播。作爲官僚主義的批評家，他直接侵犯了官僚的利益，官僚們感受到他的攻擊。”

"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的鬥爭是經常地接連不斷地進行的。他認爲斯大林主義是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爲宗教的教條，變爲統治和降服的工具；以此進行了反革命，以此造成了一個特權的人羣，掌握着政權。"

伏爾可夫停頓了一下又說：

"那不是托洛茨基所追求的革命！"

[本文譯自《波士頓環球報》副刊《活藝術》出版，作者是此報的編輯。]

我國八十年代
托洛茨基研究回顧

（一九九〇年）

喬　健

托洛茨基是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早期歷史上一位很有影響的人物，也是我國新時期蘇聯現代史和國際共運史學界研究討論的重點。80年代以來，我國學術界本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宗旨對托洛茨基問題進行重新研究和再評價，發表了一批學術論文，還出版了專著。現將研究情況綜述如下。

(一)

建國以來很長一個時期，由於極“左”思潮的嚴重干擾，托洛茨基幾乎就是叛徒、特務、間諜的代名詞，托洛茨基問題是一個學術研究的禁區。歷史工作者對這一問題的闡述都是循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定下的基調大張撻伐，根本談不上進行嚴肅、求實的學術研究。這個時期取得的唯一成績是翻譯了一批“供批判用”的托洛茨基著作，如《不斷革命》、《被背叛了的革命》、《斯大林評傳》和《托洛茨基言論》等。即使是70年代末期發表的一部份有關論文①，也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左”傾教條的束縛，跳出《簡明教程》設置的藩籬。

我國對托洛茨基進行真正嚴肅的學術研究始於80

年代以後。經歷了十年動亂，我國學者痛感到有必要重新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爲我國新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借鑒，而解決正確評價托洛茨基的難題，將有助於深刻理解蘇聯早期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許多重大爭論，也有利於我們在蘇聯過渡時期歷史研究上獲得一個新的重要突破口。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學者在認眞研究、獨立思考的基礎上推出了80年代第一批托洛茨基的研究論文。具有代表性的有蔣琦、張月明合寫的《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林英、易可信、潘培新的《托洛茨基和現代托洛茨基主義問題》②，等等。這些論文概括介紹了國外對托洛茨基的研究動向，有關檔案文件的開放情況，評述了托洛茨基的生平活動和思想觀點，以及第四國際的發展演變等問題。立論持平，態度嚴謹，但有些評論仍受到"左"的思想影響，探討也不深入，帶有撥亂反正過渡時期的特點。

1981年10月，上海市歷史學會世界現代史組和上海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共運史組聯合舉行托洛茨基問題學術討論會，華東師大政教系的蔣琦、周尙文以《如何全面評價托洛茨基的一生》爲題，系統介紹了他們對托洛茨基的研究成果。蔣琦認爲，托洛茨基既是個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也是個複雜的歷史人物，學術界應該對他深入研究。蔣、周兩人都認爲，蘇聯20與30年代對托洛茨基所作的結論不夠全面和公允，應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根據歷史的本來面目，區分他的功過是非。周尙文認爲，托洛茨基在俄國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時期"爲黨爲人民立下了功勞"，對此不能抹煞；新經濟政策和工業化時期，托洛茨基

“沒有做多少對黨對人民有益的工作，錯誤是主流”，但其錯誤主要是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論問題，不屬於敵我矛盾；1929年以後流亡期間，他的活動客觀上適應了帝國主義的反蘇需要，給整個國際共運帶來極大的危害，因此“不值得給予肯定”。周尚文還就研究評價托洛茨基的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爲由於研究資料的缺乏和托洛茨基問題本身的複雜性，應對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採取分段分期或者專題性研究和分析的方法。③這次討論會在學術界反響強烈，特別是周尚文提出的分階段評價托洛茨基的方法得到了研究人員的廣泛認同。

80年代以來，我國學術界先後翻譯了一批托洛茨基的重要著作和有關歷史文獻，如《我的生平》（華東師大出版社1980年版）、《論列寧》（張海濱譯，三聯書店1980年版）以及《四十六人政綱》④、《十三人聲明》和《八十四人聲明》⑤。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俄共領導人在有關工會問題爭論和維護對外貿易壟斷制等問題上發表的講話、論文以專題形式翻譯出版⑥。中央編譯局還組織人力計劃將蘇共歷次代表大會的速記記錄譯成中文，個別卷已付印成書⑦。這些工作極大地方便了對托洛茨基以及對整個蘇聯現代史研究的開展。此外，我國學術界還有計劃地翻譯出版了一批國外蘇聯問題專家撰寫的有關托洛茨基的論著，如對馬忠行的《托洛茨基主義》（劉大洪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巴斯馬諾夫的《三十至七十年代的托洛茨基主義》（苗爲振等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弗朗克的《第四國際》（劉宏謝等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亞歷山大的《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義》（高銘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以及多伊徹、卡密凱爾、柯拉科夫斯基、曼

德爾、戴和麥克萊倫的有關論文或論著的片斷。雖然這些專著和論文並不能完全反映國外托洛茨基研究的水準和全貌，但無疑開闊了我國學者的視野，拓寬了研究的思路和領域。

(二)

8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對托洛茨基的某些專題研究有所深入，從發表的論文著作來看，研究的熱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上：

首先是對“不斷革命”論的評價問題。“不斷革命”論是托洛茨基一生活動的理論基石，研究他的生平思想不能不從這一理論入手。1981年蔣琦、張月明發表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評析》一文，首次對這一理論進行重新評價，因而廣受注目。作者認爲，20年代斯大林對“不斷革命”論的批判在相當程度上曲解了這一理論，托洛茨基對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認識較爲明確，對革命勝利後建立的政權所作的分析也“似乎是正確的”。但他確有貶低農民革命積極性的一面，他否定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也是錯誤的。⑧不少學者撰文評述“不斷革命”論，然而看法却大相逕庭，李顯榮的論文代表了另一種的觀點⑨。他認爲，“不斷革命”論纂改了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有關思想，忽視民主革命階段，想跳過農民運動，逕自直接搞“純社會主義”革命，這個理論是“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混合物。薛漢偉等人分析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托洛茨基對其理論所下定義的發展變化。⑩

另一個熱點涉及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和內戰期間的作用的評價問題。李顯榮在《托洛茨基與俄國兩次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文中指出，除“不斷革命”論以外，應該肯定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的活動和其他主張，他對待二月革命的態度，有關俄國政局和革命前途的很多看法“基本接近列寧的觀點”。總的說來，從1905～1917年期間，托洛茨基“是革命營壘中的人，不是革命的異己力量”。⑪李顯榮在他的另一篇論文中專門評述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內戰中的作用，指出托洛茨基積極參與和領導了1917年十月武裝起義，並且在三年內戰中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認爲這一時期“是托洛茨基政治生涯中的‘黃金時期’”。⑫賴小剛探討了托洛茨基與蘇聯紅軍的建立問題，他認爲，西方學者稱托洛茨基爲“紅軍奠基人”的讚譽並非過份，紅軍正規化路綫是由托洛茨基最先倡導，並得到列寧支持而付諸實施的。⑬

有關托洛茨基與蘇共黨內鬥爭問題，也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門話題。陳旭東探討了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談判期間拒簽和約、宣佈停戰復員軍隊的行爲以及他的“不戰不和”主張。認爲“不戰不和”的主張雖然有錯，但結合當時具體情況是可以理解的。托洛茨基拒簽和約雖然“有悖於列寧的思想，但無違背列寧直接指示的事實”，更沒有違背黨中央當時的立場和決議，他的錯誤只是工作上認識上的問題。⑭對托洛茨基很有研究的周尚文分析了托洛茨基在俄共（布）黨內有關工會問題爭論期間的錯誤，認爲托洛茨基的錯誤“主要在於對待群衆、聯繫群衆的方法問題上帶有嚴重的‘左’的色彩”，更爲嚴重的是，他在一個錯誤的時機挑起爭論，並使爭論逐步升級，從而加劇了黨和蘇維埃國家所面臨的困難。⑮周尚文還探討了托

洛茨基對待新經濟政策的態度。他認爲，托洛茨基雖然肯定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性，但與列寧的出發點完全不同，他把新經濟政策僅僅看作是蘇維埃政權爲克服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採取的“權宜之計”，視農民爲資本主義勢力的根源，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貨幣關係和市場經濟，進而主張用犧牲農業的方法加快國內工業化的速度，這些看法是錯誤和有害的。⑯關於俄共（布）1923年黨內鬥爭，安大峰認爲，列寧晚年與托洛茨基關係較好，他們在很多問題上觀點一致或接近。托洛茨基在列寧逝世前後挑起的黨內鬥爭中，雖然抓住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問題，有其合理一面，但他抬高自己，貶低別人，不遵守黨的民主集中制，搞派別活動，“反映了他個人品質上的缺陷”。⑰

除此以外，有的學者撰寫了評述托洛茨基主義的歷史和現狀的論文及專注（閻志民《托洛茨基主義的歷史和現狀》，載《世界史研究動態》1983年第1期），對托派活動的特點、戰略方針、依靠力量、發展階段和各個派系集團進行了有價值的探討。有的學者分析了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和策略（李顯榮《試談托洛茨基的中國革命觀》，載《世界歷史》1985年第11期）。這些學術成果從不同側面豐富了托洛茨基的研究。

㈢

回顧80年代托洛茨基研究，不能不敘及已故著名蘇聯史專家李顯榮的研究專著《托洛茨基評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這是新時期我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蘇聯歷史人物傳記，也是80年代托洛

茨基研究的集中成果，正如朱庭光在緒言中所指出的那樣，此書"大體上準確地勾劃了托洛茨基從一個嚮往革命的青年學生成長爲職業革命家，又由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的一位重要領導人蛻變爲政治流亡者的一生。"這本書的發表曾受到國內外輿論界的關注和重視。朱庭光認爲，《托洛茨基評傳》史料較爲充實，對涉及托洛茨基一生的一些重要問題的敘述和分析"比過去一些說法更爲接近歷史實際"。同時，他也指出，本書作者在研究著述的過程中思想沒有放得很開，對托洛茨基在進入新經濟政策時期前後提出或支持的一些政治主張和理論觀點記述分析似嫌不足，有些問題上揭示歷史眞相的深度不夠。但勿庸諱言，本書的出版使我國托洛茨基問題研究的整體水平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綜上所述，十年來我國歷史工作者在托洛茨基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有些論文、論著有一定的深度，達到了比較高的學術水平。但是，托洛茨基問題畢竟是蘇聯史中一個較爲複雜、敏感的問題，與討論熱烈的布哈林問題相比，不論在論文的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還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要求我們迎頭趕上。依筆者愚見，當前托洛茨基問題的研究仍然需要繼續解放思想、拓展領域，如"不斷革命"論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變化及其評價問題；列寧逝世後聯共（布）黨內鬥爭的是非曲直，如何看待托洛茨基及反對派的政治主張和理論觀點；托洛茨基對斯大林時期官僚集權體制的分析批判；等等。另一方面，還應加強研究工作的"基本建設"，組織翻譯介紹一批新近公開的檔案文獻和國外權威性的研究專著（如尼－帕茲的《列

昂·托洛茨基的社會政治思想》）。我們相信我國的托洛茨基研究在90年代將取得更大的成績。

註　釋：

①參見鄭異凡《托洛茨基》，載《馬列著作編譯資料》第4輯；趙邨方《托洛茨基是列寧主義的死敵》（《吉林師大學報》1977年第5～6期）。

②《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1981年第61期；第18期。

③《世界史研究動態》1982年第1期；《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1982年第14期。

④《世界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12期。

⑤《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9輯。

⑥參見《馬列主義研究資料》1982年第3輯；1984年第4輯。

⑦《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⑧《世界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11期。

⑨《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混合物》，載《蘇聯現代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85年版。

⑩薛漢偉等《革命與不斷革命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⑪《世界歷史》1986年第10期。

⑫《關於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內戰中的作用的評價問題》，載《蘇聯歷史》創刊號。

⑬《托洛茨基與蘇聯紅軍的建立》，載《世界歷史》1988年第7期。

⑭《關於對托洛茨基1981年2月10日聲明的一點看

法》，載《世界史研究動態》1989年第3期。

⑮《工會問題的爭論和列寧對托洛茨基的批判》，載《蘇聯現代史論文集》。

⑯《托洛茨基與新經濟政策》，載《蘇聯歷史》1983年第2期。

⑰《列寧逝世前後的托洛茨基與俄共（布）黨內鬥爭》，載《世界經濟與政治內參》1985年第12期。

（轉載自《世界史研究動態》1990年第12期）

托洛茨基無罪，托派無罪

——中共應當平反中國托派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日）

鄭超麟

一九八八年是蘇聯大平反的一年。三十年代莫斯科公開審判的三大冤案都在這一年平反了。這年二月四日蘇聯最高法院爲「右派——托洛茨基聯合反蘇案」宣佈平反；六月十三日蘇聯最高法院又爲「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中心反蘇案」和「托洛茨基平行中心反蘇案」宣布平反。最高法院公佈之外，還有蘇共中央政治局附設的平反委員會（原名爲「重新研究三十至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迫害材料委員會」）的公告。前一案是二個公告同時發出的，後二案則是六月十三日先發出最高法院的公告，八月四日才發出平反委員會的公告。平反委員會八月四日的公告，除宣佈爲後二案平反之外，還宣佈爲以前非公開審判的二個冤案平反。

公開審判的三大冤案，案名都有「托洛茨基」，三大冤案都平反了，托洛茨基當然也得到了平反。這還有甚麼問題麼？所以一九八八年八月六日上海《解放日報》登載蘇聯平反委員會公告這條新聞時，加了一個副標題：

爲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

恢復名譽。

外文叫做「恢復名譽」，中文就叫做「平反」。

有人根據公告上，「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聯合中心案」項下，沒有提托洛茨基之名，而且說明此案被告只有十四人，以爲托洛茨基不在平反之列。可是公告後面又說：「蘇聯最高法院決定撤消原判，爲四個案件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復名譽」。托洛茨基不是本案中缺席判決死刑麼？怎麼能夠說他不在平反之列呢？

這裏提出了：托洛茨基是否在本案中缺席判決死刑的問題。

我一直記得托洛茨基是在本案中缺席判決死刑的。我個人的回憶可能有錯誤；但查考李顯榮所著≪托洛茨基評傳≫，則書中第五百六十六頁明白寫着：「托洛茨基與其兒子也被缺席判處死刑。」不久之前出版的羅伊•麥德維杰夫所著≪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第一百九十五頁也明白寫着：「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舉行的第一次莫斯科公開審判中，托洛茨基就被缺席判處死刑。」

然而，出乎我意外的，是看到了一篇報道，那裏說托洛茨基的外孫伏爾可夫一九八八年去莫斯科，向蘇聯法院要求給他的外祖父平反，法院回答他說：「蘇聯法院從來沒有判處托洛茨基任何刑罰，因此沒有甚麼冤屈需要平反的。」這就奇怪了。難道沒有缺席判處死刑這件事實？總之，伏爾可夫沒有拿出這件事實來回答法院，別人也沒有引證這件事實，好像在一九三六年八月的審判中未曾缺席判處托洛茨基死刑。

我的記憶是錯誤的麼？李顯榮和麥德維杰夫的記載也是不可靠的麼？

必須找到當年的判决書爲根據。

我終於找到了一九三六年八月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對於「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聯合中心反蘇案」所作的判决書。茲抄錄其中有關托洛茨基父子的一段於下：

> 「根據被告斯米爾諾夫，哥爾茨曼，德列伊切爾，瓦。沃爾別爾格，弗里茨。達維德，別爾曼。尤林等的口供，以及本案現有的各種材料，均證明：現居留國外的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西道夫確係暗殺蘇維埃政府和聯共（布）領導者的暗殺團之主謀者，曾直接參加與親自領導這些暗殺工作。如遇在蘇聯境內發現該父子的行踪時，應立即逮捕，交由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審判之。」

上引這段判决書的話，我想是可靠的。原來蘇聯確未缺席判决托洛茨基父子死刑，不過以判决書的形式確定托洛茨基父子犯了罪，如果他們進入蘇聯國境，就可以逮捕交付法院判刑。

我們現在不必去研究爲甚麼這種意義的判决會被人誤解爲缺席判决死刑。我們現在只要指出蘇聯最高法院回答伏爾可夫時的詭辯。他們說「蘇聯法院從來沒有判處托洛茨基任何刑罰，因此沒有甚麼寃屈需要蘇聯法院平反。」可是上引那段話也是一種判决呀！它判托洛茨基有罪，如到蘇聯境內來，就可以逮捕審判。這個判决要不要平反呢？它今天還有法律效力麼？如果今天托洛茨基未死，來到蘇聯境內，要不要逮捕

審判呢？這也需要蘇聯法院說明一下。

蘇聯最高法院是不是認爲撤消了原判也就撤消了其中要逮捕和審判托洛茨基的段落呢？是否以此承認托洛茨基本來無罪，又未判刑，因之不需要平反呢？

在此意義下，我們就說到了中國托派平反的問題。

中國托派至今尚未得到平反，尚被視爲反革命分子。從形式上說，中國托派之爲反革命，與蘇聯的冤案無關，判决書上都未提到蘇聯冤案，但事實上中國托派之爲反革命，正是從蘇聯冤案來的。政府工作人員同托派犯人對話時，總要引《毛澤東選集》直排本第一百六十二頁註釋三十，那裏引了一條斯大林語錄，斯大林在那裏把托派說做殺人犯，間諜，賣國賊，等等的組織。爲甚麼？因爲三十年代那幾次公開審判的案件已經用「眞憑實據」來證明了。至於那幾次公開審判則不許討論其眞僞。正是根據這三次公開審判，所以定陳獨秀爲「漢奸」，每月接受日本間諜機關的三百元津貼，所以稱中國托派爲「漢奸組織」。

蘇聯用法院，用法律形式，制造冤案。中國則不用任何合法形式，或者借用蘇聯已有的形式，制造冤案。

中國今天却不能藉口蘇聯至今尚未給托洛茨基平反，而不給中國托派平反。要知道蘇聯最高法院今天並非說托洛茨基有罪不能平反，而只是說蘇聯從來未曾給托洛茨基定罪，不需要給他平反。

「平反」是一個法律名詞。我們要求「平反」，就是要求法律上的「平反」，解鈴還是繫鈴人。那一家司法機關判决托派有罪，就應該由這一家司法機關宣布托派無罪。我們要求的就是這個。至於所謂「政

治的平反」，則托洛茨基主義是對是錯，只有歷史來判斷，任何政治黨派都無權作出判斷。

在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鬥爭，差不多從六十年前起，就是在不正常的軌道上進行的。一方提出理論，進行時局的分析，由此主張一定的路綫，去向羣衆宣傳；另一方則撇開理論和路綫，只藉助於造謠和誣蔑，說托洛茨基是「法西斯走狗」，陳獨秀是「漢奸」等等，莫斯科三大冤案以前已經是這樣了，三大冤案以後更加振振有詞。

今天，怎麼樣呢？托派不屑爲這些造謠和誣蔑自辯，自辯也沒有效果。可是蘇聯法院已經正式承認莫斯科三次公開審判都是冤案，而撤消原判了；中國也先由歷史家，後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辨明陳獨秀不是漢奸，並未代表托派接受日本的津貼了。

然而，中國法院至今尚未撤消解放初年對於托派案所作的判決。

三百六十多年前天主教的法庭判決伽利略有罪，這個判決不撤消，倒不是伽利略的恥辱，而是天主教廷的恥辱。

中國人民需要徹底解放思想

——回應《我國八十年代托洛茨基研究回顧》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十日）

張　開

面對的新情勢新問題

蘇聯、東歐的劇變，給中國人民（包括思想理論界、歷史學者、民運人士），提出了許多重大、複雜的問題。例如：

一、蘇聯在經濟上已是世界第二位「超級」強國（僅次於美國），由世界第二位大共黨的蘇共統治了70多年，爲甚麼會迅速崩潰，蘇共政權垮台，蘇共從唯一執政黨地位變成不合法，所有加盟共和國爭相獨立，昔日的聯盟完全解體？

二、爲甚麼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能夠似是而非地大肆宣傳，並誤導人民：這是共產主義、馬列主義的徹底破產，證明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行不通，爲人民所唾棄，也反證資本主義是優越可行的？

三、現在仍然死守共產黨一黨獨裁的中國和北朝鮮等國家，會不會也像蘇聯、東歐各國那樣劇變？中

共現時推行的路線、政策，將把中國帶到哪裡去？

四、既然資本主義制度的衰朽本質沒有改變，那麼，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的社會主義學說）是否還保存它的科學分析和論斷的正確性？國際工人革命運動的前景又將怎樣？

對於上述問題，筆者嘗試簡要提出如下的理解：

一、前蘇聯及蘇共的劇變，是斯大林官僚層在列寧死後背叛了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長期推行極權獨裁和錯誤政策的必然結果。各國共黨把劇變歸咎於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得逞，那只是推卸官僚層罪責的借口。東歐各國跟隨斯大林主義的政治、組織路線，自然也難逃相同的厄運。

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學說，與共產黨的錯誤混爲一談，劃上等號，只是要乘勝追擊，順便摧毀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學說的聲譽。它們清醒地知道，這些學說是自己階級的最大思想敵人，是潛在的巨大威脅，因此要利用時機加以沉重打擊。各國共產黨過去假借這些學說的名義，掛羊頭賣狗肉，以致給了資產階級很好的藉口，去欺騙部份人民。

三、中共一向奉行斯大林主義，同樣存在特權官僚層，中國同樣是官僚化的工人國家，十多年來，經濟改革雖然使生產提高了，人民生活比過去有所改善，但政治上卻保守，對人民的控制並沒放鬆，使人民對民主自由、政治改革的要求更爲殷切。經濟上的對外開放改革，又使資本主義勢力在中國大增。這樣的右傾加速加劇發展下去，經濟「和平演變」的可能性便會相應地增加，最終會重蹈蘇聯、東歐的覆轍，如果

人民還未能起來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實現眞正的無產階級民主政制的話。

四、蘇聯東歐的巨變，並非由於資本主義制度有優越性而發生，也非由於馬克思社會學說破產而造成。資本主義制度的衰朽本質既沒有變好，各國工人的革命運動仍會興起，被共黨冒充過的馬克思主義將會恢復眞面目，人類仍要走向科學社會主義這條唯一出路。

學術思想理論界的責任

面對著今天國外國內的嚴峻新情勢、新問題，我國的思想理論界、學術界實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要從思想理論上、歷史上正確解釋有如前面那些問題，向人民說出歷史事實眞相，評介過去工運、共運、尤其是聯共（布）黨內的思想政治鬥爭實況，判斷有關各方在重大爭論問題上的是非曲直，以幫助人民共同汲取經驗教訓，具體了解前蘇聯和東歐巨變的原因，指明人類將走或應走的道路。

十多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界利用中共標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逐步突破過去的思想禁區，對某些被歪曲了的歷史和被污衊的歷史人物進行客觀的探究，作出與過去不同的翻案結論。這是難能可貴的，表現出學術思想界的進步。

其中較顯著的，是批揭斯大林及其僞造史實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失實和錯誤，肯定斯大林領導對中國 1925-27 年革命失敗所應負的責任，推翻陳獨秀（間接地對中國托派）被誣是日寇漢奸的罪名，等等，都是重大的進步。

在對托洛茨基及其歷史功過、理論主張的重新評

價上，也是突破傳統禁區的勇敢行動，同樣值得讚揚的。

喬健寫了《我國80年代托洛茨基研究回顧》，對有關問題作總結性的評介。從該文可看到，我國一些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他們努力排除困難，搜集資料證據，推翻許多官方說法，部份地揭開了被隱瞞的歷史眞相，肯定了托洛茨基在蘇聯革命中及建國初期的重要作用。

不過，人的認識理解是有一個過程的；有時，對同一樣事物，所作的評價也會有不同。就像喬健的《回顧》所敘述的，蔣琦、張月明對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評析，與李顯榮所作的便大不相同，後者雖然看過托氏的論著，卻大體上依然維持斯大林過去對它的批評，儘管蔣張兩人已指出斯大林「在相當程度上曲解了這一理論」。《世界史研究動態》主編朱庭光指出，李顯榮的《托洛茨基評傳》「史料較爲充實」，對托氏一生的一些重要問題的敘述「比過去一些說法更爲接近歷史實際」[這意味他的敘述還未能符合歷史實際]；但該書作者「在研究著述的過程中思想沒有放得很開，對托洛茨基在進入新經濟政策時期前後提出或支持的一些政治主張和理論觀點記述分析似嫌不足，有些問題上揭示歷史眞相的深度不夠。」(1)

《不斷革命論》與農民評價問題

中國學者研究重點之一，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有些批評認爲：托氏貶低農民革命積極性，

忽視民主革命階段，想跳過農民運動，直接搞「純社會主義」革命。這些意見還是同幾十年前蘇聯官方的批評差不多。

筆者認爲，這個理論是有關世界各國（特別是不發達國家）革命的路線，其正確或錯誤，會影響革命的勝或敗，本身很具重要性。因此也願參與探討。

托氏 1905 年寫的《總結與前瞻》指出：「在一個經濟落後國家，無產階級可以比資本主義更前進國家早些得到政權。」

「無產階級，非擴大革命的基礎，不能鞏固它的政權。勞動群衆的無數階層，主要在鄉村的階層，須待革命前鋒隊即城市無產階級把握國家大舵之後，才能被捲入革命之中」。

「農民底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甚至整個農民底社會地位，其命運是與整個革命命運，即無產階級命運，相聯繫的。」

「但農民也許要排除無產階級而佔據其位置麼？不可能的。全部的歷史經驗都反對這個假設。歷史經驗表示：農民是絕對不能起一種獨立的政治作用的。」

「無產階級祇能在全國高潮之上，依靠於全體人民底突進，而走到政權。」(2)

12 年之後，俄國 1917 年十月革命的整個過程，證驗了托氏的上述論斷。他這些話，沒有輕視農民（即他所說的「鄉村的階層」）對革命勝利的不可或缺重要性。

列寧和托洛茨基都同樣認定，俄國資產階級不是革命的動力，更不能對革命起領導作用。在 1917 年以前，列寧提出「工農民主專政」口號，但農民在專

政中會起何等領導作用（即是否與無產階級「平分秋色」，抑或起較多或較少的作用），列寧並無肯定解答。而托洛茨基則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口號，顯示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及其他低下階層群衆。1917年二月革命後，列寧放棄了「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在《四月提綱》中提出：「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號召「全部政權歸工人代表蘇維埃」。(3)這就是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十月革命的勝利，實現了列寧和托洛茨基這個主張。

列寧在以後的論著中，便明確主張無產階級專政，而不再用「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例如，他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的報告指出：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當作爲這個社會基礎的階級鬥爭相當尖銳的時候，除了資產階級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外，不可能有任何中間道路。」(4)

這就是說，不可能有工農民主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

農民這個階級，本身包括富農、中農、貧農、僱農等階層，相互間利益並不一致。托洛茨基在上面提及的《總結與前瞻》中繼續說：在無產階級走上政權後，「農奴制之廢除將獲得擔負徭役的全體農民底擁護。····但保護農業無產階級的法律則既不能得到大多數人如此積極的同情，又要遭遇少數人積極的抵抗。無產階級不得不將階級鬥爭搬到農村裡來，如此就打破了全體農民之中無疑存在的共同利益····。無產階級於其統治開始時，就必須拿貧農反對富農，拿鄉村無產階級反對經營農業的資產階級，以此求得擁護。」(2)這些話也同樣沒有「貶低農民革命積極性」，而只是認爲：農民需要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評價是：「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眞正革命的階級。‥‥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是爲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於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於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5)

托洛茨基斷定農民不能起獨立的政治作用，與列寧是一致的。

列寧對農民作用的評價，在十月革命後說得非常清晰。這裡，略引他著作中的一些話來證明：

他總結俄國二月革命的經驗說：「起初蘇維埃聯合了全體農民。正是由於貧苦農民不開展、落後、無知，領導權才落到了富農、有錢人、資本家、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手裡。」(6)

「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裡，能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資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而小業主必然是動搖的、軟弱的‥‥。要擺脫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社會，除了被壓迫階級的專政而外沒有別的出路。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因爲無產階級是被資本主義聯合起來和「訓練」出來、能夠率領那些過著小資產階級生活而搖擺不定的勞動群衆前進‥‥的唯一階級。」(7)

「全部政治經濟學（如果從中學到一點甚麼的話）、全部革命史、全部十九世紀政治發展史都告訴我們：農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資產者走。他不能走別的

道路。」(8)

列寧上述文字所稱的「小業主」、「過著小資產階級生活而搖擺不定的勞動群衆」、也是在指農民。對於上引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評價農民的意見，我們還沒有聽到有「馬列主義者」指責他們「蔑視農民」。但對於持相同意見的托洛茨基，卻一直被這樣指責，這不是「因人而異」，是對人而不對意見嗎？

薛偉漢、辛仲勤、潘國華在合著的《革命與不斷革命研究》一書中，所引的列寧批評托洛茨基的文字，都是十月革命之前寫的，但完全沒有談到十月革命過程中或以後列、托兩人對無產階級專政和農民作用的見解主張的一致（有如前面所指出和引證的），也沒有引用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後所寫所說的意見。這顯然是不客觀、不正確的。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問題

列寧逝世後，黨領導層內爆發的重大爭論之一是：蘇聯單獨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

1981年，蔣琦、張月明的研究文章斷言：托洛茨基「否定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也是錯誤的。」(1)這顯示，直到1981年，中國有些學者還是認爲，斯大林肯定蘇聯能夠單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確是對的。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由鄭異凡編譯了一本《「一國社會主義」問題論爭資料》（下稱《論爭資料》），在1986年10月出版了第一版，刊載有正方（布哈林）和反方（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湟夫）的有關著作或會議發言，以及正方斯大林關於這問題的14篇文章篇目。儘管此

書只是內部發行，但對研究聯共這個爭論，筆者認爲是很有價值和幫助的。同樣值得讚賞的，是對於托洛茨基等人所有引用列寧等的資料，都逐一加上編者註，詳細列明出處（書名、中文版卷數和頁數等），表現出編者的嚴謹負責，也方便讀者查證其眞實性。

這個問題的爭論，不是學術上的，不是分辨誰的論戰能力強、眼光夠遠大的個人之爭，而是一個極端重要的理論政治問題，有關蘇聯國家和人民的前途、黨和國家的國內外方針政策應如何厘定的問題。斯大林從肯定「能夠建成」的前提出發，相應地推行了閉門建設的國內外方針政策。但 70 多年實行的結果，蘇聯今天卻整個解體了，正在向資本主義復辟倒退。這個悲慘結局完全證明單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的破產——不但單獨一國不能夠，而且有多個工人國家同時存在也不能夠！這是異常不幸的歷史答案。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斯大林在 1924 年秋天才第一次提出的。托洛茨基認爲斯大林這個理論「不僅同馬克思主義整個傳統，同列寧學派，而且同斯大林本人在同年春天所寫的東西完全矛盾。」「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歸根到底互相對立的社會主義理論觀念。從這裡產生了不同的戰略和不同的策略。」(9)

托洛茨基在這個論戰中，曾詳明地徵引了列寧的許多著作、布爾什維克黨的傳統意見，等等，去證明上述的矛盾。這許多的引證，在《論爭資料》中都可找到，而且有編者註列明出處。那些引文說明：列寧等布黨領導人都把蘇聯的前途寄望於西歐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蘇聯要幫助和推進世界革命，以

建立歐洲的以至世界的社會主義聯邦：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蘇聯不致孤立而被資本主義所推翻。

以下，讓我們看看托氏當年的一些基本論點：

「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早就發展得超過了民族界限。····社會主義社會在生產技術方面應代表著比資本主義更高的階段。如果把建立閉關自守的民族社會主義作爲目標，儘管能暫時取得成就，也意味著把生產力拉回到比資本主義還落後的境地。」

「舊矛盾加上新矛盾，造成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產生令人痛苦的困難。····勞動群衆的狀況並沒有隨著經濟的普遍高漲而得到改善，反而由於現在糧食困難的增長而惡化。蘇聯經濟的尖銳危機說明，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生產力不適應於民族市場，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能達到社會主義的協調一致。」

「社會主義是爲滿足人的需要而進行有計劃的、和諧的社會生產的組織。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還不是社會主義，而僅僅是它的法律前提而已．社會主義社會問題不能同生產力問題分開，而在人類發展的現階段，生產力實質上是世界性的．單個的國家對資本主義來說已經變得狹小了，更不能作爲完備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地盤。此外，一個革命國家的落後狀態增加了它被拉回到資本主義的危險。」

「由於世界分工，由於不同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由於它們經濟上的互相依賴，由於各國文化的不同方面的不平衡性，由於現代生產力的進程，只有按照經濟螺旋體體系，通過把個別國家內部的不協調提交給完整的國家集團去解決，通過各國間的相互服務以及經濟文化各部門的相互補充，即歸根到底在世界舞台

上，社會主義制度才有可能建立起來。」(10)

托洛茨基在60年前寫的這些意見，經過蘇聯解體的證驗，更加顯得正確。這是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堅持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的表現。很不幸的，他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湟夫等的意見，當時卻被斯大林爲首的保守官僚所壓倒。

斯大林在「能夠建成」的「理由」掩護下，實行了與托洛茨基上述主張背道而馳的保守戰略和策略，以在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實則首先是鞏固其官僚層的權位）作爲壓倒一切的任務，把世界革命的利益隸屬於蘇聯官僚層的利益，把其他國家的革命和共產黨變成爲克里姆林宮外交政策的籌碼和工具，加上錯誤的領導，致使後來許多國家的革命運動都歸於失敗，從而加劇了蘇聯的孤立，但同時也強化了官僚層的權力和保守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亞有十多個國家的共產黨先後奪得了政權，結束了資產階級在各該國的統治。但這些共產黨都師承了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亦即狹隘保守的民族主義，各以本國及本黨的統治地位和利益爲中心；同時學足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和統治手法，導致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變成了官僚化工人國家。因此，儘管存在著十幾個官僚化工人國家，卻不能共同組成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爲基礎的社會主義聯邦，在比蘇聯更大更強有力的層面上組織生產，分工合作，同時推進其他國家（尤其是先進國家）的革命。結果，東歐各國的共產黨政權也同蘇共的一樣逐個倒下，一一證明了「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破產！

經過蘇聯、東歐三年來的巨變，論證以《論爭資

料》等書所提供的意見，思想家們應該可汲取到經驗教訓，得出「單獨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的正確答案吧！

民主化與派別鬥爭問題

黨和國家的民主化還是官僚化，是當時托洛茨基與斯大林鬥爭的另一重大基本問題。

官僚化問題，在列寧逝世之前不久，便開始由列寧警覺到，向黨領導層提出設法解決。這有列寧當時的論述、書信、文件等所證明。據托洛茨基在他的《自傳》中敘述，列寧當時已患病，曾向托氏提議結成聯盟：「一般地反對官僚主義，特殊地反對組織局」——斯大林機關的中心。托氏分析列寧的《遺囑》（即 1922 年 12 月 25 日和 23 年 1 月 4 日給代表大會的信 (11)）的含意，該信列舉六個人名字加以評論，目的就是幫助托氏去做反官僚主義鬥爭的領導工作。(12) 但列寧不久去世，使這項爭民主反官僚的鬥爭任務，要由托洛茨基去領導進行。

這項任務是關係蘇聯和蘇共存亡的關鍵問題，其極端重要性，從現時蘇聯和蘇共的解體可清楚得到證明。聯共（布）和國家機關的完全官僚主義化，形成特權官僚層，使官僚層與蘇聯人民（包括少數民族和加盟共和國的人民）之間的矛盾，成爲國內主要的矛盾，這個矛盾越積越尖銳，終於造成工農大衆的反對、各少數民族和加盟共和國的脫離。如果當時列寧和托洛茨基所堅持的國家和黨內的民主得到發揚、擴大、鞏固，把官僚主義遏止了下去，那麼，蘇聯以後的發展肯定會完全不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面貌也會完全

不同。

爲了爭取黨和國家的民主化、反對黨國的官僚主義，爲了推行自己提出的國內外路線政策（包括國內經濟建設、推進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線，反對「單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主張），托洛茨基寫出了許多文件、文章、小册子（如《新路向》、《十月教訓》等），在會議上作了許多的發言和辯論（這些應可見於當時的會議記錄，雖然那些記錄後來已是不完整和經過修改的）。

既然在托洛茨基及持有相同意見的同志，與斯大林爲首的保守領導人之間存在非常重大、基本的不同政治主張，那麼，前一群人在黨內組成派別，共同提出及爭取實現自己的主張，便是邏輯的發展，是黨內民主的正常表現，也是少數派的基本權利，絕不違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本世紀初曾分成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即多數派和馬爾托夫們的孟什維克即少數派，便是一個例證）。

喬健的《回顧》介紹了安大峰的意見，說列寧晚年與托洛茨基關係較好，兩人在很多問題上觀點一致或接近；托氏在列寧逝世前後「抓住了嚴重的官僚主義問題，有其合理一面」，這些評述大體上可印證了筆者前面的敘述。不過，安大峰又同時批評托氏挑起黨內鬥爭，不遵守黨的民主集中制，搞派別活動。其實，組織行動應服從於政治。既然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問題」、和政治上思想上的基本原則分歧，而本人又認爲自己是正確的，那就必須成立派別，光明正大、旗幟鮮明地進行黨內鬥爭，以便爭取黨內的多數支持，改變黨內錯誤的思想、政治路線，遏止官僚

主義。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存在而不堅決進行黨內鬥爭，就等於放棄革命家的責任，任由錯誤和官僚主義發展，危害國家和人民；同時，如果不組織派別進行鬥爭，就必然軟弱無力，被強大有組織的領導層逐個擊敗，客觀上幫助了官僚領導層鞏固其權位。因此，指責托洛茨基「搞派別活動」，挑起黨內鬥爭，是不公允的。

當時斯大林所代表的政治錯誤和官僚主義沒有被打敗、被克服，那是由於深刻的更強大的客觀主觀原因：蘇聯經濟上的落後，世界革命的一連串失敗加深了蘇聯的孤立，這都有利於官僚層的得勢；蘇聯人民經過4年世界大戰和3年外國圍攻及內戰的消耗，普遍感到「疲倦」、鬥志低落，使當權派的保守主義得到了市場。一句話就是：不利的形勢比革命者還強，正確的主張也被壓制了下去。因此，不能以當時鬥爭的結果來判定誰是誰非。最公道的裁判者是歷史。列寧死後蘇聯將近70年的歷史，特別是蘇聯和蘇共現時的結局，已經對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鬥爭的是非曲直作出了裁決。

需要徹底「解放思想」

蘇共黨爭的經驗教訓，對於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及其他國家的人民都是很重要的，是各國工人階級和革命者必須汲取、引爲殷鑒的。中國等官僚化工人國家，同前蘇聯、東歐等官僚化工人國家，在國家性質、國情、社會矛盾等方面，都是基本上相同的。中國步蘇聯的後塵，向資本主義倒退，是遲早會質變的，雖然具體形式和步驟會有不同。

爲要汲取前蘇聯的經驗教訓，給中國等國人民思

考研習、使中國等國家避免重蹈前蘇聯的覆轍，中國的學術界、思想理論界就需要眞正地徹底地解放思想，突破官方過去劃下的一切思想禁區，認眞探究和揭出歷史眞相，恢復歷史事實的本來面目，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觀點和立場，對聯共當年的黨爭和論戰作出翔實正確的評介。

也正因爲如此，喬健在《回顧》一文末段所提出的意見，筆者認爲是很值得推介的。他建議，我國當前對托洛茨基問題的研究仍需繼續解放思想，拓展領域，如《不斷革命》論及其評價問題；列寧逝世後聯共（布）黨內鬥爭的是非曲直，如何看待托洛茨基及反對派的政治主張和理論觀點；托洛茨基對斯大林時期官僚集權體制的分析批判；等等。另一方面，應加強研究工作的「基本建設」，翻譯介紹一批檔案文獻和研究專著。

《回顧》一文寫於 1990 年年底以前，那時，前蘇聯還在漸變過程中；在 91 年 8 月流產政變以後，蘇聯局勢急激突變，更加顯得上引《回顧》建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中國領導人現時正在繼續標榜要「解放思想」，而中國人民也在衝破過去的思想禁錮，謀取自我思想解放，這個時代的變化是急劇巨大的，中國的學術思想界自然不會固步自封，而可能比以前更進取、更進步。「我們相信我國的托洛茨基研究在 90 年代將取得更大的成績。」——喬健在《回顧》文中最後表示了這個信心，筆者對此也是滿懷希望的。

註釋：

(1) 喬健：《我國80年代托洛茨基研究回顧》，原刊《世界史研究動態》1990年第12期。

(2) 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中譯本第三卷343至345頁附錄，鄭超麟譯，歷史研究社1941年出版。

(3) 列寧：《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見《列寧選集》中文版第三卷第15頁。有重點字原文用黑體字。

(4) 同上書第722-723頁，《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和報告》。

(5)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1-262頁。

(6)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選集》中文版第三卷685頁。

(7) 同上書713頁，《論「民主」和專政》。

(8) 同上書847頁，《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

(9) 《「一國社會主義」問題論爭資料》第290頁，東方出版社出版。

(10) 同上書第291、297、321、339頁。

(11) 《列寧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7至343頁。

(12) 《托洛茨基自傳》中文版第185至186頁，春燕出版社出版。

托洛茨基及左派反對派：

俄羅斯政府檔案披露的新材料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潘佐夫

〔本文是作者在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在紐約市舉行的「社會主義學者會議」工作坊上的講稿。該工作坊由《保衛馬克思主義公報》及《社會主義行動》合辦。工作坊的其他講者還有阿道夫・越飛的女兒娜塔莎・越飛等。阿道夫・越飛是托洛茨基最親密的政治伙伴和密友，他是蘇聯二十年代重要的外交家、左派反對派的重要成員，在一九二七年死於自殺，本文經過刪減。〕

我與娜塔莎・越飛不同，我生於對托洛茨基及其主義一無所知的五十年代蘇聯。有關於他，我們所知的僅是誹謗。從大學、中小學，我們所知的托洛茨基是「人民公敵」，而左派反對派的全體成員都是「叛徒」。

我在一九七二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的亞非國家研究所，是中國問題專家。我專攻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革命史，更專習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一九八七年，我首次有機會到訪中國，在該國的圖書館間搜尋資產階級傳入中國的歷史文獻，爲我的研究收集材料。就在這些圖書館裡，我一生人第一次找到托洛茨

基的著作，中文的。

發現托氏中譯文

在此以前，我一直沒有機會讀到托洛茨基的俄文著作，因爲他的著作都收藏在圖書館的特別部門或國家檔案庫。太有意思了！總而言之，我在中國的圖書館裡找到了托洛茨基及左派反對派的中文譯本（因爲那時他們開始出版托洛茨基的書），也找到托氏的俄文本。我讀了《托洛茨基自傳》等著作。坦白說，在那時和現在，我都沒有成爲托洛茨基主義者，也不是政治家。須知道，我是歷史學家，我的主要任務是理解歷史的過程，不偏不倚，保持客觀精神去搜集材料。

自從我開始搜尋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義的材料，我發現在俄羅斯沒有憑藉。爲了了解中國托派，我需要了解在俄羅斯誰是托派。因此，有段時期，我中斷了爲中國歷史搜集材料，而花了數年時間在俄羅斯歷史上。我專注在俄國革命、布爾雪維克主義的起源、俄國的列寧主義及托洛茨基主義，以便清晰了解托洛茨基主義是甚麼。由此我找到了相關的興趣，並寫成一本名爲《里昂・托洛茨基與中國革命》的巨著。這本書已寫了七百多頁，是關於中國托派運動。本書從一九一七年中國傳入布爾雪維克主義亦即托洛茨基主義開始，目前只寫到中國共產黨開除托派的階段。

我在一九八八年底從中國回到俄羅斯後，寫了一篇名爲《里昂・大衛道維奇・托洛茨基》的學術文章，是托氏政治傳記。我花了一年半時間找地方出版，但是沒有人肯刊登。出於想解釋托洛茨基其人，我試圖去理解他。那篇文章的主要結論是說，托洛茨基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鬥爭的對象不是蘇聯，而是官僚主義、黨官僚化、黨機關的污垢，等等。文章也談到托氏在布列斯特和談中期的作用。須知道，在俄國自斯大林時代開始，差不多所有人都認爲，托氏提出的「不和、不戰」是絕對愚蠢的公式。我試圖指出，在當時的具體局勢、特定時間下，這條公式是絕對正確的。可是，很多人都不理解我。

最後，在一九九零年五月，文章終於在《歷史問題》雜誌上刊載了。那時候，〔俄羅斯〕局勢有了變化，我把更多文章交付發表，包括有關於布列斯特和約的，另外其他如：《彼奧布拉仁斯基(Preobrazhensky)與托洛茨基》、《新禮頓・里昂・托洛茨基》等。其中，有些文章在美國的《蘇維埃研究歷史學報》上刊出，如一九九一年的《里昂・大維道維奇・托洛茨基》。霍格特一道尼編的《蘇聯一九八七——一九九一：馬克思主義觀點》也收了我寫的《新僞造學校》。

新偽造學校

此外，我也讀了其他托洛茨基研究者的著作，有

些甚至被我看作同道人。不過，這類研究者畢竟在少數。大多數著述仍然對托氏大放厥詞。有關托洛茨基及俄國革命的歷史學研究，仍是一如既往的僞造，只是角度不同；許多歷史學家對列寧及布爾雪維克革命大讚特讚，而對托氏仍然詬病。

據我看，目前有兩種流行傾向（不僅在歷史學方面，在日常讀報引起的觀感也是這樣）。一類來自愛國民族主義者的所謂歷史學家；他們致力要顯示俄國革命只是猶大人的陰謀，目的是要殺害所有俄羅斯人。此外，有另一種我認爲是屬於官方傾向的，因爲其主要代表者是葉爾欽的顧問們，例如這個度米奇·伏戈岡諾夫將軍。他曾寫過一本斯大林傳記(《勝利與悲劇》)，繼而寫了托洛茨基傳記，最近又剛完成了列寧的。這些書給人的印象是布爾雪維克都來自火星！在書裡，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是如許優美，沒有矛盾，人人都享受生活似的。而忽然間，十月革命驟然來到。爲甚麼有十月革命？只因爲這群來自外太空的布爾雪維克蠢貨搞了個政變！很荒誕的觀點，可是十分流行，充斥在報章、雜誌，甚至電影內。

因此，我的首要任務，是表達我所理解的眞實的歷史，基於文獻的歷史。我的第二任務，是試圖暴露這類僞造，把官方歷史運用的方法披現出來。那篇《新僞造學校》就是針對伏戈岡諾夫而寫的。而他只是主要人物。像他這類人大有人在；譬如，有一個叫尼古拉·瓦錫茨基的，寫了許多有關托洛茨基的文

章。這人是個反猶太主義者，徹頭徹尾的反動派。除了這篇文章，我與好友皮埃爾·布魯埃也聯名向伏戈岡諾夫發了封公開信，指出他在托洛茨基傳記內所用的方法上絕對不確的地方。那本書錯誤百出，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絕不可靠。

翻開伏戈岡諾夫的書，內裡載有許多文獻，是該書的重點，取材自格柏烏（蘇聯秘密警察）的檔案等政府文庫。可是我無法相信他。每當我有機會把材料比較，我就發現歪曲、偽造、污蔑無處不在。舉例說，伏戈岡諾夫爲了顯示托氏在內戰時期是多麼可惡，就說他試圖在紅軍裡組織迫害和恐怖，並且說，托氏在流放時期所寫的《我的生活》招認了這點。他摘引了托洛茨基這句話：「沒有壓迫，就不可能組織軍隊。有必要向兵士擺出死亡選擇，在前線或在後方，」伏戈岡諾夫的摘引到此爲止，接著說上他自己的意見：「看，托洛茨基自招了。他說要建立一支軍隊不可能沒有壓迫。這是他本人的說話。」有意思的是，托洛茨基的句子還未結束，仍只是逗號，未下句號；這個句子接著是說：「那是舊日軍隊的原則，而我們是在十月革命的原則上建立軍隊。」這是伏戈岡諾夫把戲的例子之一。

還有另一種例子。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寫信給中央委員會。對此，伏戈岡諾夫斷言：「在這封信裡，托洛茨基再一次要求恢復集中營、勞動和經濟軍事化，等等。」老天，當我讀著，我不禁大笑不

已。我想，難道我自己發瘋了？因爲，托洛茨基這封信的原文，我讀了不下多次。（該信詳見美國尋路人出版社1978年版的《左派反對派的挑戰 1923-25年文集》第51至58頁）信上並沒有伏戈岡諾夫提到的文句。任誰都知道，這封信是論述官僚化，是關於黨內官僚化的一系列討論的開始。

像這類歪曲和憑空捏造的例子尚有很多。伏戈岡諾夫說，托洛茨基並不聰明，乃因他相信世界革命。（皮埃爾和我在致他的公開信上回答說：因之，西方國家的統治者們也不見得聰明，因爲他們多年來一直鬥爭反對世界革命！他們也相信世界革命的可能性。）

有必要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分析一個人。譬如，任何人都可以說史賓諾沙是個傻瓜，因爲他不知道錄映機是甚麼。伏戈岡諾夫用今日的，即後來的視野來分析當時的托洛茨基，眞是奇怪，這不是歷史的方法。

蘇聯政府檔案開封

上述是我在蘇維埃歷史方面所做的部份工作。1991年政變後，政府檔案重開，我接到管理檔案的新負責人的一個電話。他們讀到我寫的有關托洛茨基的文章，邀請我在1991年底到檔案處組織一個專責小組，爲刊印托洛茨基的文獻進行資料搜集工作。檔案處是甚麼？在莫斯科，有各種各樣的檔案處。對研

究分析俄國革命、世界革命的歷史學家來說，最重要的檔案有三個：(1)所謂的「黨中央檔案」；(2)「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檔案」；(3)「統轄（或稱「克里姆林宮」）檔案」。

在這幾個檔案中，其中的「克里姆林宮」檔案仍未公開，而「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檔案只是局部公開，絕大多數文件仍是密封。我是收到「黨中央檔案」處的電話。1991年10月，這個檔案處易名爲「當代歷史文獻保存及研究俄羅斯中心」。據我看，這個中心，是世界上存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蘇聯共產黨文件最多的政府刊物圖書館；它保存了總共約150萬份書寫文件、9,300張攝影材料及集中在551種收藏的1,600米長的電影膠卷，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之一。

這些檔案在十月革命後不久組成；迄至今日，分編爲三大部門：(1)歐洲社會歷史部：收藏從19世紀初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爲止的材料。(2)俄羅斯政治歷史部：藏品包括有列寧文件及其他共產黨領袖的個人檔案的分部。(3)國際勞工及共產主義運動部：藏品包括有共產國際及共產主義新聞局(Cominform)的分部。

現在，我想就我在這些檔案裡得到的發現說幾句話；我的研究是從這些有關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義的檔案文件開始的。我準備了三項研究搜集項目；一個是我自己的搜集項目，另外兩個則和朋友一起進

行。首先，我們找到了288封前所未爲人知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之間的通信。這些信件，向來不會對學者提供。這些文件對1918年到1923年這個關鍵時期內，在俄國和國際共產主義者間發生的眞實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資料顯示，在內戰期間，列寧一直支持托洛茨基的作戰觀念；並且，只由於害怕黨會公開分裂，列寧才有時會同意斯大林。資料又顯示，列寧、托洛茨基及其他布黨領袖的確有運用恐怖來建立紅軍，即是，當每個人（包括司令員及甚至人民委員）喪失紀律習慣，就會運用。這事誠然可怖。有白色恐怖，也有赤色恐怖。可理由是爲甚麼？這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找到許多文件顯示，失掉頭顱的所有人都是無紀律的人。在如許情況下，你怎去建立任何軍隊？

一貫反對黨的集中化

此外，文件又顯示（我認爲，這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托洛茨基即使在參加了布爾雪維克黨之後，仍然繼續反對布黨關於黨內集中化的原則。我相信這項事實非常重要。眾所周知，在十月革命以前，托洛茨基一直進行反對列寧對黨集中化計劃的鬥爭。而在十月革命之後，也有許多文件顯示，托洛茨基從民主見解出發，多次反對黨內高度集中化的原則。這些文件顯示，遠在列寧最後一次染病之前，布黨領導層已經展開了政治鬥爭；托洛茨基和列寧就新經濟政策持

有相同的綱領；緊接在十月革命發生後及這整段時期，列寧和托洛茨基一起試圖抓起世界革命之火，包括在〔前俄羅斯帝國版圖內〕部份地區作準備〔以納入蘇維埃統治〕。不過，就國內哪些地區，托洛茨基不完全同意列寧的看法。

第二個研究搜集項目，是有關於聯合左派反對派及中國革命。就中國革命的討論，我們找到托洛茨基、齊諾維也夫、拉狄克及其他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們一共89份文件。這些文件，有助於我們撰寫眞實的故事——左派反對派對中國革命問題所持立場的眞眞實實的眞相。

第三個研究搜集項目，是我個人的研究項目，名爲《托洛茨基與中國革命》。這本書的資料根據多方面的檔案，計有台灣情治機關的俄羅斯檔案和台灣檔案、英國的托洛茨基檔案及多個私人檔案；其中，包括有來自中國托派運動創建者之一的私人收藏檔案。

總而言之，就我在俄羅斯目前的工作、俄羅斯現時的歷史著作的幾個潮流，我能告訴你們的，就是這些。

【史丹譯自《保衛馬克思主義公報》第121期】

莫斯科的
托洛茨基問題會議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霍格特。道尼

超過150名俄羅斯人及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聚集於莫斯科，參加了於1994年11月10-12日在俄國首次舉行的里昂。托洛茨基問題會議。

里昂。托洛茨基是與列寧一起領導俄國十月革命的領袖。在列寧患病及逝世後，托洛茨基在布黨內領導馬克思主義反對派，反對以斯大林爲體現的官僚化過程。作爲20世紀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托氏奪目出眾，其著作是任誰想了解今日世界所不可不讀的。儘管這樣，在1980年代末「改革」之前，托氏的著作在蘇聯國內長期被斯大林主義官僚建制有系統地歪曲，粗暴地抹煞。尤有甚者，斯大林官僚建制改寫歷史，以摒走托洛茨基，歪曲他的見解，抹煞他及與列寧同代的其他布黨領袖的貢獻。當中，大部份領袖在三十年代蘇聯共產黨大清黨時被殺害。托氏不渝地進行反斯大林主義官僚、恢復革命國際主義的鬥爭；直至1940年8月，他在強迫流放後所住的墨西哥的居所內，被斯大林派遣的人暗殺。

迄至近年，歷史眞相重現；在莫斯科召開的會議

是這個過程的表述。這個會議，由「支持民主和社會主義學者」和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問題中心聯合贊助。

會議之目的

莫斯科會議之目的，是「討論當代對馬克思主義的詮釋、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和實踐、托洛茨基在社會和政治理論史及工人運動中的作用、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命運，官僚現象和與之鬥爭的方法有關的諸問題。」

會議上，每名參加者就有關托洛茨基思想的論題，有10分鐘簡報論文的時間；須翻譯的有20分鐘。每項簡報後，有問答時間。

在會議第二天的傍晚時分，有次「圓桌會議」，由多位托派及其他政治派別代表各作 5分鐘發言。簡報範圍就工人階級領導危機的當前問題，作出論述及提出建議。簡報後也有討論時間。

會議由「支持民主和社會主義學者」的阿歷山大・布茲加林致開幕歡迎詞。首名發言者是霍雅科夫教授，他也是這次會議的主要組織者之一，講題是《托洛茨基思想在今日的適切性》。

霍雅科夫論托洛茨基和布哈林

霍雅科夫以托洛茨基對布黨蘇維埃政府、乃至共產國際官僚墮落的分析爲據，解釋了托洛茨基何以是

有別於斯大林主義的另類出路。按霍雅科夫解釋，正由於托氏是另類出路，才導致戈爾巴喬夫時代的官僚建制選取了用布哈林來替代斯大林。布哈林追隨斯大林迫害由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繼後，在1938年莫斯科大審判中，布哈林自身也成爲由斯大林操縱的血腥官僚機器下的犧牲者。

布哈林從未認眞地反對過黨和國家的官僚化，他的思想也不曾對官僚統治的前提作過挑戰。反之，托氏揭露了官僚層的權力冒昇、其政策的反革命本質的因由和效應，並且號召推翻官僚層。結果導致了對托氏其人及其思想的誹謗和歪曲；這個運動一直奉行至今天。（有關霍雅科夫的意見，詳見《托洛茨基的理論遺產及其時代意義》；他的簡報即根據此文，該文已刊於第二期《十月評論》。）

會議共有23個簡報，大部份講者是學者和教授，也有少量工人。他們的年齡從20多歲到70多歲不等，但當中只有一個女講者。論述範圍檢視托洛茨基的理論與過去歷史的關係，及在今天應用的問題。大部份報告對托氏的著作、其寫成背景的上文下理，作出了空前豐富和深入的鑽研。

托洛茨基主義派別

多個托洛茨基主義派別也參加了會議，計有：

● 「工人民主和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無國際聯結。

● 「社會主義工人同盟」，是「重建第四國際工人組織」的支持者。

● 卡洛斯・奧里弗拉：莫斯科國家大學法律學生，巴西人，「國際托洛茨基主義者陣線」支持者。（這組織前由阿根庭托洛茨基主義者莫蘭奴領導）

● 英國的「戰士」傾向。

●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由英國的「國際托洛茨基反對派」基里斯・艾斯維爾在圓桌會議上作簡報）

● 斯巴達克斯陣線，等等。

前蘇聯共產黨派別

此外，其他政治派別的代表也有參差不同的參與，計有：「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執行局成員、哲學科學博士波里士・斯拉芬；他參與了圓桌會議的發言，也在會議上作了簡報。在圓桌會議上發言的還有「共產主義者聯盟」的一位領導人，和「俄羅斯共產黨」議會部長沙治・諾維科夫。後者除參與了圓桌會議外，更爲會議提供英俄語的傳譯服務。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共產主義者聯盟」和「俄羅斯共產黨」都是繼蘇聯共產黨瓦解後形成的黨派。

托洛茨基遺產研究委員會

除了珍貴的討論外，會議達成的至重要成就之一，是通過決議，設立由霍雅科夫教授倡議的「托洛

茨基遺產研究委員會」(詳見第二期《十月評論》)。會議組成了一個初步的俄羅斯人及國際支持者的評議會，由兩位國際協調人督導工作。首項工作，是立即開始擴展俄羅斯內外支持者的名單。

兩位協調者及委員會的成員在會議翌日聚頭，就催生實務工作的編制達成了協議。工作包括把會議的俄文、英文簡報結集出版；爲《里昂・托洛茨基案件》及《無罪》兩書尋找俄文譯者及予以出版。1937年，由美國教育家杜威出任主持的杜威委員會，在墨西哥就莫斯科大審判對托洛茨基作出的指控進行了聆訊；該兩冊書即是這場聆訊的文獻結集。歷史學家皮埃爾・布魯埃會爲該兩冊書旁註補充在（政府）檔案新找出的材料。

此外，委員會擬定了在1995年12月8至10日，召開第二屆研討會議，這次會議會在聖彼德堡舉行。1995年是俄國1905年革命90周年紀念年。

為罷工礦工籌款

在會議閉幕前，大部份與會者都同意，向位於莫斯科以南的圖拉省正進行罷工的礦工作出聲援。爲此，會議進行了募捐。送發給礦工的捐款並附同一份支持聲明。在會議進行期間，近200名礦工已在礦坑絕食罷工了一星期，要求發放欠薪。

據莫斯科報章報導，在罷工者所處的地區，欠付給礦工的薪金達22億盧布；在全俄羅斯，欠下礦工的薪金更高達50億盧布。絕食的罷工者當中，有30人

已須送院救治。會議共籌得24萬盧布捐款。

眞正的馬克思主義得以倖存

這個會議，在各方面來說都令人振奮。會議得以召開的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一項明證，活生生地說明了，以斯大林爲首及其追隨者領導的官僚層所施行的所有謀殺、壓迫、僞造歷史及各種極權措施，都失敗了。不僅這樣，官僚們也無法消滅以托洛茨基及其鬥爭所代表的眞正馬克思主義。經過數十年的恐怖和恐懼秋後算賬（這些恐懼，可以僅僅是由於沒有用污辱的詞語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而引起）。年青托洛茨基主義者得以站立在公眾講壇上講話，就如他們現在所做的，互相爭辯分歧的政見——單是這個意念本身，就是隧道盡頭的一線亮光。

倘若沒有這種對各樣見解公開的、公共的討論，前蘇聯的工人們將永遠無法在帝國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挑起的危機中，找到他們的出路。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莫斯科電視台在新聞節目中，對會議作了簡短的特寫報導。在同一節新聞時間中，有另一則新聞：當天，在莫斯科，有十個人因寒冷致死，俄羅斯的經濟危機愈加深重了。

在會議啓幕之前的日子裡，也即是在1917年革命周年期間，並湊巧也是托洛茨基的生辰，此地的主要電視台播映了一齣新近制作的電影「托洛茨基」。這齣電影宣揚有關於托洛茨基的新僞造學校，把托氏

描繪成一個自我中心狂，充滿惡魔思想，渴求權力和斯大林一樣冷酷無情。

要做到持之以恆昭示歷史眞相、清除過去遺留下來的謊言和斷瓦之前，尙有許多工夫要做。現在，我們終於有了途徑，有了共同合作的基礎，攜手進行這項工作。這是找尋通往眞正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這項任務的基本部份。在眞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生產者自由組合爲本的。

【史丹譯自《保衛馬克思主義公報》第122期95年2月號】

托洛茨基的理論遺產及其時代意義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霍雅科夫教授

【 本文譯自小冊子《托洛茨基的理論遺產及其時代意義》的導言部份：「本報告的任務及功用」。作者霍雅科夫是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屬下科長，也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舉行的托洛茨基問題會議的組織者之一。本小冊子是霍氏在該會議上作報告的藍本。】

像所有或幾乎所有在戰後受教育的蘇聯普通社會科學家一樣，我對托洛茨基的態度，若不說是全盤忽視，至少也是漠不關心的．對托洛茨基，我們知點甚麼？非常少。誠然，經過赫魯曉夫的「解凍」時，我們不會再把狂人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指控全部當真。我們可以憑其他材料，如列寧及其他人的著作，大概知道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內戰時期及其他方面起過的真正作用。(1)不過，也是僅此而已。

一向以來，所有宣傳和社會科學已經過特殊處理，變成這個樣子：但凡是對托洛茨基有利的，會有更多的批評和註腳隨之而來。甚至，列寧的著作也被借用來作這方面的意識形態宣傳。在列寧的著作中，凡有關對托洛茨基作正面肯定的，會或是消失，或是含糊過去。凡不利的，卻會大書特書，變得特顯。從

我們早期的學生時代開始，對托洛茨基的負面態度，已深深烙印在社會科學家的腦袋裡。而這種態度，並被看成是聰明而進步的社會知識的當然看法。

我屬於在六十年代修讀高等教育的一輩社會科學家。「六十年代」所意味的敵視斯大林主義、教條主義及任何對科學無批判的態度，給我們體味尤深。我們嚴肅看待馬列主義，對西方現代社會思潮（異化問題、早期馬克思著作、存在主義、個人主義等）有廣泛興趣。

托洛茨基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相同」？

至於對托洛茨基，我們把他看成極近於斯大林主義，是極左的，相近於恐怖主義的意識形態。即使托氏是反對斯大林主義最早最深刻最熱切的鬥士，並且死於斯大林僱用的殺手下，這一點事實，也沒有令我們動容。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反感，普遍和對斯大林主義一樣。

我們中間有許多人傾向支持社會民主思想及市場社會主義。布哈林或賴可夫的名字對我們更有吸引力，代表了斯大林主義以外的出路，是人道的社會主義。

這種看法有其理論根據。這種觀點認為，假如是按照布哈林的計劃發展，而不是瘋狂地加速工業化、扭曲集體化，則蘇聯後革命時期的經濟成就會持久得多。然而，斯大林採取了左轉，即採取了托洛茨基發展出來的策略。因此，一般的社會科學家會認為，托洛茨基主義是斯大林主義相同的理論及意識形態。所不同的，只是托氏也許聰明一點，少些血腥。

對我們而言，托洛茨基主義不過是主張世界革命

變革的左派激進意識形態的一類罷了。尤有甚者，我們把斯大林主義設想成是托洛茨基主義的體現。我們的這種錯誤觀點，不幸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仍在宣傳。(2)

一般而言，我們未讀過托洛茨基的著作，對他一無所知。所以，我們對戈爾巴喬夫在蘇聯七十周年上的講話可以共鳴；他說：「查其實，只是持資本主義立場的政治流派。」(3)

我們的錯誤：沒有細讀托洛茨基

當少量的托洛茨基著作在改革時期出版時，我們並不急於讀它。我們說：「又是這個托洛茨基，這個革命異端份子。」我們認為，托洛茨基其人及其主義只是一個歷史現象；作為歷史，當然該讀、該記取，至於讀他的著作就大可不必了。

這種偏見，現在還大行其道。

可這個想法是我們的大錯誤；也不僅是我們。我當然不是說，托洛茨基主義是永恆的教條，可以滿意解答目今所有問題。在托洛茨基的著作裡，有些在當時已是錯誤、不確，哪怕它寫得才華洋溢。我們一般的社會科學家的錯誤，就錯在我們不在意、不細讀他的著作，而只是聽憑斯大林主義者對這位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作出詮釋。

還有更重要一點必須一提。托氏的傳記劃分為三個明確時期：前革命期（至一九一七年）、革命及內戰期（至一九二三年），及後革命期（一九二三年以後）。三時期的托洛茨基當然都是同一個人；然而，

出於當時狀況及托氏對時代課題的熱切響應，令到三個時期的文章各具特色，看起來就像有三個不同的托洛茨基似的——雖然他在原則方面仍是一以貫之。不過，人們通常讀到的，是散佈在蘇大會文獻、學報內的。關於第二時期的個別文章，因為這些文類較易找到。可是，這類文章往往是枯燥的。至於對蘇聯尤為有用，而且是最精采的第三時期的文章，卻只有個別的單行本，而且收藏在少數大型圖書館的特別藏書部。

時至今天，我們才開始讀托洛茨基。也只是初讀而已；認真的科學研讀還待開始。

深入研究的必要

只有那些讀書不求甚解的人，才會聲稱已經掌握了「托洛茨基與當代」、「把托洛茨基思想付諸今用」的論題所包含的廣泛內容和複雜性。顯而易見，我們面對的局面尤為困難。在我們的文庫及社會科學部門裡，並沒有認真的、科學的研究托洛茨基的傳統。我們不知哪些該學、哪些不該，也不知從何論起，誰可依憑。

對我來說，雖然有必要去找出方法，把由「斯大林偽造學校」引起的糾纏不清去弄個條理出來，可是，反駁斯大林主義對托洛茨基的批評，卻不是科學探討或個人務必要做的事。

俄羅斯缺乏托洛茨基著作

有兩大客觀環境因素加深了探討的困難。其一，

是我們缺乏托氏本人的著作。我們有他的部份著作，但不全，也不易到手，多數收藏在圖書館裡。重印的書不多，只有少數的大型圖書館才有。如《俄國革命史》，要借出也不容易。短缺的還有《反對派文集》(4)。

其二，國外許多有關著作，也是俄羅斯研究者無法接觸到的。

鑑於這種先天不足，我的報告便只能是概略性及零碎的。這份報告不是要在國際文庫間多添一筆及深化討論，而是要引起一般的社會科學家注意，我們在研究托洛茨基及其遺產時所碰到的問題。

譬如說，下列論題很值關注；我們一直沒有認真研究過這些論題。

托氏作為歷史家、馬克思主義者、政治經濟學家。托氏與革命（近年開始有了這方面的研究）。托氏與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托氏與新經濟政策、工業化和集體化。托氏與軍隊。托洛茨基、蘇維埃制度、蘇維埃及反官僚化的鬥爭。托氏與內戰及布列斯特和約。托氏與外交政策及國際關係。托氏與共產國際、國際工人運動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發展。托氏與文學、文化和日常生活。托氏其人、他與列寧、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關係，等等。

托洛茨基本人對上列許多論題作出過深入的理論闡述，而專家們也一般認為，這些闡述是無可挑剔的科學分析的模式。(5)

潮流酷愛無知

對上列論題若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科學探討，就無法對俄羅斯的社會歷史、馬克思主義發展、當代工人及革命運動，尤其是當前的俄羅斯，有足夠及有深度的認識。要達成這種認識，有賴於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觀點、不同動機的各類研究者的共同努力。而若缺乏托洛茨基的著作，這項繁複的研究項目則無法展開。

再者，若只是根據那批「匆匆忙忙的哲學家」如別爾佳耶夫，布爾卡科夫們的著作去辯論俄羅斯的命運及前景問題（許多人在當前投入了這場辯論），而卻不去讀、不去提托洛茨基的著作，其無知的程度，相當於只會根據李嘉圖、阿當史密斯的意見去討論國家對經濟的管制問題，卻從未讀過凱恩斯的著作。不錯，現時潮流酷愛無知，可我們不要永遠任它這樣！

這個報告只探討理論方面的問題。誠然，托洛茨基是如此不尋常的歷史雄才，他的實際工作和鬥爭，往往掩蓋了他的理論家身份。可是，我仍然認為，作為早在一九三零年代初就對蘇聯當時的性質、對發展的另一種出路有所理解及提出科學分析的托洛茨基，正是以理論家的身份和當前息息相關的。我這樣說，並無意思貶低他在革命經驗方面的重要性。托洛茨基當時的預見，在六十年後全部實現。只有天才有這個能力。真令人吃驚。

原註：

（1）令我們這一代人對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的特出作用大開眼界的第一本書，大概是約翰里德的《震

動世界的十日》。經過長期消失，這本書在一九五九年於莫斯科再出版。儘管書裡有出自斯大林主義傳統的編者語，謂「里德對『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特出作用』有錯誤看法」，可是，這類按語已無法抹煞這個才華洋溢的觀察家的字字真言。看過這書的人，都會對列寧的許多意見有全新的理解。

(2) 在「改革」初年，許多號稱開明派的出版人，十分認真地宣揚布哈林主義，認為它是取代斯大林主義的真正出路。饒有深意的，是這些人的文章寫於八十年代，而非六十年代中。在那時，許多一向被埋沒的人物已重新公諸於世，然而，寫文章的人既不知有托洛茨基，也沒有讀過他的著作。換言之，他們對自己大書特書的蘇維埃歷史的材料並不明白。

(3) 引自戈爾巴喬夫《演講及文章選集》第五卷，莫斯科Politizdat一九八八年出版，第三九七頁。

(4) 例如，俄羅斯科學院最大的社會科學圖書館，只藏有兩期《反對派文集》（一九三零年第十一、十三期）。一般來說，要找到托氏的科學著作，是十分耗心耗時的事。你明明開始覺得有大批材料存在，但卻只找得一麟半爪——我就在這基礎上，寫托洛茨基的時代意義！

(5) 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彼里・安達生(Perry Anderson)寫道：「托洛茨基住在遠離歐洲中心的土耳其的一個小島上，寫了一系列有關德國納粹興起的著作，對當時的政治局勢作具體研究。這些著作的質素之佳，在歷史唯物史中無出其右。」（見安達生：《到歷史唯物主義之路》的「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索」，莫斯科出版，一九九一年。Interverso，第一零八頁）

【史丹譯】

俄羅斯的工人鬥爭和托洛茨基主義的「幽靈」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霍格特。道尼

【 1995年4月6-9日，「社會主義學者大會」在紐約市召開。本文是作者依據在大會上的專題小組「俄羅斯的非斯大林主義左派」的講稿，整理而成。專題小組的其他成員，有莫斯科國立大學經濟學者及政治行動家亞歷山大・布茲加林，俄羅斯議會上議院議員奧列格・斯莫林；兩位人士都是俄羅斯工人黨的創辦人。專題小組的另一位成員，是英國格拉斯哥大學高級講師、《批判》雜誌編輯希勒爾・蒂克廷。】

「左派」、「右派」名詞，源自18世紀法國大革命期間，議員的座位排式。行之經年後，這些名詞，和「進步的」、「民主的」或「民主左派」這類名詞一樣，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不論在美國或俄羅斯，情況都是如此。····

俄羅斯有甚麼「左派」？

「俄羅斯的非斯大林主義左派」這個用語，容或適用於一些有研究價值的，觸目的政治和組織發展。另一方面，把討論限定在這個範疇，是缺席裁判，把部份當前最嚴峻的題目遺漏掉。

國際資本對工人實行的毀滅性政策，由國際貨幣

基金會打前鋒，又由葉利欽領導尚在當權的斯大林派執行。俄羅斯工人怎樣組織起來，從而自衛？組織俄羅斯工人的，是哪些人？這些組織力量奉行的是甚麼政治？有人能提供邁出危機的眞正方法嗎？

有些人會立即想到由前蘇聯共產黨組織的一些團體。既然要談俄羅斯的「左派」，拿他們的方向來談，正是一個得當的開頭。

蘇聯共產黨是甚麼「左派」？

自從蘇聯共產黨在1991年被禁，這個有一千九百萬成員的黨，內中有些成員，想組織有別於這個黨的眞正政黨。蘇聯共產黨是專門爲了維持現狀、保持官僚統治層的特權地位而效力的。由前蘇聯共產黨員組成的政黨，著名的有「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全聯共產黨」（布爾雪維克派）、「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共產黨人聯盟」、「俄羅斯共產黨人黨」和「俄羅斯人民社會黨」。所有這些黨的政見，大致和1924年到1991年間，斯大林主義統治各階段秩序所提供的展望，相差無幾。

換言之，所有這些黨派，都想恢復1991年以前，促成今日危機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秩序。這個秩序，確實能提供予工人較諸資本主義或今日俄羅斯更高得多的「社會工資」。可是，隨著工人社會利益而來的，是官僚侵佔的不成比例的龐大特權，及工人民主被迫害和極權管治各社會機關（包括大眾媒體）所窒息。因此，回到1991年以前的制度這一前景，實

在難以激勵工人起來鬥爭。

關於這方面，我已經有文章，刊在去年出版的《保衛馬克思主義簡報》。自去年至今，尤其自俄羅斯政府和車臣發生戰事以後，大概有過一些重新組合，不過，這些政治殘餘份子（所有這些黨加起來，不多過一百萬成員）的政治本質，會否有重大改變，是大成疑問的。

所有這些黨派，都沒有體認到國際工人階級深刻的領導危機，乃是由斯大林派的叛賣、清算和政策造成的結果。斯大林主義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及俄羅斯愛國主義取代國際主義，把第三國際轉化成克里姆林宮的外交臂胳。用兩段階段論（必須容許資本主義按其道路發展，繼而才談到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與不斷革命論對立。不斷革命論認爲，在第三世界的「民主」資產階級革命階段，仍然有需要全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俄國革命的最重要教訓之一。俄國革命的其他教訓，包括用列寧主張的聯合陣線，由工人組織在特定要求特定需要上，組成聯合行動與聯合陣線對立的，是階級叛賣的人民陣線（階級調和派）政策，由共產黨及其隻胞社會民主黨組成。

蘇聯共產黨那些殘餘中沒有一派承認，世界工人運動受到深刻破壞，乃因爲墮落工人國家張牙舞爪的官僚精英，用官僚極權集中制，取代了作爲組織革命政黨方法的民主集中制。

從蘇聯共產黨出來的這些新組合，繼續奉行斯大林主義政策，例如，他們號召重構蘇聯；這樣一來，

他們就和希望脫離克里姆林宮控制而獨立的非俄羅斯人民的強烈情緒，發生抵觸。這種斯大林主義的「愛國」傾向，令前共產黨派，能夠和大俄羅斯主義派甚至反猶太派，得以組成「紅一棕」和「醬紅一米白」的聯盟。

蘇共以外的黨派

1987年以來，俄羅斯出現不少政治組合，開宗明義地排斥前共產黨及其機器的任何部份。這些組合，不少都程度不一地立根自工人階級。····

斯大林派聲稱其權威主義是「列寧主義」。上述組織都錯誤地接受了這種宣稱。由此所及，他們一般都拒斥政治，拒斥爲政治權力進行鬥爭，拒斥工人需要有政治組織。他們退到經濟主義，只提出經濟要求，把解決危機的方案，簡單看成只是爲工人在企業、工廠等爭取「工人自管」。對克里姆林宮的〔經濟〕計劃，他們提不出政治、經濟的另類出路。事實上，他們的提議，與政權提出的「自行結算」和「工人擁有權」的方案是相得益彰的。這個流派，公開或不公開地實際上成爲工團主義者。位於列寧格勒（聖彼得堡）的工會「獨立」、烏拉爾斯的社會政治會社「工人」，及伏爾加地區的「罷工」，屬於這種流派之列。

由於許多工廠倒閉，許多這類以工廠爲基地的團體，大受打擊。再者，生活水準的大幅下降，也令團體的活動經費捉襟見肘。

許多顯然是無政府主義的團體也發展開來；當中一些，早在戈爾巴喬夫時代已有淵源。我估計其他講者會論述這類人士的工作，因爲，這個派別在較廣闊的領域上，有不同程度的開拓活動，有其表達場所，例如莫斯科工人聯會出版的《團結報》、工黨和反核運動。大部份這類團體，都可以歸列爲「左派」。

托洛茨基派團體

前蘇聯出現的最重要的新式團體，是那些致力於研究和理解1920年代左派反對派、托洛茨基及由他在1938年創建的第四國際思想的活動家。毫不意外地，這些團體都十分細小，面臨政治和物質上重要困難。這些團體，計有「工人民主及國際社會主義者委員會」，位於莫斯科，從1991年刊行雙月刊《工人民主》；「社會主義工人聯盟」，爲一宣傳小組，出版有新聞通訊及不定期刊。這些團體中的部份年青成員是工人，有參與工會組織和工人鬥爭，及其他反對政權的較大的政治鬥爭。

由於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容許出版及討論反對派的著作，托洛茨基的部份著作便得以書籍形式出版發行，總數有超過1.3百萬本（至1976年爲止，列寧著作共印行1.74億冊、斯大林著作5.25億冊）。不過，在這數量當中，多數是托洛茨基的文學論著；主要的政治著作甚少，並且都載有惡意的導論。有些新一派的歷史學家，認識到托洛茨基著作對理解現行危機的根源有莫大的重要性，協助了組織1994年11月

在莫斯科舉行的有關托洛茨基在俄國的大型會議。亞歷山大·布斯加林也有參與其事。爲了促進托洛茨基著作的出版，該次會議設立了一個委員會。

俄羅斯工會日抗議行動

倫弗伊·克萊克寫於4月5日的文章報導，擁有5千萬會員的「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號召全俄羅斯工人，在4月12日一起進行聯合抗議。（這篇文章，題爲《俄羅斯工會號召抗議日》，可以在國際電腦網絡會議欄找到，簡號是labr.cis，即「獨立邦共同體勞工」）這篇文章，報導了當今工人，而不僅是左派的活動。

「俄獨聯」（俄羅斯獨立工會聯合會）是前蘇聯那個臃腫的「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接班人。「全蘇聯工會中央局」是工會聯合會，由官僚獨攬。俄羅斯工人面臨的政經問題，正是水深火熱。他們的生活水準，面臨四方八面而來的空前打擊。政權將這稱爲「市場改革」。像美國工人一樣，俄國工人苦於工會領導破產，又無自己的政黨。

面對政權的市場改革及私有化，「俄獨聯」的政策提不出另類方策，也提不出政策予工人自衛。「俄獨聯」會方要員順從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希冀用後門談判的方法，向廠方及政府取得協議，維護工人的社會福利。····

與此同時，俄羅斯的生產直線下降；現時，只及1990年百分之45。物價高企，工資呆滯。失業攀

昇，而有工作者未必獲發月薪。至今年1月，俄羅斯有三分一人口的所得收入，仍不足「起碼生存」的指標！

在之前的一次抗議行動，「俄獨聯」一個領袖列舍特尼科夫說，工會在通貨膨脹和失業當前，採取斷然行動，「是令我們會員人數下降的原因之一」。（全文請參閱國際電腦網絡上列欄目內之文章《俄羅斯的工會》，1995年1月8日。該文是列舍特尼科夫的訪問稿，原載於1995年1月7日《人民每周世界》。（《人民每周世界》是美國共產黨的刊物）據列舍特尼科夫說，從1992年以來，「俄獨聯」已流失起碼1千4百萬會員。

1994年10月，在工人不滿壓力的催迫下，「俄獨聯」終於組織了一次抗議行動。在5千萬會員中，有8百萬人參加了抗議。可是，「俄獨聯」提出的要求是溫順的：給工人補發欠薪，設立失業工人計劃。列舍特尼科夫解釋，「工會提出的要求來自人民，工人自已。他們說：『拿出你領導的本事來。你每日和總理及工人部長見面，成效在哪裡呢？』」

克萊克的文章寫，「回顧1994年10月那次行動，列舍特尼科夫認爲，當時貶低政治要求，是一項錯誤。在數個城市，工人提出要求政府辭職，或至少須在1996年前進行總統選舉，而『俄獨聯』的提案並無否決這些要求。」據克萊克的文章報導，「俄獨聯」78個地區組織中，有60個已經表態，支持〔今年〕4月12日的行動。

在這個工會抗議日，「俄獨聯」提出哪些要求？其間兩項要求重點，是追討欠薪（有些欠薪從去年開始拖欠！）及保障就業。不過，有些報導說，「差不多所有參與地區，工人及其工會都會著重提出政治口號」，口號包括號召選舉，及政府辭職。誰來替任辭職者？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克萊克報導，「俄獨聯」領導層計劃，組織一個「左中派聯合政府」，當中或可包括工廠總裁組織的聯盟，以參加1995年12月舉行的議會選舉。與工廠總裁結盟，意味對工人利益作妥協。這樣一來，聯盟中的工人代表，及至聯盟本身，會喪失信用。不過，議會反正無權。葉利欽治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把權力集於一體，其有限幾個成員，由指派誕生，按國際貨幣基金會意旨是嗆。注目於選舉，並沒有給工人提供解決方案。一如克萊克所說，只有「數以百萬計政治化的工人，在有組織及積極動員下」，才足以挑戰政府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政策，贏取工人要求。

「俄獨聯」官方可是卻不會提供這種動員前景。克萊克指出，「俄獨聯」會方一則呼吁基層在4月12日動員，一則卻貶低動員過程，堅稱4月12日抗議只是該會使出的機制之一，並且還是次要的一種「「俄獨聯」一名理事聲稱：「我們把談判程序看作是最主要的工具。」

「俄獨聯」提倡的「中間—左派聯盟」政治，和它的其餘政綱一樣沒有啓發性：「拒絕在我們俄羅斯上實行破壞性實驗；拒絕讓右派和左派激進極端份子

肆虐。」

一如既往，工會高層的特權理事制（這正是美國和俄羅斯的勞工顯貴制的共有本質），能夠提供給工人的，只是有組織地退卻；捨此之外，別無其他。他們不僅沒有足以動員工人大眾的視野，乃至是反過來，害怕動員起來的工人大眾，會結束他們安享的現狀。

退卻意味著進一步損害有組織工人的數量，乃至損害到工人階級整體。在工人運動中，需要的是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馬克思主義工人幹部，他們認識和吸收過去教訓，不害怕討論歧見，不害怕致力找出解決方案，回答這個嚴峻問題：下一步怎麼辦？

托洛茨基主義的幽靈在俄羅斯徘徊

據列舍特尼科夫說，「俄獨聯」的領導們，「爲防止托派和極端份子“破壞”行動而勸阻〔在1994年10月行動中出現〕政治要求，已毫無辦法了」。儘管托洛茨基派組織所提出的過渡綱領的鬥爭要求，能夠接觸到一定數量的工人，引起他們思考，可是，以托洛茨基派組織的細小規模，他們很難透過基層〔對工會領導〕構成直接威脅。

明顯地，列舍特尼科夫所指的，是工人間對官僚操縱懷有深刻敵意，在斯大林主義時期，這種不滿狀況，也被套上「托洛茨基主義」的帽子；這種不滿，迄今仍然對官僚操縱構成威脅。「俄獨聯」害怕的，看來是這方面。

問題是，要打鐵趁熱，把這種不滿力量導向成爲一股推翻官僚統治的政治運動，在跨在工人頭上的官僚專政的官僚層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爲達致革命而組織起來，那才是眞正的「左派」。

【史丹譯自《保衛馬克思主義公報》1995年7-8月號】

托洛茨基與蘇維埃民主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巴　爾

列寧格勒機場是個奇特的地方，甫下機，迎面的廣場大堂掛著顯示世界各地主要城市時間的時鐘，彷彿各地都沐浴在正午當中。這個機場是新俄羅斯的象徵：簇新而不能運作。機場具有作爲重要中心的面積容量，可是班機起降的數量只相當於英國最小規模的地方機場。

我來到俄羅斯，是爲了出席由「研究托洛茨基遺產國際委員會」（後稱「委員會」）舉辦的第二次會議。這次會議適值1905年革命九十周年，所以會議地點也設在聖彼得堡。大概這是自從二十年代以來，在俄羅斯革命的“家園”，首次有會議認眞地討論托洛茨基的著作和見解。

會議由當地學術人士主持開幕，約有60人參加。東道主聖彼得堡大學歷史系主任向來賓致謝，恭祝會議成功召開。歷史系教授卡拉什尼科夫接著提交報告，對蘇維埃的革命性質作了概述，並討論革命政權在推行政綱時所遇到的一些困難。

卡拉什尼科夫對革命俄國在二十年代所遇到的困難作了一番謹愼而帶批評的概述後，也對俄羅斯近期的歷史發表了一些有用的見解。他特別提出俄羅斯的

歷史傾向，每每是運用強大的國家以企圖趕上西方，這種國家損害了民主的可能性。

莫斯科國立大學的布茲加林教授則提出，關鍵問題在於工人自管；他指出，在二十年代新經濟政策時期及戈爾巴喬夫的“重建”時期一樣，都有工人在所屬工廠爲爭取管理權而進行鬥爭。

格拉斯高大學的蒂克蒂教授則談到托洛茨基的嚴謹和執著。蒂克蒂教授給不斷革命論作出鮮明的勾劃，　將之與馬克思的見解聯繫上來。蘇聯的落後性，意味到，假如要實現俄國革命者所希望見到的工人民主，則首先需要進行一場文化革命。蒂克蒂教授尤其強調不斷革命論的國際層面方面，並且表示，沒有西方的革命，便不能保住蘇聯革命。

古謝夫就左派反對派在二十年代初到1933年間的政策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問題，他指出，左派反對派的思想是在事變的壓力下逐步演變的。他並提出，儘管托洛茨基是贊同黨內民主，但是，在左派反對派時期（1923-25年），他卻並不贊同蘇維埃民主。古謝夫認爲，托洛茨基是在1933年之後才贊同全面的蘇維埃民主。

這個見解引發了激烈辯論。一些人認爲托洛茨基的立場比古謝夫所提出的要遠爲民主，有些則認爲古謝夫的評價是準確的，而二十年代也不具備蘇維埃民主的基礎。

這些短促交鋒給會議增添趣味。第一屆會議在一

年多前於莫斯科舉行，而第二屆會議改而在聖彼得堡召開也意義深長，既標誌著一項重要的周年紀念活動，並且給這個有逾五百萬人的城市的青年學生介紹托洛茨基這個名字。

「委員會」也藉著這個場合舉行了工作會議，除了決定在明年召開以不斷革命論爲主題的更大型會議之外，也決定擴展與俄羅斯境內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學術人士的工作。此外，「委員會」也討論了未來的出版計劃。出版計劃主要集中於出版托洛茨基著作的俄文版。下一步主要計劃是出版《里昂・托洛茨基案件》的俄文版。除此外，第一屆大會的主要報告也會出版俄文版，並且在烏克蘭創辦托洛茨基著作的出版計劃。

【史丹譯自《保衛馬克思主義公報》1996年1-2月號】

托洛茨基問題第二屆研討會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霍格特。道尼

1995年12月4日，在聖彼得堡（即前列寧格勒）召開了一個紀念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九十周年的研討會。研討會由「研究托洛茨基遺產委員會」（下稱「委員會」）、聖彼得堡大學歷史系及「學者支持民主及社會主義」三方合辦。召開這次會議的意念，首先由「委員會」提出，並由聖彼得堡大學歷史系主辦。「委員會」是由1994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探索托洛茨基理論遺產的大會所產生。

在1905年10月13日，聖彼得堡（當時名爲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在工人興起的高潮中成立。工人蘇維埃存在了五十天，最後由沙皇鎮壓而結束。彼得格勒蘇維埃是由工人代表組成的工人議會，屬於工人政府新生事物，由托洛茨基任主席。

1905年及不斷革命論

這個關於托洛茨基問題的第二屆研討會是爲紀念俄國1905年革命而舉行，會議題目定名爲「蘇維埃民主命運國際研討會」。大會特別探討工人議會在今天重新執政的可能性，此外，亦著重探討托洛茨基對1905年革命的貢獻及不斷革命論。一如托洛茨基所

說，「正是1905年1月9日到10月罷工之間的事件，在作者頭腦中形成了這些可稱爲『不斷革命論』的見解。」（托洛茨基：《一九零五年》。）托洛茨基又在《關於俄國革命的三種觀念》中寫道：

「不斷革命論的前瞻可以用幾句話總結如下：俄國民主革命若要取得完全勝利，除了在農民基礎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外，其餘形式都是不可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勢必把民主任務以至社會主義任務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並且給國際社會主義革命打上強心針。只有無產階級在西方取得勝利，才能防止俄國資產階級的復辟，以保護她得以把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底。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前蘇聯往後的發展和其他殖民地及新殖民地國家的經驗，已經一一證驗了托洛茨基對俄國革命的性質及未來的發展道路所提出的觀念見解。

研討會的發言內容

來自世界各地及俄羅斯的學者及政治活動家先後在研討會上提交報告。首先發言的是卡拉什尼科夫。卡拉什尼科夫是聖彼得堡大學一位教授，也是前蘇聯共產黨解散後成立的多個政黨之一的「工人社會主義黨」的聯合主席。他的發言主要是討論俄國從1905年到 1917年十月革命間興起的工人民主所產生的即時後果，以及工人民主在往後直到現時備受的鎮壓。

值得注意的是，卡拉什尼科夫在敘述整段歷史的過程中，竟然沒有一次提起過托洛茨基，既沒有提到他在1905年或1917年十月革命中的角色，也沒有提到他在1923年作爲左派反對派的領袖，直到1940年被斯大林特務暗殺的整段時期在保衛工人民主方面所起的作用。蘇聯及俄羅斯的斯大林及後斯大林時代對歷史的這種偏頗處理，乃至對歷史的捏造，正是「委員會」所要糾正的。

俄羅斯科學學院歷史系主任兼教授帕托洛夫繼卡拉什尼科夫致開場白後發言，講題是《一九零五年革命及俄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接著發言的是他的同僚歷史教授米哈伊洛夫，講題是《1905-1907年的彼得堡工人及工人議會組織》。此外是聖彼得堡大學歷史系教授斯米爾諾夫講述《蘇維埃及1993年的政權危機》；社會學家魯賓奇克講述《文化與蘇維埃》；英國埃斯達大學歷史系教授巴爾講述《托洛茨基與民主的老故事：蘇維埃與議會之爭》。這批講者分別在大會的上午時段發表演說。

按會議規例所訂，每位有約十分鐘的發言時間。大部份講者都能遵守這個時限。此外，大部份發言稿（而不是全部）都給翻譯成英文或俄文。居住在聖彼得堡的工人運動歷史學家兼馬克思主義者普列奧布托任斯基、在莫斯科居住的「戰士勞工黨」成員羅布．瓊斯和古謝夫負責翻譯工作；後者同時也在大會上發言。會議的上午時段側重在歷史方面，下午部份則較

多探討1905年革命在今日的意義。

約有90人出席了上午的會議，來者大部份是歷史系的青年學生。不過，在午餐後，與會者縮減至只在25人左右。下午的講者有古謝夫，也是莫斯科國立大學歷史科學系候讀生及「研究托洛茨基遺產委員會」的國際協調員之一，講題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義者及 1923-1940年的蘇維埃民主問題》；英國格拉斯高大學高級講師、《批判》雜誌編輯蒂克蒂主講《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蘇維埃民主》；莫斯科國立大學經濟系教授布茲加林主講《民主在二十世紀前夜的命運》；來自芝加哥並就讀俄國革命史的青年學生及政治活躍份子卡夫尼主講《托洛茨基、年青人及號召“穩定”》；來自聖彼得堡、研讀托洛茨基著作的青年學生塔馬爾金主講《辯士托洛茨基》。後者是會議的不速之客，他的講稿附有極多註釋，摘引自他最近看過的托洛茨基的著作。

位於莫斯科的俄羅斯科學學院的經濟系教授沃耶科夫負責主持研究會整日會議，他本人亦是「委員會」在莫斯科的主要組織者。會議在報告結束後進行了討論。

緊接大會之後，來自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兩地的參加者、與會的其他莫斯科及國際來客立即聚首一堂，商討繼續推行「委員會」活動的方法。「委員會」認爲，有需要在莫斯科及聖彼得堡之外如英國、法國及希臘等地設立地方工作委員會，看來大部份與會者都準備著手這項工作。

歷史仍被掩蓋

在會議舉行翌日，沃耶科夫教授率領部份與會者參觀1905年革命的一些歷史遺跡。此行正好揭示了這項事實：要還回歷史眞相，還回托洛茨基的歷史角色，尚有許多工作要做。1905年12月3日，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在技術學院舉行全體會議，當主席托洛茨基及一眾成員在進行會議期間，沙皇下令警察把會場包圍及拘捕全體成員。這次事件，標誌著1905年革命的失敗。可是，就是在這個技術學院，當研討會的訪客到來參觀時，卻感到大爲失望。

在技術學院內的唯一一所博物館，只是用來展出由這學院的學者所取得的科學成就；該博物館當時正關門維修。同樣，基於維修理由，學院內掛上富有重要政治意義的歷史照片的一堵牆，也被圍封起來。技術學院中沒有一人知道哪個房間是托洛茨基及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舉行會議的所在地。負責主管這所學院的女主持人，雖然理應學識淵博，但卻聲稱不知道誰是1905年蘇維埃的主席，也沒有把任何功勞歸給托洛茨基。到最後，這位女主持人指派了一名低級員工以協助參觀者訪尋古跡。這批參觀者找到了一個房間，相信就是那富有歷史意義的房間，不過，這裡也一樣是由於維修而緊閉著，並且門上也沒有任何說明。前蘇聯的歷史仍然被深深掩埋著，重門深鎖。

下次會議主題：被背叛的革命

「委員會」亦在這次研討大會期間舉行了工作會議，並投票決定會繼續努力及贊助 1996年11月22-24日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三屆大會。下次會議的主題訂爲「被背叛的革命六十年之後」，會議將著重探討托洛茨基在1936年流亡期間所著的《被背叛的革命》。托洛茨基在這本書內探討俄國革命墮落和斯大林主義的成因及後果。此書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之一，對理解我們所處時代的階級鬥爭，尤其在前蘇聯內的階級鬥爭的演變不可或缺。這份著作的手稿在寫成後，迅即譯成多種外國文字，但俄文版要到1971年才得以在法國出版。

有意索取更多資料的人士，可聯絡以下通訊處：

Professor Mikhail Voyeikov（沃耶科夫教授）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Ulitsa Krasikova 27, 117218 Moscow, Russia

Tel:095\332-4525 (I), 095-326-3497(家)

或Committe for the Study of Leon Trotsky's Legacy

（研究托洛茨基遺產委員會）

P.O. Box 1890, New York, NY10009, U.S.A.

Tel: 718-636-5446

或e-mail:mvogt@igc.apc.org

或fax:212-807-1832

【史丹譯自《保衛馬克思主義公報》1996年1-2月號】

（書評）

《莫斯科三次公開審判》

康春林編著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林　丹

1995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康春林編著的《莫斯科三次公開審判》。1936年至1938年連續幾次莫斯科審判案曾經哄動一時。在中國，1938年曾出版過《蘇聯黨獄眞相》和《蘇聯黨爭文獻》，揭露莫斯科審判案的虛僞案　件。當時由於資料貧乏，只是從出庭受審的被告人的表現、被告所陳述的犯罪經過的疑點、矛盾中來揭露人爲造成的假案。但是對案件的來龍去脈，以及案件編造過程，“犯人”是如何被迫承認罪行的情況，在當時是人們難於知道的“內幕”。

蘇聯內務部官員亞歷山大·奧爾洛夫，逃出蘇聯後，於1952年在美國出版《斯大林肅反秘史》，首次揭露了斯大林所進行的肅反內幕。1956年赫魯曉夫在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揭發了基洛夫被殺的各種疑點。自此以後，國外出版了多本有關蘇聯肅

反的著作。在八十年代蘇聯報章雜誌發表了不少有關肅反、各種案件的文章、資料及受迫害人的敘述。

1988年8月，蘇聯最高法院宣佈，對三十年代四起重大案件："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聯盟"案、"莫斯科中心"案、"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案、"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所指控均毫無根據，決定取消原判，爲四個案件涉及到的所有人（除了雅哥達之外）恢復名譽。

1989年，《蘇共中央公報》刊登了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蘇共中央附屬馬列主義研究院根據檔案資料編寫的《關於所謂"列寧格勒的薩法羅夫、扎盧茨基等反革命的季諾維也夫集團"案，《關於所謂的"莫斯科中心"案》；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蘇共中央附屬馬列主義研究院、蘇聯檢察院、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編寫的《關於所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關於所謂"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蘇共中央附屬馬列主義研究院編寫的《關於所謂"右派——托洛茨基反蘇集團"》等，充份暴露了這四個案件的僞造過程，逼供、誘供、騙供以及斯大林如何導演這些丑劇。

正如《莫斯科三次公開審判》的"出版說明"那樣，"作者收集了這一歷史公案的大量有關資料，包括當時庭審的口供、證詞、記者的報導、刊物的評論、犯人後裔及親友的回憶文章、80年代蘇共甄別文件，以及西方國家的有關著述"。特別是作者使用了

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蘇共中央附屬馬列主義研究院‥‥等機關根據檔案資料改編寫的四個案件的材料，更顯得《莫斯科三次公開審判》內容詳盡、資料豐富、立論明確、結論正確。

此書的特點也是它的優點，並不把三個案件分開孤立來看，而是把基洛夫案作爲引線，斯大林借基洛夫案引發大清洗，人爲的制造一大串假案，使我們看清楚案件的來龍去脈。

基洛夫被殺是凶手尼古拉耶夫的個人所爲，還是有人在幕後制造這幕慘劇，而這個人又是唯？這一直是個謎。作者則以嚴謹的態度對待這個重要問題。他列出了三種意見，而第三種意見是斯大林指使內務部籌劃去刺殺，作者稱之爲“傾向性”意見，即大多數人的意見。作者擺出了各種疑點：(1)基洛夫不同意斯大林使用刑法來對待黨內爭論的同志。在蘇共十七大上，一些老黨員要基洛夫任總書記代替斯大林。大會選舉結果，基洛夫得票最多，只有三張反對票，而斯大林卻有292張反對票，負責大會工作的卡岡諾維奇把反對斯大林的票銷毀，這才使斯大林保持總書記的位置。後來不到一年，基洛夫被暗殺，在幾年之內，十七大的代表遭到無情的鎮壓，在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鎮壓。(2)尼古拉耶夫在斯莫尼爾宮兩次攜槍被捕，內務部雅哥達指示把他釋放。基洛夫的警衛人員對此向內務部提出抗議，而內務部卻把個別警衛人員開除黨籍。(3)基洛夫的警衛隊長鮑里索

夫被用貨車送去受審時，押解人員製造“車禍”而把警衛隊長弄死。不久，押解人員全部被處死。後來，內務部長雅哥達、局長扎波羅熱茨以及所有與此案有關的內務部人員前後被處死，認爲是殺人滅口。

擺出這些疑點，使人只能得出結論；基洛夫成爲斯大林總書記位置的競爭對手，這是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於是，斯大林指示內務部雅哥達設法消滅基洛夫。

斯大林利用基洛夫被暗殺事件來打擊原反對派——季諾維也夫份子、托洛茨基份子以及布哈林的“右派集團”，這是斯大林的既定計劃。

1929年清黨，已把大批托洛茨基份子逮捕、流放。以後多次進行搜捕托洛茨基份子。托洛茨基在國外還在進行活動，反對斯大林。斯大林對托洛茨基尤爲憎恨，在四次莫斯科審判中，都把托洛茨基列爲主犯，是由在國外的托洛茨基指令國內的原反對派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進行恐怖活動殺害基洛夫、斯大林等黨國領導人。

作者指出：“斯大林利用了基洛夫事件所造成的有　利時機，來甩掉這些人，其手段是製造廣泛存在的反斯大林陰謀案、間諜案和恐怖組織案”。

由於案件是人工編造而成的，就難免有漏洞。所指控的托洛茨基的犯罪活動就出現了漏洞。僑居蘇聯的德人貝爾曼·尤林和菲里茨·達維德，被指控爲受托洛茨基派遣進入蘇聯進行恐怖活動。按照尤林和達

維德的交待，他們在1933年3月去蘇聯之前，曾在哥本哈根與托洛茨基見面，托洛茨基指示他們殺害斯大林。但是經過調查，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時的來客登記簿上沒有這二人的名字。

波達可夫被迫作僞供內務部要皮達可夫在公開審判法庭上承認1935年12月上旬，皮達可夫乘出差去柏林之便，乘飛機去挪威奧斯陸會見托洛茨基，接受托洛茨基的行動綱領。公開審判的第三天，即1937年1月25日，挪威《晚郵報》發表聲明說，1935年整個12月期間沒有一架民航飛機在奧斯陸的赫列爾機場降陸。這個通告見報後，西方輿論大嘩，蘇聯當局非常難堪，甚爲尷尬。托洛茨基同時在報上發表聲明，要求詢問皮達可夫那天到奧斯陸是否有挪威入境簽證···等等。同時，托洛茨基給莫斯科當局寫了一封信，要求蘇聯政府同挪威政府交涉，把他作爲皮達可夫的同案犯引渡回國受審。

斯大林早就想得到托洛茨基，把他置於死地而後快，托洛茨基送上門來了，斯大林爲何不引渡他回來？托洛茨基作出要求引渡回國受審的決定，是自問自己清白的，對他指控的罪狀都不是事實，不怕回國受審。在法庭上還可以揭穿製造這樣假案的陰謀。作者認爲，“因爲這樣做須讓挪威法院審查托洛茨基的罪名，其結果必然否定了蘇聯法院對他的指控”。也許這是一個原因，但我認爲，托洛茨基回國受審必不認罪，無論使用甚麼手段也不會使他接受斯大林的指

揮，編造供詞，認罪服法，必定是抗拒認罪，而且會大鬧法庭。托洛茨基不認罪，就會影響其他人進行翻供，揭發逼供。這樣就把斯大林設計的公開審判計劃破壞了。至於要把托洛茨基置於死地，還可以用其他辦法。

蘇聯法庭宣佈：缺席判處托洛茨基、謝多夫死刑。不久，謝多夫死於法國一家醫院。 1940年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蘇聯特工砍死。

作者在書中揭露了斯大林指導編織冤案、奸詐、陰險、惡毒的嘴臉，也描繪了那些幫兇，例如檢察官維辛斯基的丑惡面貌。

從三十年代直至斯大林病死，在這長達二十多年所製造的冤假錯案層出不窮，受迫害的人達幾千萬。讀了此書，就會明白：有意識的、人爲編造的罪行以達到鎮壓對方的目的，就不能說是“肅反擴大化”。

作者指出：“在排除恐怖政策的障礙，宣傳和貫徹恐怖政策，鼓吹個人迷信以及強化蘇聯法律的鎮壓機制的基礎上，肅清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工作逐漸向縱深發展。····從「托——季聯合中心」”的製作過程看，它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主觀意志和暴力手段相結合的產物，它的製作過程充份暴露了對布爾什維克黨的原則和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的踐踏和破壞。”

斯大林早在三十年代，或更早一些，在政治上就破壞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關心蘇聯問題的人，從此

書中，就可以找到今天蘇聯解體、資本主義復辟深層次的原因。

“出版說明”提出，應該從蘇聯的“兩反”中汲取教訓。當讀者讀完此書後，得到最主要的教訓必定是：不能沒有民主，正是由於沒有民主，才會有斯大林的專橫跋扈，為所欲為，亂砍濫殺。

簡　介

前蘇聯、東歐發生巨變，長期執政的共產黨紛紛倒台，一向被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變了色。究竟社會主義這種主張是否正確可行？各國共產黨所實行過的是否馬克思倡議的社會主義？它們曾有否什麼嚴重錯誤？人類的出路將會如何？……這些疑問都需要探討、解答。本叢書的出版，希望能對此有所幫助。

對於托洛茨基及其思想主張，是本世紀下半葉各國許多學者研究社會主義運動的課題之一。本書收集了中國大陸和香港、前蘇聯和俄國、歐洲和美洲等地學者的有關論著（它們都是從《十月評論》的特譯、轉載或撰寫的文章中輯出），儘管作者們的觀點、了解和立場會不盡相同，但各抒己見進行客觀探討的精神則頗一致，從而對有關問題提供了有價值見解和資料。

HK$30